

目 录

专 论

- 3 武田雅哉 / 中国连环画与海报上的俄苏形象

专题文稿：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 9 阎国栋 /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国观
22 刘亚丁 /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 30 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利用与想像

欧亚地区转型比较

- 36 松里公孝 /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51 大卫·兰恩 /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俄罗斯政治

- 74 徐凤林 /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87 蔡秋如 / 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之影响——叶利钦与普京时期之探讨
108 林精华 / 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历史·文化

- 128 沈 坚 / 海兰泡的俄名释义
136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0 年 10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0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Такеда Масая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иксах и постерах (3)

Янь Годун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я Екатериной II (9)

Лю Ядин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стереотип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философов»

—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ов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ими писателям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30 лет (22)

Кимитака Мацузато

Логика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и после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36)

Дэвид Лэйн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ы ЕС, СНГ и Китай в сравнении..... (51)

Сюй Фэнлинь

Карл Шмитт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74)

Цай Цюэжу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в России

и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 Периоды Ельцина и Путина (87)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Вездесущая фактор — Анализ влиян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жизнь России (108)

Шэнь Цзянь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звания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28)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0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Takeda Masaya

Soviet-Russian Images on Chinese Comic Books and Posters (3)

Yan Guodong

Catherine II's View of China (9)

Liu Yading

Back to Stereotype of "State of Philosophers" — Russian Writers' Utiliz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ast 30 Years (22)

Kimitaka Matsuzato

Log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36)

David Lane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ystem: EU New Member States,
CIS and China Compared (51)

Xu Fenglin

Carl Schmitt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s (74)

Cai Qiuru

Russia's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al Stability
— Cases of Y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87)

Lin Jinghua

Pervasive Presence — Analysis on Orthodox's Intervention in Russia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108)

Shen Jian

Interpretation of Hailanpao's Russian Name (128)

专 论

中国连环画与海报上的俄苏形象*

武田雅哉**

一、苏联好、苏联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苏联的关系一路走来，历经友好与敌对交互更迭的若干历史阶段。让我们首先回溯一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大体上的关系走向吧。

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学习前辈苏联开始起步的。虽然可以想象出在外交工作背后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纠结，但是两国还是于1950年缔结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国内开始对全民大力宣传：苏联是“老大哥”，是中国最大的友邦，必须要多向苏联学习。1957年中苏又缔结了《关于提供国防新技术协议》。为了提供技术支持，苏联方面派遣了许多技术专家来华，受到了中方热烈欢迎。

风云突变始于50年代后半期。1957年，由于赫鲁晓夫意欲谋求与美国和平共处，中苏两国开始渐行渐远。1959年，苏联撕毁《关于提供国防新技术协议》，进而拒绝提供原子弹技术数据。翌年，苏联大批召回技术专家，废除了大量的协议与合同，甚至停止供应各种物资和设备。因而中国被迫依靠自身力量来完成原子弹的制造，与此同时，原子弹研制的整个过程又被当作自力更生的爱国主题得到了广泛弘扬。

1963年，美苏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苏双方因为种种原因起了对立，开始了“乌鸦笑猪黑”式的相互对骂。在大人的世界里，这被称之为“论战”。

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以该事件为转折点，苏联形象一落千丈，别说是“老大哥”了，甚至与“美帝”

* 本文是作者于2010年5月在斯拉夫研究中心举办公开讲座时的演讲（中国の連環画・ポスターに見えるロシア・ソ連イメージ）内容的整理稿，经作者授权本刊独家发表中文版。

** 武田雅哉（Takeda Masaya），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专业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中国艺术。

（美国帝国主义）并列，被蔑称为“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美帝”与“苏修”成为当时人们最热衷使用的对两个大国的蔑称。

进入70年代，这次换成了中美关系趋近。1972年，中国迎来了尼克松访华与田中角荣访华。1979年，中国决定到期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翌年，该条约期满失效。

80年代，中苏开始摸索改善关系的道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与邓小平实现了会谈。1991年，中苏达成了东部边界协议。然而就在同一年，苏联解体了。

以上就是从“好苏联”到“坏苏联”，再到关系改善的两国政治关系变化的总历程，然而，这并非本文想要阐述的主题。在“好人”与“坏蛋”这种孩子气似的价值取向的转变中，国民是必须要情绪高昂地紧随其后的。不仅如此，连孩子们也要紧跟潮流。而他们当年创作的海报和连环画这类艺术形式恰好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万象，让我们来一睹为快吧。

二、海报中的苏联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幅表现“苏联好”的时代的海报作品。标题就是“中苏友好万岁”（1952）（图1），让我们试着解读其中的奥妙吧。



图1

首先，作为背景而特意出现在海报上方的鸽子，很显然是在寓意和平的主题。而这只鸽子通称为“毕加索的鸽子”，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画过若干种此类的鸽子。中国也发行过“毕加索的鸽子”的系列邮票。画中的主人公是两个拥肩而立的孩子，

显而易见男孩是中国儿童，女孩是苏联儿童。而且，女孩双腿微微分开，保持着坚定的站姿，个头也明显高出男孩几分，和男孩略显稚嫩的表情相比，更显出一副大姐姐的气派。由此，二人的上下关系显露无遗。当时被中国人尊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在此画作中化身为值得信赖的、引领着稚气未脱的小男生的“大姐姐”的形象。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副描绘“苏联坏”的作品。海报当中并未直接出现大坏蛋的形象，而是刻画了一位与坏蛋针锋相对、英勇作战的好人形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1971）（图2）正是反映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1969年3月）的海报。



图 2

这幅作品仅仅描绘了一名虽身负重伤仍坚持在茫茫雪原英勇作战的解放军战士的刚毅形象，却深受好评。画面的右上角还标有毛泽东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远处有一辆遭炸毁的战车为背景之外，并不见任何敌人的踪影。在创作海报时，中国人往往不用写实主义，而是借用一些戏剧性的笔法。像柯西金、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人皆是坏蛋之代表，在中国的评论当中屡屡被冠以“狗”的称号，经常被人用漫画手法表现在政治讽刺漫画中。

三、连环画中的苏联

所谓连环画就是袖珍版的漫画、故事画，清朝末期始现于上海。和电影一样，它是民众娱乐的源泉、故事的载体。通常情况下，连环画都是一页一图的漫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认识到连环画是教育民众和搞宣传的极佳材料，因而格外重视，并多次指示应将旧有内容改造为适应新中国发展需要的东西。最近，由于受到日本漫画风的打压，故有老套的东西已经销声匿迹了。

只要翻看上世纪 50 年代的连环画，你就会发现，有关俄罗斯、苏联的作品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不单是儿童文学、童话和画报，就连面向成人的革命战争题材、反特题材等类型的故事也都以连环画的形式刊载发行。另外，像列宁思想这一类型的作品也得以确立。为了介绍苏联的发展，中国人还拍摄了系列摄影作品。

在描绘苏联是友好邻邦的作品中，着力刻画与来华做技术顾问的苏联专家之间的友谊的内容居多。这些专家被描写成一群善良无比的朋友，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的吃苦耐劳，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才智。50 年代初期的作品“苏联专家的故事”、“最可爱的友人——中苏友好故事”等皆是如此。

此外，当时像“女拖拉机手”这样的作品也流行一时。简而言之，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极具典型意义的女拖拉机手的成长经历，她刻苦学习，苦练技术，从一个没有文化、只知艳羡苏联先进的拖拉机技术的女性最终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拖拉机手。实际上，在中国各地，这样的女性可谓人才辈出，她们的形象甚至被印刻在了邮票和钱币上。这些真实事例还被创作成了连环画故事，“女拖拉机手尹阿妹”（1960）中的主人公尹阿妹就曾光荣地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最后还获得了出访莫斯科的机会。

以上介绍的都是面向成人的连环画，其实为孩子们创作的画报也绝不逊色。“女孩子们学飞行”（1960）（图 3）（图 4）采用的并不是连环画，而是画报的形式。



图 3



图 4

该作品比起连环画更符合低龄儿童的需求，虽然它是专为幼儿而作却也不可小觑。

两个小女孩都说想去太阳上旅行，可是当时拥有太空技术的只有美苏两国。于是两个孩子分别去了不同的国家学习。美国的资本家们什么也没教，就召来媒体发射了火箭，结果火箭坠海宣告彻底的失败。而苏联科学家们则是踏踏实实悉心教授孩子各种技术，最后女孩成功地实现了遨游宇宙的梦想。

四、坏蛋国家的宣传铺天盖地

在描写苏联是坏蛋的连环画中，也采用了与海报相同的手法，并没有直接描写苏联人如何如何，而是着力颂扬了与苏联间谍斗智斗勇的公安战士的卓越才智。说到这里，我们不该忽略SF作品^①当中的苏联形象，在这里苏联常常是被当作假想敌来刻画的。可是在教科书当中，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处直接出现“苏联”字样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如“修正主义的叛徒”“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北方某大国”“某霸权主义大国”“熊”等等充满敌意的名词，其影响力可谓达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

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出现在文革结束 SF 作品全面解禁的大背景下，因其刊载在权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而广为人知，此后该作品被改编为多种版本的连环画，甚至还被搬上了银幕。在连环画版本中出现的布莱安其真实身份为某大国的伊万，他和谢浦洛夫将军一起欺骗了某位华侨，利用他来为自己研究激光炮。

叶永烈的“碧岛谍影”（1980）讲述的则是一群暗地里从事秘密活动的“奥罗斯国”的间谍，他们企图盗走中国博士开发的人工钻石制造方法，而精明干练的科学警察们正严阵以待，意欲将其一网打尽。

郑文光的长篇《飞向半人马座》（1979）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火箭基地遭到敌对的超级大国“北极熊”操纵的机器人的入侵，一艘本该向火星运输物资的宇宙飞船“东方号”被发射升空。东方号上恰好搭载了 2 男 1 女 3 名少年儿童和一只小狗。东方号在太空不断地加速前进，直至燃料耗尽，开始以每秒 4 万公里的速度进入惯性飞行。最终，宇宙飞船脱离了太阳系，飞向了半人马座。在此过程中，3 个孩子逐一克服重重难关，在宇宙飞船中茁壮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中国突然卷入了与企图称霸世界的“北极熊”的战争，最终中国大获全胜。当和平再次降临世界时，救助东方号的行动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东方号离开地球 7 年后，从地球启程前往太空营救东方号的亚光速宇宙飞船“前进号”终于发现了东方号的踪影，两船对接成功，重返地球。宇宙飞船进入地

① 英文为 Science Fiction，又称 Scientifiction，简称 Sci-Fi 或 SF，意为科幻作品——译者注

球大气层后，由东向西横跨日本北部，最后在中国安全着陆。

让我们再来看看电影中反映苏联人的镜头吧。

中苏合作的“风从东方来”（1959）讴歌了苏联技术人员与中国人的真挚友情。“熊的足迹”（1977）与“黑三角”（1977）则均是描写公安战士抓捕苏联间谍和卖国贼的精彩故事。“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前面已做过介绍。比较新的作品中有一部是反映中国原子弹开发过程的“横空出世”（1999）。影片涉及到了从中国撤走的苏联技术人员，但并没有给予正面的评价。

从第一友邦突变为敌对国家。于是为数众多的海报和连环画不得不努力驾驭并再现在时代激变的浪潮中颠簸的历史小舟。它们能够追随着政府的方针，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不断地调整方向，真实地反映当年的现状。但是也可以说是那么的幼稚至极，孩子气十足。我们欣赏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作品群像。虽然执笔的是成年人，可是也深深地影响到各个时代的孩子们，他们也在有样学样地认为“苏联好”或“苏联坏”吧。

所谓的政治宣传，历来被运用在各个方面，那么其效果究竟如何呢？下面调查的不是苏联印象，而是日本的恶人形象。我曾经问过许多中国人，他们有的回答说“当时，我是坚信不疑的”，有的则比较冷静，说：“也没全信，只是随大流而已”。还有的人说“我们扮日本鬼子做游戏，度过了快乐童年”。

我想，关于苏联，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记忆吧。时过境迁再忆当年，一定会觉得那些宣传很不理智，然而当年正是这些东西在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我们在看过这些图像捧腹大笑之后，还是不要简单地以为那是发生在遥远的世界里的奇闻为好。

（阎德学 译）

（责任编辑 常喆）

专题文稿：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国观*

阎国栋**

【内容提要】18世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肯定中国传统道德与思想的普世价值，认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典范意义；但她不清王朝在对俄关系中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试图发动对华战争，占领黑龙江流域；她同时又迷恋中国风物，模仿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欲望。叶卡捷琳娜二世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实际上也是当时许多俄国贵族和部分文人中国认识的集中写照。然而，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无论欧洲有多少有关中国的动人传说，无论圣彼得堡建造了多少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园林，都未能动摇其征服中国的野心。

【关键词】俄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 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009-(13)

在俄罗斯对中国认识的历史上，18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西方的中国知识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倡导开明专制以及欧洲和俄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大量传播到俄国，中国开始成为俄国政治文化精英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两国间政治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由俄国扩张政策导致的争议和摩擦也时有发生。京师互市和恰克图贸易使得中俄商品交流达到空前水平。而俄国传教团自1715年来华之后，更成为俄国人学习中华语言、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探听中国政治经济内情的基地。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俄国拥有了更多的中国信息来源或管道，俄国人的中国观更加丰富多彩。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专制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

* 此文为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俄国人的‘中国观’”（08BZS032）、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4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2007JJD770105）阶段性研究成果。

** 阎国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度上代表着俄国的国家意志，而她的中国观实际上也是俄国上层贵族对中国认识的集中体现。

—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置于属于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家的对立面，因为她将 18 世纪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 1744-1818）投进了监狱，又将俄国第一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然而，综观其一生，我们又难以否认，她在许多方面的作为具有显而易见的启蒙意义。其开明不是仅仅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俄国社会进步的行动，“例如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取消专卖制度、设立‘自由经济学会’等等。”^①她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进入了俄国的社会意识，并在后来演变成一种思想流派和社会活动。她不仅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保持着密切的个人交往和书信往来，甚至还邀请狄德罗等人来俄建言献策，赞助其著书立说，鼓励在俄国翻译出版他们的著作。尽管她所提倡的自由只是一种具有恩赐性质的有限度的自由，其底线是不能触及俄国的国家政治形态和贵族利益，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明姿态还是在俄国营造出了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为启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欧洲的中国知识。

在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眼中，中国的精英阶层是由具有高尚儒家道德的文人所组成的，而中国皇帝则是世界上最为开明的君主，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是欧洲国家效仿的理想社会模式。不仅俄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就连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一度考虑借鉴中国完备的君主制度。1778-1779 年间，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出版了译自满文的两卷集《大清律》节译本，引起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重视。女皇对《大清律》节译本并不满足，谕令列昂季耶夫翻译出版内容更加完整的《大清会典》。于是，这部法律文献的俄译本分三卷于 1781-1783 年由俄国政府出资印刷。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耶稣会士们绝少会去翻译中国的律法，而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更重视中国的哲人政治和道德伦理。诚如美国学者玛格斯（Barbara Widenor Maggs, 1936-）所言：“根据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笔者注）的中国书目，18 世纪西欧谈到中国法律体制的只有 1783 年问世的《百科全书》中的‘法理’那一部分，另外钱德明（J.J.M.Amiot, 1718-1793——笔者注）所著《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谈到了中国的法医和法律文献。而

^①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6-121 页。

在俄国，通过列昂季耶夫翻译《大清律》（1778-1779）和三卷本的《大清会典》（1781-1783），中华帝国的许多法律制度得以为俄国公众所了解，而且，这种翻译活动还得到了俄国政府的支持。”^①清朝法典在俄国的翻译和出版，反映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借鉴中国的法律和国家管理体制来完善和巩固俄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女皇对中国法律的特殊兴趣，或许还与中国法律的世俗性质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法律：“从来不要丧失原则和任意妄为，也不应拘泥于成见。要尊重信仰，但万不可使之影响国事，应将一切狂热和迷信的东西清除出枢密院，在各种情况下为社会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稳固国家中华帝国的基础。”^②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国理念中，确定国家秩序并坚持原则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她说：“我们热爱秩序，我们追求秩序，我们要建立秩序并稳固秩序。”^③当然，除了中国的法律，她也重视参考民主政体赖以形成的西欧法律，曾下旨翻译《布莱克斯通英国法律解读》。此书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所著，论述了英国法律的基本原理和英国民主政体的形成基础，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经典。

众所周知，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将中国作为理性和道德的典范加以推崇。在这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受到了影响，她显然相信中国圣人先哲的思想和道德的普世价值以及对于后世的教育意义。这位女皇与其子保罗关系不睦，但对皇孙却宠爱有加。为了将亚历山大大公和康斯坦丁大公培养成理想的储君，叶卡捷琳娜借用中国形象，专门为他们创作了道德训诫故事。她创作的第一部中国题材作品名为《费维王子的故事》，1782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厂出版。这是一则具有浓郁中国风情的童话故事，其主要内容如下：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有一个由中国人陶奥统治的王国。王后善良美丽，却体弱多病。国王和王后相亲相爱，生活幸福，但多年以来膝下无子。朝中大臣列舍梅斯尔从森林中请来了隐居的高士加通，向王后传授了养生之法。王后不仅病愈，而且很快诞下了王子费维。智慧的保姆没有娇惯王子，而是用各种方法锻炼他的体格与心智。费维王子从小就表现出了良好的品质：“他心地善良，有同情心，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恭顺听话，懂得感恩，对父母和监护人十分恭敬。他知书达理，待人友善，不喜争执，不固执，不懦弱，无论何时何地都遵循事实和理性，喜欢讲真话听真话，厌恶谎言，哪怕是开玩笑也不说假话。”为了增

① Maggs, Barbara Widenor. Russia and “Le Re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Oxford, pp. 136-137.

② Шаталов 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Китае в труда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 русски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 век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м.А.И.Герцен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7. С.153-154.

③ Екатерина II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оценках историков / сост. М. Рахматуллин. М., 1998. С.36.

长见识，王子决定离家远游，父王母后极力阻止无果。列舍梅斯尔建议国王在答应王子远游前考验他是否具备了坚韧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王子谨遵父王之命为枯树浇水，明知没有结果却矢志不渝。接着又抵御住了卡尔梅克使臣的利诱和威胁，捍卫了父王和王国的尊严。对企图谋害他的大帐汗国鞑靼人以德报怨，在引起父王震怒后，能恭顺地承受斥责，以顽强的精神战胜病痛。在列舍梅斯尔府上，他善解人意地原谅了主人的迟到，而且力排众议，勇敢地乘坐了简陋的渔船。当有人误传列舍梅斯尔指责自己时，仍能平心静气地虚心接受，相信这位智者的话对自己有益无害。当王子看到一位商人之女寡居娘家神情哀伤时，便将商人送给他的礼物转送给这位女子作为嫁妆。当他听说自己的马夫落马受伤后，不仅亲往探望，而且在靴中暗赠金钱给他疗伤。即便对入侵其国土的金帐汗国，费维王子也能以仁爱之心相待。次年王子迎娶了王妃，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在王子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美名一直流传至今。^①

在这个故事中，有来自中国的圣明国君陶奥、智慧而忠诚的大臣列舍梅斯尔，处处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彰显着道德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下，王子经受了一次次考验，最终成长为一位体格强壮、心灵高尚，具有儒家君子德行的完人。《费维王子的故事》在情节安排上稍显凌乱，好似将各种各样可能体现王子德行的事迹拼凑在了一起，从文学艺术角度看，显然不能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女皇创作这一故事的苦心和她对中国道德价值的推崇却表露无遗。1786年，女皇又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四幕戏剧，由科学院印刷厂出版^②。这一次，她将皇后生病以及王子探访商人之家等情节删除，使主人公形象更加饱满生动。此剧由俄国著名作曲家帕什克维奇（В.А.Пашкович,1742-1797）作曲，于4月19日在圣彼得堡石头剧院首演，演员阵容强大，布景极尽奢华。

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又为皇孙们撰写了《札记卷一：故事与对话》。其中一篇札记篇幅很长，共由90个小节组成，主要记述了与俄国地缘相接或历史上发生过联系的国家地区的逸闻与习俗，而中国又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篇札记的前四节都是关于中国的。第一节介绍的是中俄恰克图互市：“有一个来自中国京城的中国人。他来到位于中国边境的西伯利亚城市恰克图交换商品。他换出的中国货，有生丝、绸缎、茶叶、骨制品、雕刻品，还有瓷器、珐琅偶人、小瓶子、大罐子。他用这些中国货交换俄国的毛皮，如貂皮、狐皮、海狸皮、银鼠皮等。”在第二节中，

① Екатерина II. Сочинени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Пб. 1893. С. 373-380.

② Екатерина II. Опера комическая Февей, составлена из слов сказки, песней русских и иных сочинений. СПб., 1786.

叶卡捷琳娜二世描绘了南京城里的九层宝塔，塔檐上的风铃随风摇荡，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悦耳的铃声。在第三节中，女皇充分肯定中国孝道在儿童良好生活习惯养成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她写道：“在中国，尊敬并顺从父母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美德。在父母没有允许子女坐下之前，子女不敢自行落座。如果父母允许子女和自己同桌用餐，子女不得自行取菜，只能等父母的赏赐，而在接受时总是要表示感谢。”此外，子女在用餐时必须注意自己的举止，背不得靠椅，肘不得撑桌，腿不得摇晃。接下来的第四节讲的是一个中国皇家故事：一位中国皇子生性顽劣，不思上进，而且执迷不悟，屡教不改。无奈之下，父皇将其送至城外，命其为先祖守陵 9 年。皇帝为皇子选择了一处窗口正对着先皇陵墓的房子，令其每日只能阅读讲述先祖丰功伟业的书籍，希望依靠先人的德行感召皇子，使其幡然醒悟，回归正途。在介绍了俄国及许多其他东方国家的物产、风情和人生智慧之后，在这篇札记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 90 节中，这位女皇只写下了一句话，内容又涉及到了中国：“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国，一部分属于中国。”^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叶卡捷琳娜二世显然希望未来的俄国皇帝从小就熟悉中国的物产、风俗，从东方的智慧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而且还要了解两国之间的政治和贸易联系。

叶卡捷琳娜二世用来教育皇孙的中国题材作品并不限于以上介绍的两种。在她 1784 年给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的老师萨尔蒂科夫（Н. И. Салтыков, 1736-1816）拟定的指令当中，要求皇孙们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健全的心智。而美德、礼貌、善行和知识是所谓健全心智的主要内涵。在她规定的皇孙必读书目中，除了以上两部作品，还包括她创作的《中国人论良心》。^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这些中国题材作品也使其跻身于俄国早期儿童文学作家之列。她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中国风”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启蒙文学特点，那就是以体现哲理性和教喻性为首要使命，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形象塑造。这是当时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以宣扬中国道德为主旨的创作方法，素材或灵感大都来自耶稣会士著作或欧人来华游记，形式多为剧本、小说或诗歌。如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查第格》、《巴比伦公主》、《亨利亚德》、《赣第德》、德国魏兰德的《宝鉴亦或浙江之统治者》、英国蒲柏的《荣誉之殿》等。

二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古代圣贤的尊崇并不能代表这位女皇对中国的全部理

① Екатерина II. Сочинени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Т. 3. СПб. 1850. С. 129-131, 168.

② Галахов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нового периода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Том 1. От Петра I до Карамзина. СПб., 1861. С. 294-296, 308.

解。因为在她的意念中，还有另一种占据着更为重要位置的中国形象，并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中俄在此之前已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但俄国政府无视清政府作出的让步，从未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图谋。18世纪中期，俄国公然违反两国协议，挑拨离间蒙古准噶尔部，支持反清叛乱，并收留叛逃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虽几经清政府严词要求引渡，俄国均已各种借口予以庇护，并企图利用其染指准噶尔部领土。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患痘病死于托波尔斯克。即便如此，清政府仍坚持原则，要求俄国归还阿睦尔撒纳的尸骨，直到验明正身才作罢。自17世纪初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奴役，于1771年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此事也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感到颜面尽失并迁怒于中国。此外，为了开辟前往北太平洋沿岸俄国新殖民地的通道，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政府始终将占领黑龙江流域作为重要任务。为了遏制俄国人的挑衅，乾隆皇帝三次下令恰克图闭市，重创了俄国对外贸易和国家税收。面对乾隆朝的强硬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曾试图发动对华战争。

实际上，侵略中国不仅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人之念，也是俄国许多上层贵族和部分文人共同的思想。1763年，俄国科学家和古典主义诗人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为感激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其升官提薪的知遇之恩，为女皇献上颂诗，向中国发出了战争恫吓：

看清楚东方那个国家，
有位傲慢无礼的大王，
坐在那里，想入非非，
人间的大权一人执掌。
厚重的城墙环绕四方，
遥远的大洋成为屏障，
完全漠视外面的天地，
兵多将广也于事无济，
缺乏胆魄便不堪一击，
欧洲昌盛靠的是勇气。

中国，当心灾难就要降临，
不要浪费时间，保命要紧，
竟敢用傲慢激怒你的近邻，
难道不怕俄国人怒气蒸腾？
荒凉空旷的草原并非屏障，

箭矢如雨照样是枉然无用，
这是你的耻辱，无法回避。
恭爱天神之人将获得胜利，
他站在帕尔纳索斯山之巅，
向世界宣告你逃亡的消息。^①

(注：在罗蒙诺索夫的另外一首诗中，他把希腊神话中掌管天文的缪斯女神乌拉尼亚称作“恭爱天神之人”。帕尔纳索斯山传说为阿波罗和缪斯的居住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米勒（Г. Ф. Миллер, 1705-1783）专门起草了一份《关于对华作战的意见》呈送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米勒极力否定《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公正性，声称黑龙江流域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已为俄国人占领，后来在清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出让给了中国。他提出了一整套侵略中国的计划，建议策反蒙古王公，武力夺取所谓的“失地”。他认为中国人是“狂妄自大，权欲熏心的民族”，只有使用军事手段，“中国人那种傲慢的态度将会大受挫折，最后将不得不按俄国人的意志去做。”他蔑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汉人缺乏勇敢精神，“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民族”，而且还对满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说：“现在统治中国的满族人，虽然比汉族人要勇敢一些，但是他们占全中国人口还不到1%，而且满族人由于长期同汉人相处，并接受了汉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所以他们的勇敢也大为削弱了。”^②

1764年8月，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召集格里岑（П. М. Голицын, 1738-1775）公爵、潘宁（Н. И. Панин, 1718-1783）伯爵等7位重臣参加特别会议，讨论向黑龙江流域派遣远征军的问题。^③要不是俄土战争爆发，叶卡捷琳娜二世极有可能挑起对华战争，因为当时她确实“正要着手解决中国问题，已有六个团做好了准备”。俄土战争结束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下令在中俄边境备战，在西伯利亚部署俄国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伺机发动侵华战争。但是，由于清朝在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力日盛，边防巩固，而且防俄之心从未懈怠，而俄国则因连年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兵员不足，无力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叶卡捷琳娜二世才未能立刻实现她征服中国的目标。然而，她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图谋却是根深蒂固的。^④

① 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Ода Всепресветлейшей Державнейшей Великой Государыне Императрице Екатерине Алексеевне, Самодержиц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торою Ея Величество в новый 1764 год всенижайше поздравляет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раб Михайло Ломоносов // 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8: Поэзия, ораторская проза, надписи, 1732-1764. М.; Л., 1959. С. 797-798.

②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3，410页。

③ Трусович Х. И.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ека). М., 1882. С.59-60.

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9-41页。

据诗人杰尔查文 (Г. Р.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回忆说, 叶卡捷琳娜二世生前曾对他说, 她希望在临死前看到土耳其人被赶出欧洲, 也就是说, 俄国的势力抵达世界的中心, 同时希望能与印度建立贸易联系, 或者说, 从恒河中打捞金子, 最后彻底制服中国的傲慢。^①为此, 杰尔查文在 1794 年的一首名为《我的塑像》的诗中写道:

我们占领世界中心,
从恒河中打捞黄金,
制服中国人的傲慢,
好似雪松牢牢扎根。^②

因此, 当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对中国大加赞赏, 并希望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开明、理性和道德等方面效仿中国皇帝之时, 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纠纷频发的时期。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 耶稣会士著作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笔下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与她从与中国皇帝和政府现实交涉中获得的印象相距甚远。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 她多次对后者大肆颂扬中国的言论表示质疑, 并试图向这位法国思想家传递她所了解的中国“真相”。

伏尔泰非常崇拜乾隆皇帝, 并对其诗歌创作才能极为赞赏, 认为他是世界上少有的诗人皇帝。1770 年他在给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 “中国皇帝万岁! 他会吟诗作赋, 与全世界和睦相处。”^③对此卡捷琳娜二世反驳道: “我想……没有理由去跟着我的邻居中国皇帝后面亦步亦趋。尽管中国皇帝会写诗, 尽管您开始爱上了他 (请您不要生气), 但依我看来, 他却没有什么普遍价值。您一定会说, 我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说, 完全不是这样。我不准备用我的罗马鼻子去换那张扁阔的丑脸, 同样也不嫉妒他做歪诗的才能。我喜欢的是您的诗作。”^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同年给伏尔泰的另一封信中还写道: “哎哟! 我的先生! 你为中国说了那么多好话, 以至于我无法不对那个皇帝的诗表示赞许。可是, 根据我和这个国家交往经验, 我可以提供一些证据来彻底粉碎人们所公认的有关他们文明的看法。我能使人们相信, 中国人只是一些粗鲁而缺乏教养的人。因为不想伤害亲近之人, 我要自己保持沉默, 在对传教士们从那里传回来的信息感到惊讶的同时, 却丝毫未予反驳。此外, 还应该说明的是, 我在同统治中国的鞑靼人 (叶卡捷琳娜二世习惯于将满族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称为鞑靼人

① Объяснения на сочинения Державина, им самим диктованные родной его племяннице Е.Н.Львовой в 1809 году, изданные Ф.П.Львовым в четырех частях. Ч.1. СПб., 1834. С.39.

② Державин Г. Р. Сочинения Державина. Т. 1. СПб., 1851. С.221.

③ Перепис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Второй с г. Вольтером с 1763-1778. СПб., 1802. С.177.

④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Вторья с г. Волтером, продолжавшаяся с 1763 по 1778 год.. СПб., 1802. С.190

——笔者注）打交道，而不是和真正的中国人”^①在感到女皇的不满之后，伏尔泰才改口说：“最仁慈的女皇，依我看来，您正在创建世界头号强国。毫无疑问，我将把您置于您的邻居中国皇帝之上，尽管他会写诗，尽管我给他写了信（但他不会读）。陛下将在很多年里独享荣光。”^②

对于伏尔泰要求提供可以说明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证据的请求，叶卡捷琳娜二世在 1771 年 3 月的信中写道：“我的先生！您 2 月 14 日和 27 日的来信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您希望我向您讲一些有关中国人愚昧和粗俗的事情，因为我在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此事。我们是邻居，这您是知道的。我们的边境两侧居住着鞑靼人以及从事畜牧业的偶像崇拜者。这些居无定所的民族极其喜好抢劫，经常报复性地相互偷盗畜群，甚至还掳掠人口。由此发生的争吵需要由两国向边境派出官员来解决。这样您或许以为事情就结束了，其实不然。那些中国先生们都是些无事生非的人，与他们了却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比喝干海水还难。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们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可还是要索取死者的尸骨。他们这样做不是要给予这些死者荣誉，仅仅是出于好斗的本性。这样的琐事成了他们中止贸易 10 年的借口。我称之为借口，其实另有隐情。中国皇帝陛下让自己的某位大臣独家垄断了中俄贸易，中国人和俄国人都对此感到不满。要中断自然贸易联系是何其之难，两个民族出于生计需要，不顾危险，在没有设立海关的地方交换商品。我们就此事向他们发函，收到了几大包纸的答复，文辞糟糕，其中看不出任何哲学精神和政治，甚至言不及义，从头到尾充满无知和粗鲁。这促使我们向他们说明，我们不习惯这样的文体，因为这种风格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被看作是粗野的。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些都是占领了中国的鞑靼人所为。在文明方面，这些鞑靼人完全无法和那里的古老居民相比。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也证明胜者没有为败者教化成文明人，而败者很轻易地效仿了占主导地位的风俗。”^③

由此可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她一方面心仪西欧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却严密监控俄国国内具有启蒙意识的观念和言论；一方面赞成共和学说，同时却又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她对中国的认识同样具有这样的两重性特征，既有将古代中国的治国方式和道德学说理想化的一面，同时又对现实中国大加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后一种认识显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在她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俄国毛皮和工业品的重要

① Перепис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Второй с г. Вольтером с 1763-1778. СПб., 1802. С.177,189.

②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Вторья с г. Волтером, продолжавшаяся с 1763 по 1778 год.. СПб., 1802. С.187.

③ Там же, С.204-206.

出路，中俄贸易是俄国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足以与俄国抗衡的大国，俄国有时不得不为了贸易利益而在中国的宗藩意志面前委曲求全。清朝政府对俄国侵华行径义正词严的申斥，让这位女皇得出了中国人不懂国际外交礼仪，野蛮粗鲁无礼的结论。她不喜欢中国，更不喜欢乾隆，一直在寻找机会对中国发动战争，以解她心头郁积多年的怨气。而她创作的《费维王子的故事》以及其他中国故事不过是这位女皇效仿欧洲文学样式的应时应景的附庸风雅之作，不能完全代表她对中国的认识。

三

18 世纪欧洲人对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风物的兴趣日渐浓厚。中国瓷器上的图案被欧洲人认为是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中国人也努力在瓷器图案的选择和绘制上迎合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西欧国家在其仿制的瓷器产品上也要绘上具有东方风情的图案。模仿中国园林建筑，装饰“中国格调房间”并收藏中国风物成为皇家贵族的一种时尚。在当时的法文中还出现了一个词“*chinoiserie*”，专门用来形容西方艺术中追求中国风格的新气象，翻译成汉语应当是“中国情调”或“中国风”。紧随着欧洲，俄国也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国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由欧洲建筑师设计并主持建造的圣彼得堡园林和宫殿中，随处可见中国房间、中国景观和中国风物。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这些建筑让我们至今还可以听到两个世纪前在俄国帝京奏响的那一段婉转悠长的中国旋律。

实际上，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之前，具有中国韵味的建筑风格就已经由欧洲建筑师之手开始在俄国盛行起来。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建筑师拉斯特雷利（B. B. Растрелли, 1700–1771）1716 年随作为雕塑家的父亲来到圣彼得堡，1725 到 1730 年间在欧洲学习建筑艺术，而后出任俄国宫廷建筑师，设计建造了包括冬宫在内的著名建筑。1747–1752 年他设计了彼得戈夫（夏宫）内的大彼得宫，1752–1757 年在皇村重新设计建造了叶卡捷琳娜宫。他在这两座圣彼得堡郊区最为恢弘的皇家宫殿中都建造了中国风格的房间。此外，他还在 1748–1764 年间设计建造了斯莫尔尼修道院，大门上的高塔就与中国的宝塔有几分相似。在夏宫大彼得宫肖像厅的两侧分别有一个中国屋，装潢设计者为法国设计师瓦兰·德拉莫特（Жан Батист Валлен-Деламот, 1729–1800）。这位建筑艺术家早年在巴黎和罗马学习建筑艺术，1759 年应邀来到圣彼得堡艺术学院任教，同时是皇家宫殿园林办公室成员。他崇尚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圣彼得堡留下了包括“圈楼”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建筑。瓦兰·德拉莫特几乎使用了可以想到的所有中国元素来装饰这两间中国屋，于 1763–1769 年

间陆续完工。屋子的墙上镶嵌着黑底描金的漆板，包裹着色彩艳丽的丝绸，四处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瓷器、珐琅和漆器。在各种物品上面绘制着中国的花鸟、山水、人物和故事。^①繁琐的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眼花缭乱的感 觉，尽管与古朴典雅的中国文人书房风格相距甚远，但并不影响将俄国人的想象带到那个神秘的东方古国。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多名欧洲建筑师和装潢师应邀来到俄国，主持圣彼得堡皇家宫殿和园林的建设，并鼓励他们 将中国风格作为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融入其中。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推动下，欧洲建筑师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将欧洲社会在物质层面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传递到了俄罗斯。正如苏联汉学家费什曼（О.Л. Фишман, 1919-1986）所言：“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大张旗鼓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迷恋中国风物方面也不甘落后。她不仅想向西方展示她的新潮和时髦，而且还要炫耀她的世界主义派头。”^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将奥拉宁包姆（罗蒙诺索夫城）作为自己的行宫，命令意大利建筑师里纳尔迪（Антонио Ринальди, 1709-1794）扩建这里的园林宫殿，于 1768 年建成了著名的中国宫。这是一座典型的罗可可风格建筑，具有鲜明的对称结构。巨大的落地门窗创造出了与花园景色合为一体的效果，其中包括中国大厅、中国小厅和中国卧室三个中国式房间，后被合称为“中国宫”。这三个房间中都采用漆板和丝绸装饰墙面，上面绘有各种中国风情图案，收藏有许多明清时期的瓷器。天花板上是意大利画家创作的一幅大型油画，名为“欧亚联盟”，画面上代表亚洲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共处于天地间。此外，里纳尔迪还是皇村中国剧院的设计者，但监督建造者却是俄国本土的建筑师伊利亚·涅约洛夫（И. В. Неёлов, 1745-1793）。该剧院 1778 年开始修建，一年后即告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座建筑从外观上看给人以朴实无华的感觉，基本上是欧洲建筑的式样，只有翘起的飞檐显示出一些中国楼阁屋顶的味道（这些飞檐在 19 世纪维修时被去掉了）。但是，此剧院的内部装修却完全是中国式的，大量使用中国人、龙等形象，以中国漆板、丝绸、铃铛等装饰，豪华典雅。这里上演的第一场戏是意大利作曲家拜谢罗（Giovanni Paisiello, 1740-1816）的歌剧《德米特里·阿尔塔薛西斯》，第二场便是他的《中国偶像》。

位于皇村亚历山大花园的中国村是卡梅伦（Чарлз Камерон, 1743-1812）与俄国建筑师瓦西里·涅约洛夫（В. В. Неёлов, 1721-1782）在 18 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卡梅伦是苏格兰人，1779 年应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邀来俄国工作。中国村是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一种中国风情建筑，此前在英国、瑞典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已有样板。皇村中

① Ву Ю-Фанг. Китайский кабинет//Философский век.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как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тип. Вып. 10. СПб., 1999.

②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ХIII-XVIII вв.). СПб., 2003. С.404.

国村的中央是一座观象台，其外观基本上按照 1669 年由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名为《中华帝国志》的画册中的中国塔图例设计的。在观象台的四周点缀着 10 座平房，外墙上画着东方风格的图案。对比 18 世纪 70 年代中国村的设计图纸，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景点最后未能建成。如本来计划建造 18 座房子，由回廊相接，另外还要建一个牌坊作为大门，再按钱伯斯(W. Chambers, 1723-1796)在英国为肯特公爵建造的丘园中的宝塔样式建造一座八层高塔。此外，在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中，卡梅伦设计了一间蓝色中国客厅。整个客厅的墙面上都装饰着天蓝色的中国丝绸，清丽典雅，上面房舍、树木、花草、人物、鸟兽一应俱全，一派中国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景象。1770—1780 年间，皇村里先后建造了 5 座桥，至少有 4 座出自卡梅伦的设计。中国大桥位于亚历山大花园入口处，桥上的栏杆被雕刻成花瓶形状，其间用铁铸的红珊瑚枝相连，工艺非常精美。当初这里还有四个中国人的雕像，手执灯笼。龙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上面立着四条铁铸的飞龙。这四条龙形态怪异，身体蜷缩，尾部翘成环状，置于花岗岩台基之上。另外两座中国小桥用生铁铸成，同样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①

18 世纪下半期圣彼得堡具有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宫殿以及其中的装饰和陈设所显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东方异域风情的猎奇心态以及对奢华生活的极度追求，是她中国认识的又一个侧面。这些融合了中国元素的建筑主要出自欧洲建筑师之手，因此完全可以说是欧洲“中国风”在俄国帝京的延续。在建造宫殿之余，这位女皇还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物品用以进行内部装饰。这些瓷器、漆器、丝绸尽管上面也都是中国式山水和人物图案，但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俄国对华贸易而获得的，另有相当数量是欧洲的仿制品。此外，俄国这股以中国物质文化为崇拜对象的“中国风”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主要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到 18 世纪末，随着中国形象在欧洲的逆转，便很快沉寂下去了。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国崇尚理性思辨的哲学、以道德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等，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试图改造欧洲社会的理想样板。在俄国，这种新的思潮曾经得到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响应，并计划在俄国付诸实施。尽管法国大革命促使这位女皇放弃了对开明专制理想的追求，但她对中国人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仍然抱持崇敬的态度，并将这种观念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头脑中，还有一种现实的中国形象，那就是将中国视为俄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向东方扩张的障碍以及发动战争的对象。前一种形象来自西方，是她接受的西方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后一种形象来

^① Там же, С. 481-482.

自东方，是一种在与中国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往来中积累起来的真实观念，是俄国制订对华政策的基本参照。这两种形象尽管相互矛盾，却各不相扰，被她用来达到不同的目的。当然，还有一种中国观念，则完全是对这个神秘而遥远国度物质文化的猎奇与模仿，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建造中国风格的宫殿和园林并装饰以中国丝绸、瓷器和漆器等。历史表明，这样三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曾经同时存在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头脑之中，不仅对她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过影响，而且也对 19 世纪俄国宫廷和贵族的中国观的形成发挥了作用。

【Abstract】 Catherine II of Russia approved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s and recognized the exemplary sense of China's feudal autocratic system. She also resented the Qing Dynasty's "arrogant" attitudes shown in it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tried to launch a war against China and occupy the Heilongjiang River. Meanwhile, she was obsessed with Chinese folk music, imitated Chinese art of living to satisfy her desire for luxury as well. Catherine II'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view of China was actually a focused reflection of many Russian aristocrats and part of scholars' view of China. However, for Catherine II, no matter how many moving stories Europe has about China and no matter how many beautiful Chinese-style palace gardens had been built in St. Petersburg either, they all failed to shake her ambitions to conquer China.

【Key Words】 Russia, Catherine II, View of China

【Аннотация】 Екатерина II в России утверждал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альные и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признавала образцовость 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го строя Китая; была недовольна «высокомерностью» в отношении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к России, пыталась развязать войну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оккупировать течение реки Хэйлунцзян; была влюблена в китайские пейзажи, имитировала китай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жизни с целью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сво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роскошной жизни. Сложное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е мнение и отношение Екатерины II к Китаю было фактически сгущённым отражением понимания Китая множеством русских аристократов и частью ученых.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лично Екатерины II, будь то множество трогательных историй о Китае в Европе, будь т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множества красивых дворцовых сад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тем не мене всё это не смогло поколебать её стремления завоевать Кита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Екатерина II,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я

(责任编辑 郑润宇)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

——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像

刘亚丁*

【内容提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迹可寻，但中俄学者对此都未曾留意。部分俄罗斯作家或直接塑造，或偶尔提及中国文化英雄，如在《秉烛夜游客》和《回归太白》中对李白形象的塑造，以及俄罗斯作家对庄子和老子的曲解。另一些俄罗斯作家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如“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2008》和《阿狐狸》。俄罗斯当代作家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从而回归了俄罗斯18世纪末“中国是‘哲人之邦’”的套话。这既具有当下的针对性，又折射出“新欧亚主义”的观念，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但他们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应低估。

【关键词】俄罗斯作家 中国传统文化 “欧亚交响曲” 《2008》 新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I0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022-(1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亦有迹可寻。部分俄罗斯当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自己的小说诗歌创作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借以想像出自己文学作品中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土人物和奇情异趣。但当代俄罗斯作家创作的包含中国传统

* 刘亚丁，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文化因素的作品，尚未成为中俄学者关注的对象。*

对中国文化英雄的领悟与曲解

一些俄罗斯作家，从浩浩中国文化长河中掬取几滴清泉，将中国真实的历史人物想像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或诗歌的吟咏对象，为俄罗斯文学的人物长廊增添了几许异域风采。最值得关注的是两篇以李白为主人公的作品。

一篇是В.瓦尔扎佩强（В.Варжапетян）的中篇小说《秉烛夜游客》。作者构思巧妙：将李白风流得意的岁月略过不表，径直以身陷死囚囹圄的李白给儿子的“绝笔”作开端，从这里开始倒叙李白平生的几个关键时刻。在作家的叙述中颇多精彩之笔，如李白在高力士家吟诗的场景。这边李白口吟笔录其诗：“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那边高力士说道：“您写罢，在下不敢惊动天上人，天子是敢惊动天上人的。您的信怕是会让天子伤感的。”[†]真是极好的机锋，与李白的诗对照着读，绝对类似禅宗话头。玄宗读罢陈情表果然生出一番感慨：“被冤判死刑者，既请求宽恕，复又对法暗怀幽怨，国有此类人，犹果之有虫豸。莫非天下少一骚客，则歌诗蒙难，诗法溃散？”他的内心话语中最令人拍案的当是：“为文有规必死，治国无法则亡（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есть правила—гибнет литература, 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нет правил—государство гибнет.）”[‡]真正道尽了那个风流天子的威严与智慧。在这篇小说中还广泛征引中国古籍的名句或故实，大都自然妥帖，仅在李白致儿子的绝命书中就有：斥鷃笑鲲鹏、达摩面壁、曹植的《七步诗》等，[§]足见瓦尔扎佩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丰富的知识，有不浅的领悟。

诗仙李白之歿，在中国国内说法不一，或曰醉死，或曰捉月溺死，或曰腾空而去。俄罗斯作家С.托洛普采夫（С.Торопцев）在这几种说法之外，想像了李白回归太白的新结局。在《回归太白》中，李白年迈体衰，潦倒落魄，客居其叔父李阳冰府上。托氏巧妙地将李白的诗歌作品自然地穿插在对主人公行动、情绪的叙述中：一个秋日的黄昏，李白乘车出了府邸，似乎又回到了太白山巅，听到云呼风唤：“西上

* 李明滨、陈建华、汪介之、刘亚丁、阎国栋和查晓燕研究了 20 世纪以前俄罗斯作家对中国形象的书写，К. Пчелицева.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XIX-XX века. Часть I. Волгоград, Перемена, 2005.也只见第一册，即 19 世纪部分；有关近年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参见刘亚丁的论文 Лю Ядин. Образы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1980-2000-х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8, № 3.

† В.Варжапетян.Путник со свечой.//Повести о Ли Бо,Омаре Хайяме,Франсуа Вийоне,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87. сс. 22-23.

‡ Там же, с.28.

§ Там же, сс. 9-13.

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作者继续写李白的思绪：此诗写于他壮怀报国的天宝初年，如今二十载过去了，现在长安是回不去了，对太白山他已作别样观。他携一轻舟，泛舟湖上，似乎将宫廷富贵、人世浮华都抛在了身后，“生者为过客，死者为生者。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华安足珍。”一方面，作者不时烘托非现实的世界，一步步将主人公推向天国：李白来到湖上，是因为他曾做了一个梦，梦里洁白铺天盖地，驱散了黑暗。忽然他又想起曾有个着灰裙白衫的女卜者对他说：“汝身已逝，了无所存。西方仙圣，耀光接汝。”忽然异香盈满湖上虚空。另一方面，作者又要给俄罗斯的读者提供必要的信息，让他们知道李白的结局是如何形成的：兰陵美酒助兴，诗人似乎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似鸛鵒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由于皇帝的恩典，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获赦，返回了金陵。挚友杜甫也在诗中说，梦中不知李白是生是死，仿佛预见到了今天的湖上之行一般。杜甫担心深潭阔浪，那里有会吞噬李白的蛟龙。昨天他刚刚给叔父写了一首诗，就像留下遗嘱一样：“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兰陵美酒将尽，轻风送来天上的蜀乐，托氏就此谱写了最后的“大和弦”：

Две фигуры в радужных одеждах – одна напомнила ему даоса Яна, которого он когда-то провожал в глухие горы Шу (не забыл еще!), – возникли из тьмы инобытия в колеснице из пяти облаков, сопровождаемые Белым Драконом. Они пригласили Ли Бо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ним, чудище пошевелило хвостом, раздвигая облака, и помчалось Ли Бо вверх, будто на высокую гору, туда, где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распался, еще слепя земные глаза, невыносимый свет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ы. Уже через мгновение глаза привыкли, и Ли Бо последним земным усилием мысли подумал, что он, похоже, не уходит, 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两位霓裳使者，一位让他觉得像当年他送进荒僻蜀山的杨道士（记忆犹新！），乘白龙相伴的五云车从非此世的暗黑中出现。他们邀李白同行，那白龙舞动龙尾，腾云播雾，助李白飞升，就像上高山一样，在那里太白庄严地放射着温暖的、不能忍受的光，简直会让肉眼失明。瞬息之后，李白的眼睛适应了，以最后的尘世念头

* С. Торопце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Великой Безил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 16 (5831) 18-24 апреля 2001 г.; Книга о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С. А. Торопцев, Москва, 2002, сс.. 196-207.这两个版本有细微区别。

† Книга о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С.А.Торопцев, Москва,2002, с. 207.

想到，他好像不是离去，而是回归……

作为描写李白的飞升的“大和弦”，托罗普采夫营造了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独特文本：首先，这里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托氏所想像的李白的长逝，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逻辑——与我国僧传中高僧大德圆寂时的“化佛来迎”传说暗合，比如《往生集》卷一载：“齐僧柔学方诸经，惟以净业为怀。卒之日见化佛千数，室内外皆闻异香，西向敬礼而化”；*这里基本的文化元素采自中国传统文化：李白、霓裳、太白、白龙、五云车等等。其二，语言表述方式是极其“俄化”的，托氏使用了带有多种成分的复合句，如两个身影（Две фигуры）本身是个主谓句，但带了多种附加成分，或表示其衣饰“着霓裳（в радужных одеждах）”，或列举说明其中一人像杨道士，再说明其乘的车有“五云（пяти облаков）”，最后还带了一个定语从句——“白龙相伴（сопровожаемые Белым Драконом）”。此外，“白龙（原文是“怪物”——чудище）”以后的句子则更加“俄式”，它自身有两个接续的谓语，此外还有一个副动词短语——“腾云播雾”（раздвигая облака），在该句的末尾还带了一个以“туда, где”为连词的地点从句，这个地点从句本身又自成一个复合句。其三，在表现的超验世界的神圣、光明特征时，托氏似乎又借鉴了但丁和歌德的手法，《神曲·天堂篇》中圣贝拉带但丁窥见神圣三位一体的场景未必没有给托氏创作灵感。因为在托氏的笔下，太白也在光辉中有神格与人格相融汇的模糊形象。《浮士德》尾声中众天使从天而降，迎走了浮士德的灵魂，太白迎李白庶几近之。

依常理，描摹他国文化英雄，小说难工，歌诗易好，但是在当今的俄罗斯作家诗人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在一些描写先秦诸子的诗歌和散文诗中，俄罗斯诗人所写的内容颇有可商榷之处。如只要写庄子，似乎必定与梦和睡觉有关联。今年《山雀》第一期上，女诗人Е. 齐泽夫斯卡娅（Е. Зизевская）发表了一组诗，总标题就是“庄子之梦”，但在该组诗中，那首《庄子之梦》只有草草四句：“假如我和你一起躺下，/我在梦里想吃东西，/而且越来越饥饿，/拥抱我你可愿意？”†И. 叶夫萨（И. Евса）的《春天》一诗的头两节是：“我想成为拖着干枯辫子的瘦小的中国人，/嗓子中发出钟鸣（在他人的语言里），/在矮矮的树林里拣拾枯枝，/临睡之前捧读庄子。”‡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简单联想，难以看出有什么深刻的内涵。作家А. 巴尔托夫（А. Бартов）在散文诗集《西方与东方》中，分别有《伟大的孔子删〈诗〉》和《老子故事·〈道德经〉是怎样构思的》（Рассказы о Лао-цзы. Как была задумана “Книга пути и добродетели”）两章，在后一章中，巴尔托夫一开始就写道：“公元前 481 年冬日。

* 《新修大正藏》，卷 51，第 128 页下。

† Е. Зизевская. Уроки Чжуан-цзы//Зинзивер, 2010, № 1.

‡ И. Евса. Трофейный пейзаж. Харьков, 2006. Е. Невзглядова. Три поэта//Звезда, 2009, № 1.

龙时之始。老子在早晨7点出了自己的茅屋。”后面又洋洋洒洒地写了时辰交替（作者写了所谓东方日历中的“水时”、“火时”等）、春秋轮回、草木荣枯、昆虫蛰振等，然后在最后一节中写道：“2500年前，老子纵目白雪覆盖的精陵山（гору Цзин-линь）顶，回顾走过的山路，决定写易经（решил написать книгу перемен）。”*显然这是张冠李戴，从标题看，作者是想展示老子创作《道德经》的缘起，但从文中的内容看，作者却是以时序自然的变化来表明老子在什么机缘的影响下决定写《易经》的。《易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道德经》，老子成了其作者。当然，我们不必就此苛责俄国的作家。

总体而言，老子、庄子和李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们受到俄罗斯当代作家的青睐，表明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是有眼力的。这些俄罗斯作家所呈现的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与无知曲解相交错，本身也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奇特景观。

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奇幻拼贴

一些当代俄罗斯作家采用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杂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要素，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借以想像出文化交融的虚拟时空。最引人注目者，当数笔名为霍利姆·王·扎伊奇克（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的作者推出的系列小说“欧亚交响曲”（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谢·多连科（С. Доренко）的长篇小说《2008》和维·佩列文（В.Пелевин）的长篇小说的《阿狐狸》。

姑且将扎伊奇克的“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称之为“玄幻公案小说”。目前该系列已经出版了三卷八部（第一卷：《媚狐案》、《胜猴案》、《狄猫案》；第二卷：《贪蛮案》、《游僧案》、《伊戈尔远征案》；第三卷，《不熄明月案》）。在该系列小说中，作者想像了一个巨大的奥尔杜斯（Ордусь）帝国，它是作者生造的一个新词，以金帐汗国（Орда）和古代俄罗斯的名称“露西（Русь）”相叠加，构成了一个新国名。在作者虚拟的历史时空中，13世纪60年代露西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与拔都的儿子议定，将金帐汗国和露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统一的法律。稍后，中国也加入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其东部的首都为汉八里（即北京）、中部的首都是哈拉和林、西部的首都是亚历山大里亚·涅夫斯卡亚（即彼得堡）。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东正教堂的金顶同佛塔和清真寺交相辉映，而且城中心必有孔庙，当

* А. Бартов. 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Знамя. 2007, № 9.

人们遇到精神道德难题时，必定要到那里求教。^{*}系列小说中有两个中心人物：一个是“郎中”、对外侦察局长、剑客巴加都尔·洛鲍，另一个是检察长鲍格丹·鲁霍维奇·欧阳采夫一修。他们搭档，破获了一系列怪案。几乎每部小说都充满了奇异的、不同文化文本的交汇。在各种文化的交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其中。

其一，或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化为人物的内在修养。比如在《狐媚案》中，郎中遇到棘手的案子时，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涅夫斯卡亚的佛光寺（Храм Света Будды），“坐在长老对面的草席上，默诵着《金刚经》，巴格（巴加都尔·洛鲍的简称，——引者注）顿感期待已久的宁静，他的心变得沉静而安稳。”[†]佛光寺的长老宝师子为巴格手书偈语：“此生行善成菩萨，行恶堕狱成狗彘。悯虫疗疾助残老，荣辱苦乐缘人行。”后来他从偈语“荣辱苦乐缘人行”中得到了破案的启发：“他似乎从长老今天的偈语‘荣辱苦乐缘人行’得到了双重的报偿，是谁的行为夺走了幼小的卡佳的生命？”[‡]或在人物心理活动中，自然而然地穿插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胜猴案》中巴格沉思道：“我这是怎么了？！真是见了阎老三啦，这个轮廓分明的麻雀的图画，阿弥陀佛……（Да что с мной？！Какой, три Яньло, членосборный портрет воробья, Амитофо...）”“好大胆的家伙。这真是只孙悟空式的麻雀。我尊敬你。（Смельчак. Воробейный Сунь У-кун. Уважаю.）”[§]

其二，叙述者在讲述复杂的故事时，穿插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在《不熄明月案》中，莫尔杰海·瓦纽欣是奥尔杜斯的原子弹之父。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他企图毁灭地球。在这样纷乱的情节交织中，在叙述莫尔杰海·瓦纽欣的成长经历时，叙述者思考了儒家文化在人伦关系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个体的人，或许可以是聪明的，善良的，无私的，互信的，有远见的……可是谁见过互信，哪怕是有点远见的阿米巴虫呢。阿米巴虫只有一个生命意识：当下的榨取。……通常人们认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道路是加大对个人的尊重的程度，加大对他的需求、趣味和情感的关注的程度。……许久以前，在平等对待国家和人的前提下，孔夫子就形成了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的敬重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为父服务中，学会为国君服务。他教导

* 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 Дело жадного варвара. Дело незалежных дервишей. Дел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5, сс. 6-10. Книги 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а http://lib.aldebaran.ru/author/van_zaichik_holm/.

† 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 Дело лис-обротней. Дело победившей обезьяны. Дело судьи Д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5, с. 43.

‡ Там же, с.44, с.47.

§ Там же, с. 272.

说，从关怀儿子中，可以学会关心人民。”*叙事者试图以当代的观念来阐释孔子的思想。

其三，最外在的方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存在。比如叙述者径直用俄语音译汉语称呼，然后用脚注来说明这种称呼的含义，如“卫兵(выйбин)”、“郎中(ланчжун)”、†“侍郎(шилан)”、“国客(гокэ)”、“宰相(цзанйсян)”‡、“将军(цзянцзюнь)”§等。每部作品的卷首都有引自《论语》的卷首语，但作者以元小说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如《不熄的明月案》的卷首语，据叙述者说是引自《论语》第二十三章：“夫子命弟子以各族人物为戏，任其择角。孟达曰：‘吾扮德意志人。’穆达曰：‘吾扮俄罗斯人。’夫子问曰：‘孰扮犹太人？’众弟子默然。”**叙述者以“翻译者”的名义对该子虚乌有的“论语”题词作了说明。由于这本小说的主题与犹太人有关，题词的戏说似乎就可以理解了。整个“欧亚交响曲”所使用的卷首“论语”题词大抵都是如此的“小说家者言”。同时，“欧亚交响曲”的作者又通过作品后的附录来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不熄明月案》的第二个附录是《论象形字‘仁’》，《魅狐案》的附录是И.阿利莫夫的论文《论中国的狐狸精和李猷民的<西蜀异遇>》。论文的末尾就是他翻译的这篇《西蜀异遇》。《胜猴案》的附录则是维切斯拉夫·雷巴科夫节译的《唐律疏义》。《狄猫案》的附录则是虚构的《论语》第二十二章《韶矛》的注解。可见在整个“欧亚交响曲中”从内到外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俄罗斯作家的另一部作品中也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就是谢尔盖·多连科的长篇小说《2008年》。这部公开出版于2005年、行销于莫斯科、彼得堡大小书店的小说，既反映了与普京属于不同党派的作者††对普京的攻讦式的想像，又弥漫着民众对后普京时代将现危局的忧虑。在小说卷首，多氏申明情节纯系作者之想像游戏，呼吁读者不必对号入座。但主人公终究是政治人物，故作品引人注目。小说从2008年1月7日开始，逐日展开对普京活动的想像，一直写到2月4日。小说以一天为一节，每节都以中国皇历的语汇描述该日吉凶：如1月25日：“年：丁亥。月：

* 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 Дело лис-обротней. Дело победившей обезьяны. Дело судьи Д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5, сс. 141-142.

† Там же, с.16, с.27, с.57.

‡ Там же, с.57, с.225, с.482.

§ Там же, с.149.

** Там же, с.10.

†† 谢·多连科(1959-)记者、电台主持人，1982年毕业于友谊大学历史语文系，2003年9月声称加入了俄共。参见：<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4%D0%BE%D1%80%D0%B5%D0%BD%D0%BA%D0%BE2010-07-27>。

癸丑。日：甲子。木近害水，其气殆尽，是故危殆。”*这部政治小说似是对2008年普京结束总统任期的大选年之预测。《2008年》一开始叙述了普京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私人交往和他在别墅的休闲生活。紧接着，作品就用大量篇幅来讲述普京作为一名道士的修炼活动。四名中国道士在莫斯科河畔之诺沃—奥加罗沃为普京修了练功塔。在李鸣（Ли Мин）、王林（Ван Линь）、周彝（Чжоу И）和许绅（Сюй Шэнь）等四名道士指导下，普京练气功，学汉语。为了跟龙门派的掌门人王列平（Ван Лепин）学道，普京擅离职守。他飞抵俄罗斯的阿尔泰边区，对外声称休假，实则李明和汉学家的陪同下暗中飞抵中国抚顺，跟王列平到暗室练功。作品的结局是：车臣恐怖分子占领莫斯科的一所核电站，并攻占了另外几座城市的核电站。利蒙诺夫的红色青年先锋军攻克克里姆林宫，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普京藏身于莫斯科一处地宫，致电布什，布什声称美国将派兵保护俄罗斯的军用和民用核设施，并占领若干俄罗斯城市使之免受恐怖分子之扰。普京办公厅主任谢钦声称普京滥用职权，违反宪法，私通美国人，宣布成立拯救俄罗斯委员会。

多连科在这部小说中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做文章，大写特写道士的作用，甚至声称普京是天生的道士。对此，可有多种解读，或为赞赏之解读，或为中性之解读，当然还有怀疑之解读。赞赏之解读者自然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广，以至于一个普通的外国小说家，都可以将学道、五行等娓娓道来。但我宁愿做怀疑的解读者，申述理由如次：首先，从小说的情节看，道士们的作用难以恭维。道士们在莫斯科河畔教普京练功，焚烧黄表后，普京遭遇了阎罗王（Янло-ван），阎罗王告诉他：“汝之命运网罗已然编定，汝无力改变它。”†此后普京的兴趣似乎就由政治转向了个人生活领域。叙述者说，1月7日，即普京跟道士练功的日子，是普京脱胎换骨之日，亦当为拯救俄罗斯委员会之纪念日。‡从这天开始，普京四处寻找长寿之方。后来普京离开莫斯科，到了中国的抚顺。当王列平对普京大谈特谈从2003年到2023年的运势之时，正值车臣恐怖分子攻占莫斯科核电站之际。因为不在克宫，普京失去了指挥的良机，当他赶回莫斯科时局势已然失控。其次，从读者的接受心理来看，道士的形象远远谈不上是正面的。不妨设身处地地去猜测一下俄罗斯读者对普京异国拜师学道等情节的接受心理。俄罗斯的读者不会忘记，俄国历史上每每有君王迷恋神秘主义的插曲。曾带领俄罗斯人民战胜拿破仑入侵的亚历山大一世，一度受神秘主义者克吕德内夫人蛊惑，萌生了当隐士的念头。§在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Сергей Доренко. 2008. Москва, Ад Маргинем, 2005, с. 163.

† Там же, с. 26.

‡ Там же, с. 22.

§ 参见亨利·特罗亚：《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迎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十一章至十五章。

的朝廷里，西伯利亚的农夫、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更是如鱼得水，始而凭巫术获宠，继而干预国政，致使民怨沸腾，终被皇亲剪除。^{*}第三，从作者的意图来看，作者对中国道士似乎也不乏影射之意。普京过克宫而不入，克宫内陷入一片混乱，此时有人言道：“这里大人物行走过，沙皇行走过，拉斯普京行走过。”[†]足见，我们不宜一见外国人写中国的事物就盲目喝彩。

第三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是维克多·佩列文 200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阿狐狸——狐狸精圣书》。在这部小说中，名为阿狐狸的莫斯科高级妓女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其经历。据阿狐狸说，“我们狐狸，不像人，不是生出来的。我们来自天上的石头，同《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是远亲。”[‡]她还说，她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在莫斯科“院士”书店里可以买到干宝的《搜神记》，在那里有王灵孝被阿紫狐引诱的记载，[§]这就是阿狐狸之前身。作品还以通信的方式引入了阿狐狸的姐妹叶狐狸和易狐狸的经历。为了增添中国元素，小说的封面还有用毛笔写的中国字“阿狐狸”。在佩列文的短篇小说《中国太守传》、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不浅的领悟，前者包含蚂蚁缘槐的典故，后者中佛教的“空”成了作品的精髓。^{**}在《阿狐狸》中，作者试图在时空交错、人狐转换间揭示莫斯科社会之一角，借此探询存在。但他将主人公定位为特殊职业，毕竟难免身体写作之讥，比起作者的另外两部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向下运动。

在上述这些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不同，作家的意图也各异其趣，但中国传统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融合度已超越了前此的其他时期，它成了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文化拼盘中自然而然的构成因素。俄罗斯作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取向也是比较复杂的，有的美化，有的略为妖魔化，也有的中立化，不一而足。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

近 30 年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像成果不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深有浅，其意义值得我们探究。

首先，俄罗斯当代作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回归了俄罗斯 18 世纪末“中国是‘哲人之邦’”的套话。在中俄开始交往之后的岁月里，俄罗斯的中国想像以三种基本套话相继出现，即 18 世纪末的“哲人之邦”，19 世纪—20 世纪中期

* С. В. Тюкавкин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861-1917.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9, с. 378-380.

† С. Доренко. 2008. Москва, Ад Маргинем, 2005, с. 226.

‡ Виктор Перевин. А Хули. Священная книга оборотня.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5, с. 10.

§ Там же, сс. 11-12. 参见《搜神记·世说新语》，长沙：岳麓书社，1989 年，第 152-153 页。

** 参见刘亚丁：“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俄罗斯研究》2009 年 3 期。

的“衰朽之邦”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兄弟之邦”。*当代俄罗斯作家作品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因而跳过后两种套话，回复到了 18 世纪末俄罗斯所构建的“哲人之邦”的套话。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折射出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新认知。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进行，使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反而成了现代化的促进因素。†“哲人之邦”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成了当下俄罗斯现实的某种参照物。

其次，俄罗斯作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折射出“新欧亚主义”观念。“欧亚交响曲”所幻想的乌托邦天地——奥尔杜斯，既沾润彼得堡汉学家的思想余泽，又呼应莫斯科汉学家的高声倡扬。有学者认为，“欧亚交响曲”中的奥尔杜斯来源于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列·古米廖夫的露西与金帐汗国共生的思想。‡确实，列·古米廖夫的专著《从露西到俄罗斯》的第二章《同金帐国结盟》述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同拔都儿子的结盟：“1552 年亚历山大大到了拔都汗国，同拔都的儿子撒儿塔（Сартак）交好，结拜弟兄，后来撒儿塔成了汗的太子。金帐汗国同露西结盟得以实现，应归功于亚历山大大公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正是古米廖夫这种欧亚主义式的新历史解说，成了“欧亚交响曲”建构乌托邦式的奥尔杜斯国的灵感来源。在当今俄罗斯思想界，新欧亚主义在莫斯科重新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Титаренко）院士倡导。他在若干种书中论及新欧亚主义对于当今俄罗斯的意义，更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总序中写道：“俄罗斯精神的自我反思激活并具体化了新欧亚主义思想。应该特地指出：当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客观的天文事实，是地理学的、人文的、社会的现实。俄罗斯囊括了欧洲和亚洲空间的部分，并将它们结合在欧亚（В. Евразию）之中，因而她容纳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因素于自己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最高级的人本学、宇宙学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合题。”**“欧亚交响曲”的实际作者是彼得堡的两位汉学家——雷巴科夫（Рыбаков）和阿利莫夫（Алимов）

* 刘亚丁：“俄罗斯的中国想象：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厦门大学学报》，2006 年 6 期。

† Б. Поспелов. Ситез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 как факт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5; 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От “Лунь юя” к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му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8, сс. 260-279.

‡ Ольга Белова. Вячеслав Рыбаков. На будущий год в Москве. НЛЮ, 2004, №65. 陈训明：“古米廖夫及其欧亚主义述评”，《俄罗斯中亚研究》2002 年 3 期。列·古米廖夫（1912-1992）是俄罗斯阿克梅派诗人阿赫马托娃和尼·古米廖夫之子，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一生坎坷，著述颇丰，成为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 http://www.erlib.com/Лев_Гумилев/От_Руси_до_России/9/2010-06-10.

**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т. 1, с. 29.

*，他们以自己的系列小说，回应了季塔连科的倡导。应该指出，不管是“欧亚交响曲”，还是新欧亚主义，都不过是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汉学家在俄罗斯民族国家面临新的国内、国际局势时所设计的某种精神文化乌托邦。它们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抉择，是对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精神一体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因素的作用。

第三，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前面已提及，不必一见域外人士写到有关中国的名物就窃喜。对于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俄罗斯作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来辨析其意义。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乃是一种社会想像实践。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指出：“社会想像实践在历史中的多样性表现，最终可以归结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意识形态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的历史运动模式，就建立在离心的超越颠覆与向心的整合功能之间的张力上。”[†]俄罗斯作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像是从其民族国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的语境出发的，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利用，一方面是将其视为乌托邦，以照见自身的缺陷。如上文征引的《不熄明月案》叙述者关于孔子的孝的观念的思索，表达了俄罗斯作家对当下俄罗斯个人与国家关系急剧脱轨而产生的忧思。其实俄罗斯文化一直面临着个体价值与群体、国家价值孰重孰轻的抉择。阿米巴式的“当下榨取”则是作家对当下俄罗斯现实中个体张扬、群体式微的形象概括。因此孔夫子的教诲，就成了乌托邦式的拯救。另一方面，俄罗斯作家书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缺陷，反过来证明他们自身的优越性。在同一部作品中，有个人物谈到对孝的观念的评价：“是太自由了点。坦率地说，这里的行为不完全符合君子的行为方式，即孝与不孝。确实是这样，贵族制教人服从，民主制的公民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随心所欲！在那里不分君子和小人，在那里每个人都得到尊重，因而都是好人。”[‡]显然，这个人物的话语在质疑“孝”的同时，表达了对他们当下现实的肯定。在《2008》中，普京与道士练功和遭遇阎罗王后，产生了追求长生的愿望，他马上召见老年病学专家马利娅·安娜托莉耶夫娜，向她请教长生问题。叙述者写了普京提问前的自由间接引语：“喏，他总不能对她说起自己那些关于五殿阎罗王的反科学的瞎说（Ну, не мог

* Ольга Белова. Вячеслав Рыбаков. На будущий год в Москве.НЛО, 2004, №65, а также информация автора 《Наши звезды: звезда Польша》 Вячеслав Рыбаков, «Нева» 2007, №4.

† 转引自周宁：《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 Хольм ван Зайчик. Дело непогашенной луны. с. 11, с. 176.

же он рассказать ей всю свою антинаучную ахинею про Начальника Пятой канцелярии Яньло-ван.)” *从这里不难看出，俄罗斯作家在某些地方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视为负面的东西，借以增强其自身文化的向心力。尽管这里或许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负面的成分，但终究在客观上起到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另外这也可以起到促使我们反思自己传统的作用。

第四，这些当代俄罗斯作家的背景和文化修养也值得关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 的作家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俄罗斯汉学家，他们率尔操觚，客串一两回作家；另一类是普通俄罗斯作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熟读之，深思之，不免技痒，便拣拾一二发挥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前者如谢尔盖·托罗普采夫（С. Торопцев），他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研究员，李白诗的翻译家、研究家。他在 2004 年曾出版了《太古代风》一书，将李白的五十九首古风翻译成俄文，而且每首古风都有两个译品，其一为直译，其一为诗译。该书的附录中还有托洛普采夫的论文《李白诗歌象征体系中的“羽族”》。†2009 年他又出版了《李白传》，以李白的诗文、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为依据，写出了学术沉思和情感激荡交织的李白评传。‡足见托氏创作以李白为主人公的小说是有深厚底蕴的。再看系列小说“欧亚交响曲”的两位作者。雷巴科夫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其博士论文为《唐代吏治中的法律状况》，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原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人员，1998—2008 年陆续翻译出版了《唐律疏议》。阿利莫夫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其副博士论文为《作为宋代历史文化来源的文人笔记》，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珍宝馆）研究人员，出版有学术著作《宋代笔记中的鬼、狐、仙》。该书从大量的宋人笔记，尤其是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中拈出鬼魂、狐仙和仙等问题加以研究。§显而易见，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的汉学家。他们对唐代法律翻译研究和对宋人笔记的翻译考索，成了他们创作“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的底蕴，也为之提供了想像空间。在作品中涉猎到中国文化元素的俄罗斯作家更多的则与汉学没有直接关系，比如瓦尔扎佩强、佩列文、多连科等等。他们都受到了俄罗斯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化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影响。多连科的《2008》中教普京练功的王列平（Ван Лепин）被称为“道教青龙门十八代传人（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патриарх даосской Школы драконовых врат）”。**2003 年，俄罗斯汉学家Л. 戈洛瓦切娃翻译出版了传记性著作《气功大师之道》。在那本书里，将传主王立平（Ван Липин）称为“道教全

* Сергей Доренко.2008.Москва,Ад Маргинем. с. 46.

† Ли Бо.Дух старины. Сост. и пер. С.Торопцева.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0.

‡ С. Торопцев.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Ли Бо, Поэта и Небожител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9.

§ И. А. Алимов.Бесы, лисы, духи в текстах сунского Китая.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аука, 2008.

** Сергей Доренко.2008.Москва,Ад Маргинем. с.79.

真派青龙门十八代传人（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патриарх даосской Школы драконовых врат пошной истинности）”。*不妨假设，多连科将人物的名字中间换了一个音，另外他对门派的称呼略掉了“全真派”。此外，该书中，1月21日医生和巫师在克宫集会研究长寿之道，会上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卢基扬诺夫大谈葛洪长生术与丹药。†俄罗斯的汉学家E. 托尔钦诺夫（E. Торчинов）1999年出版了《抱朴子》译注，卢将军之高论或许正源自于此。‡因此汉学家的翻译介绍工作是这类俄罗斯作家写作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限于篇幅，不再细述。

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但与欧亚主义者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中俄两大民族的文化传统差异至巨。§唯其如此，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和想像，有助于俄罗斯普通民众理解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俄罗斯的一代代汉学家拿了去，俄罗斯的作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放大了其声响。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已提到议事日程，一些学者也提倡中国文化要“送去”。尽管俄罗斯汉学家和作家的“拿去”，并不等于我们的“送去”，但在文化交往中，在增强和扩大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汉学家和部分作家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至少我们自己“送去”的队伍尚未壮大之时是这样。对俄罗斯作家利用、想像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取向（或美化，或妖魔化，或感情中立化）我们不能直接干预，但在我们制订对外文化推广战略的时候，在构思对俄文化交流的具体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在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前提下，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安排和部署。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a new Russian literature has been under construction and it could be traced from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no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Russian scholars. Some Russian writers either directly shaped or occasionally referred to heroes of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images of LI Bai in "Night Visitors with Candles" and "Back to Tai Bai", or some misinterpret CHUANG Tzu and LAO Tzu. Other Russian writers combine a large number of elements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ussian culture, such as series of novels entitled "Eurasian Symphony", "2008" and "Fox." Russian contemporary writers construct China's image thr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thus returns to Russia's stereotype of "China as

* Путь мастера цигу.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ого Дао. История жизни учителя Ван Липина, отшельника в миру. Пер и пред. Л. Головачевы.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и Аст, 2003, с. 7.

† Там же, сс. 128-137.

‡ Гэ Хун. Баопу-цзы. Пер., комм. Е. Торчин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ербург. востоковедие, 1999.

§ 参见刘亚丁：“观象之镜：俄罗斯建构中国形象的自我意识”，载《跨文化对话》第20辑（2007年2月）。

a state of philosophers” in late 18th century. This not only has immediate relevance, but also reflects the idea of "new Eurasian doctrine". Russian writers have their own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starting points writ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their role in sp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Russia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Russian write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urasian Symphony”, “2008”, New Eurasianism

【Аннотация】 С 80-х годов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роходит процесс появления н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однако ни китайские, н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ёные не обращают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я. Некотор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либ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оздают образ, либо изредка ссылаются на герое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браза Ли Бо в «Ночных посетителях со свечами» и «Возвращении Тайбай», а также неверн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исателями образов Чжуан-цзы и Лао-цзы. Некоторые други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смешивают множество китайских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с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 а также «2008» и «Фок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с помощью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троят имидж Китая, это всё возвращает нас к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му в России 18-го века стереотипу о Китае как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философов».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имеет само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о и отражает концепцию «нового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уществует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проблем и подход к чтению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не следует недооценивать их роль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в Росс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китайская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 «2008», нов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责任编辑 郑润宇)

欧亚地区转型比较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松里公孝**

【内容提要】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一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关键词】半总统制 后共产主义 俄罗斯 乌克兰 摩尔多瓦 亚美尼亚

* 本文系笔者于今年6月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高研班（The Third All-Chinese Advanced Training Course for Young scholars—“Methodology of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上的学术讲演文本，由该中心硕士研究生龙腾协助译为中文，包承柯副教授作第一轮校对，经笔者本人审阅核准。

** 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

导 论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1978年提出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概念,是为了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进行定义。据迪氏所言,该体制的特点是总统民选,而不是由议会选出;民选总统提名总理^①。在1990年代初期,凯里(J. Carey)和舒格特(M. Shugart)将半总统制划分为两个子概念:1、总统一议会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即总理由总统提名并由议会通过。2、总理—总统制(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②,即总理由议会(议会的多数党或者党派联合)提名,然后经由总统任命该提名人。

根据这种概念,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民主国家都选择了半总统制。在32个(被承认和未被承认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德涅斯特左岸共和国)选择了总统制,6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2000年以后的摩尔多瓦)选择了议会制,其余的都选择半总统制。一部由罗伯特·埃尔吉(Robert Elgie)和索菲亚·莫伊斯杜普(Sophia Moestrup)编著的论文集表明,半总统制国家具有的数量优势同样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国家和地区中——民主化进程中的非洲法语国家、葡萄牙语国家以及东帝汶等^③。基于这样的事实,有关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④

而对半总统制概念的主要批判包括以下这些内容:在强调任命总理和内阁的同时,我们或许会低估其他一些决定行政和立法之间关系的因素,如总统所拥有的否决议会已通过法案的权力、议会的再提议权等。而从结果看,学者们所定义的一半

① 迪韦尔热1970年第一次提出此概念的时将“总统拥有强大权力”的情况包含其中,显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对他影响甚大。对迪氏之半总统制概念的发展见 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1.

② Matthew S. Shugart and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Robert Elgie and Sophia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④ 在过去十年中Robert Elgie的研究团队只出版了三卷论文集:欧洲卷(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非欧洲卷(见本页脚注4), 和中东欧卷(Robert Elgie and Sophia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现正准备出版第四卷。

统制的概念过于宽泛^①。

但是，如何任命总理和如何确定内阁成员如果只是影响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普通因素，为什么它们依然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宪法演进进程中被关注的焦点？笔者的回答是，从总理任命和内阁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一个国家的总体政治环境——比如精英的行为和其战略特征、原有体制带来的影响、国家间的相互学习和法理制度的认知（Cognitive Jurisprudence）等。换句话说，半总统制的概念不仅承载了对政治体制属性进行分类的作用，而且还能透过其来窥测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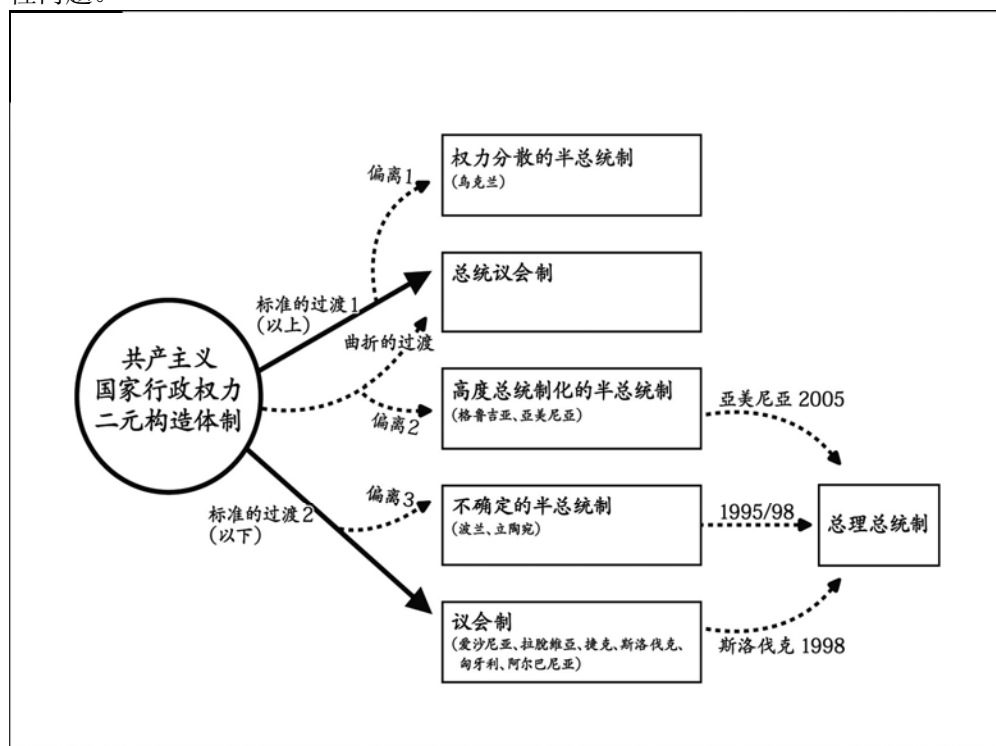


图 1 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分化

图 1 所展示的是从共产主义国家的行政权二元体制（即党委和政府二元体制，Communist Executive Diarchy，以下简称二元体制）向后共产主义国家体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路径分化。依照该图表，笔者将展开该本文的论述。

^① 对此观点最精致的批判见 Alan Siaroff, “Comparative Presidencies: 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idential, Semi-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istin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3, Vol. 42, Issue 3, pp. 287-312.

向总统议会制（标准的过渡 1）

有 6 个案例：中亚四国（除塔吉克斯坦之外）、摩尔多瓦、乌克兰。

前苏联从二元体制到总统议会制的自然过渡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 1990 年春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制定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政策是否能够贯彻落实。他要求这些第一书记们被选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当时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外，该政策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得到了实现。第二次考验是这些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能否在 1990—1991 年间能否被其议会选举成为总统。第三次考验则是他们是否能进而成为民选总统。

那么为什么在后苏联国家，总统一议会制如此盛行？最直接的原因是半总统制和二元体制之间的相似性（即党委与政府关系和总统与政府关系之间的相似）。对此相似性的评述可以回溯到迪韦尔热自己的论述中去^①，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政治学家持此种观点^②。此外，在半总统制下，当需要有人为不受欢迎的政策负责时，总统可以以丢车保帅的方法让总理辞职^③。此外总统还可以通过提名总理的政治方式来规避由失败的议会选举造成的负面影响^④。

但是，总统一议会制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戴高乐主义者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是很容易被各国立法者与改革者理解和应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且包括许多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非洲法语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都选择总统-议会制。现在甚至连土耳其的政治家也在讨论是否应该引进半总统制，或者接近总统-议会制。

① 迪韦尔热指出半总统制与苏维埃行政法体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参见 Maurice Duverger, *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13th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p.115.

② Kimitaka Matsuzato, "Semipresidentialism in Ukraine: Institutional Centristism in Rampant Clan Politics," *Demokratizatsiya* 13: 1 (2005), pp. 45-58; Atsushi Ogushi, "From the CC CPSU to Russian Presidency: The Development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Russia," T. Hayashi and A. Ogushi,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9), pp. 3-25. Eugene Huskey, "Eurasian Semi-presidenti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Kyrgyzstan's Model of Government," Elgie and Moestrup,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Ch. 10.

③ 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参见 Huskey, "Eurasian Semi-presidentialism," p.162.

④ *Ibid*, p.168.

向议会制（标准的过渡2）

中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经历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其民族民主派完全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于民选总统一职即无此需求，也无“人才”可以充任。理论上苏维埃体制的概念乃是议会制。所以当革命屏弃共产党的领导时，其过渡到完全的议会制便成为自然。

总而言之，二元体制分化为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是两种自然的发展路径。

向总统一议会制的曲折过渡

向总统一议会制的曲折过渡有四个案例：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

当时的俄罗斯还不算是向总统一议会制自然过渡的国家，不仅因其存在一些反共中心城市，如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的叶卡捷琳堡），以及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0年5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中获胜，更重要的是因为俄罗斯是唯一没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①

然而大部分没有平稳地从二元体制过渡到总统一议会制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最终会回到这条最具可能的发展道路上去（曲折过渡）。虽然在乌克兰没有“议会选出总统”的阶段，但还是于1991年11月举行了总统选举，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的前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获胜。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尽管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是学者出身，但其在政治上很快就适应了“庇护关系”。并且在1993年的春天就领导吉尔吉斯选择采用总统-议会制的宪法（甚至早于俄罗斯）。

相比而言，1990年代前5年中，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则加强了其向总统一议会制自然过渡的偏离。最终在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见表1）

^① Ogushi, "From the CC CPSU," p. 8. 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存在共和国级的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这是因为俄罗斯被视为苏联中的“老大哥”，它无需设置像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样的“游说”机关。类似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存在共产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而捷克则没有。

表 1 曲折的过渡和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权力机制的分化

| 国 家 | 对标准化过渡的阻碍 | 后共产主义宪法最初通过年份 | 结 果 |
|-------|--|---------------|-------------------|
| 俄罗斯 | 在社会主义时期既没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游戏规则。 | 1993 | 向总统议会制曲折的过渡 |
| 白俄罗斯 | 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执政之前，行政权力弱小。 | 1996 | |
| 阿塞拜疆 | 1992—1993 年民族民主派政府。 1990—1994 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 1995 | |
| 塔吉克斯坦 | 1992—1994 年内战。 | 1994 | |
| 格鲁吉亚 | 1990—1991 年民族民主派政府。 南奥塞梯、阿布哈兹战争 | 1995 | 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偏离 2） |
| 亚美尼亚 | 1990—1997 年民族民主派政府。 1990—1994 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 1995 | |

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偏离 1）

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只有一个案例：乌克兰。

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本身不可能有很多案例，因为通常这种体制只不过是过渡时期权力的不确定性结合，而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体制。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脱离苏维埃式的“似是而非的议会制”的过程中，经历了这种不确定性，并都相对较快地在总统-议会制、总理-总统制和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也就增强了体制的整合性。但乌克兰在其 1996 年宪法中却巩固了“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总统无权解散议会。而在 2004 年橙色革命中出台的宪法修正案却没有明显推动这一体制的发展。

乌克兰政治的妥协性可以解释这种体制的特点。1993 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俄罗斯在尘烟还未散去之时选择了总统一议会制的宪法。这种过程方式对乌克兰这样一个新生国家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十分清楚其缺乏经验的国家建构的脆弱性，所以他们比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更具妥协性。并且由于两国之间存在政治发展的“时间差”，乌克兰可以从俄罗斯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管库奇马（Leonid Kuchma）作为领导人是多么糟糕，但他至少既没有炮轰议会也没有派兵进驻克里米亚。乌克兰这种值得称赞的避免流血的政治文化“副产品”，借用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 的绝妙比喻来说, 就是“宜家目录”综合症 (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但缺少制度逻辑来保持这种效率)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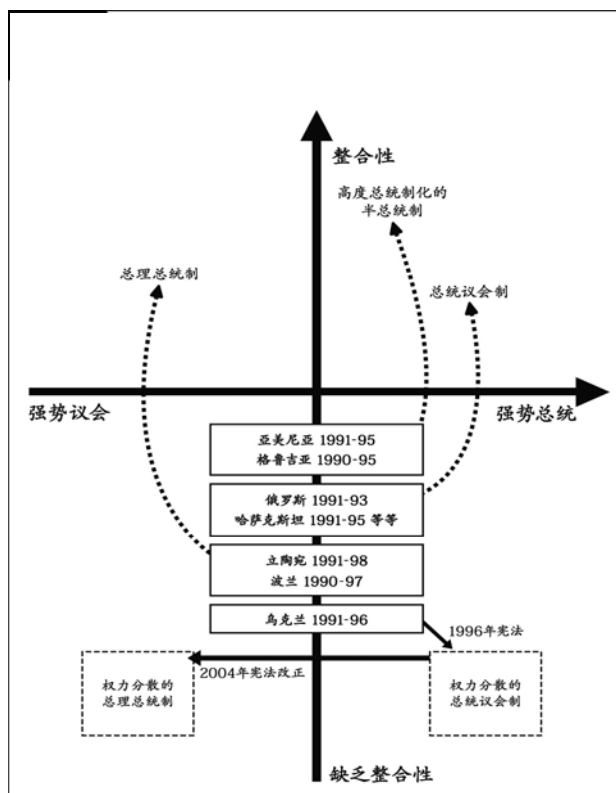


图 2 乌克兰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的特征

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 (偏离 2)

近来有关半总统制的研究重点在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 比如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等国②。在前苏联地区, 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有两个案例: 亚美尼亚 (迄 2005 年) 和格鲁吉亚。在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中, 总统无须议会同意就有权任命总理。这和前苏联地区的其他各国的总统一议会制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在这些国

① Yuliya Tymoshenko, “Nova konstytutsiya Ukrainy: vid paritetu syly do prioritetu prav,” *Dzerkalo tyzhnya*, 30 June – 6 July, 2007.

② 见 Elgie and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pp. 245-246. Alan Siaroff 的 “Category 6”, 包括圭亚那、韩国和斯里兰卡显示出相同的类型 (Siaroff, “Comparative Presidencies,” p. 295)。在上一页笔者称此为 “几乎完全总统制的半总统制” (“almost full presidential semi-presidentialism”) (Kimitaka Matsuzato, “Differing Dynam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cross Euro/Eurasian Borders: Ukraine, Lithuania, Poland, Moldova and Armenia,” *Demokratizatsiya* 14: 3 (2006), pp. 321-323).

家，总统需要议会承认其对总理的提名，虽然当议会重复拒绝总统的提名的情况下总统有权解散议会。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经历了自下而上的革命。1990年由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和特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ian)领导的民族民主派驱逐了共产党领导层。他们造成的精英断层在独联体国家中是个例外。这两个国家在1990年代前期都经历了痛苦的内战，这使得本应处在超然地位的总统不可能从日常事务中脱身。而这种处于超然地位的总统也恰好是总统一议会制形成的条件之一。这些因素终结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由二元体制向总统一议会制的过渡。在这两个国家，总统不仅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行政长官，这对年老的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思考高加索地区“胜者通吃”的政治行为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的出现，却是非常有意思的。

虽然塔吉克斯坦也经历了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相似的内战和严重的精英断层，但1994年塔吉克斯坦宪法却是基于总统一议会制（非高度总统制化）的类型。相较于格鲁吉亚领导人在战后国家重建中忽视分离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塔吉克斯坦领导人对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胜者通吃”）对于内战后社会的危险性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与高加索地区相比，中亚地区的政治精英更好地保留了能够展示其内部团结的共产主义传统。

尽管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表现强势，但是其脆弱性也很明显。首先，该体制看起来就不民主。第二，在这种体制中总统要承担太多管理性职责，这使其非常难以运用丢车保帅（通过撤换总理来保持其支持率）的策略，这样总统就会很容易迅速失去民意支持。

总理—总统制的悖论——乌克兰

图1展示了三种过渡到总理—总统制的路径。笔者省略了从不确定的半总统制（波兰和立陶宛）和从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亚美尼亚）的过渡模式^①，将重点论述以下两个命题：1、总理—总统制的悖论，以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为例。2、斯洛伐克综合症，以2000年后的摩尔多瓦为例。

任何从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到总理—总统制的过渡都试图最大程度地限制总统

① 这些是对笔者有关半总统制分析感兴趣的立陶宛、波兰和亚美尼亚学者及其作品：“Differing Dynam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cross Euro/Eurasian Borders: Ukraine, Lithuania, Poland, Moldova and Armenia,” *Demokratizatsiya*, 14: 3 (2006), pp. 317-345; 和 Kimitaka Matsuzato & Liutauras Gudžiskas, “An Eternally Unfinished Parliamentary Regime? Semipresidentialism as a Prism to View Lithuanian Politics,” *Acta Slavica Iaponica*, 23 (2006), pp. 146-170.

在总理任命和内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该过程完全取决于议会选举结果和议员的主导性。2004 年乌克兰进行宪法改革时甚至要求议员们在议会选举结束后或者内阁倒台的情况下形成议会多数派联盟(宪法第 83 修正案)，因为如果议会只能形成少数派联盟就会让总统有更多的机会介入总理任命和内阁形成。^①

然而总统从来就没有成为议会意志的传声筒，其中原因仅仅是议会选举不一定能够产生明确的议会“意志”，而议会多数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可以继续总理任命的过程中发挥独立影响力。作为从缺乏民主的政体过渡到总理-总统制的产物，政党政治的活跃化甚至增加了总统的博弈机会，例如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后的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

2002 年，乌克兰时任总统库奇马开始意识到，既然他的前任总理尤先科 (Viktor Yushchenko) 在 2004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不可避免，于是他就试图通过修改宪法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以抵消未来尤先科选举获胜将会带来的影响，尽管当时没有成功。但在橙色革命中，与之相似的宪法修正案作为橙色(反对)派和反橙色(亲库奇马)派之间妥协的产物获得了议会的通过。总统实际上被排除在总理任命的过程之外(即乌克兰过渡到总理-总统制)，但是总统依旧拥有极大权力，比如可以任命州长，提名国防和外交部长^②(即乌克兰将继续患有“宜家目录”综合症)。

在橙色革命之前，当乌克兰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总统就任命强势政治人物，如库奇马、马尔丘克(Yevhen Marchuk)、拉扎连科(Pavlo Lazarenko)、尤先科担任总理。而一旦危机得到有效缓解，总统就会任命顺从的实干人物，如普斯托沃伊坚科(Valery Pustovoitenko)、基纳赫(Anatoly Kinakh)取代之前的总理。2004 年宪法修正案使得总理成为总统的当然竞争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总理这一职务政治化了(表 2)。

表 2 总理职位的政治化^③

| | 1992 年—橙色革命 | 橙色革命—2009 年 12 月 |
|-------------------|-------------|---------------------------------|
| 作为总统潜在对手的总理在任期间总和 | 76 月 | 48 月 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 |
| 顺从于总统的总理在任期间总和 | 77 月 | 11 月 尤里·叶哈努罗夫 (Yuri Yekhanurov) |

① 只要有大学本科生水平的论客都知道，在欧洲历史上有四分之一的联盟政府是由少数派联盟组成。联盟政治有助于民主政治稳定运行，因为当议会不存在稳定多数派时，联盟政治就可以提供许多选择。而乌克兰 2004 年宪法修正案终结了联盟政治的这种核心优势——这也是该修正案最严重的缺陷。

② 此外，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与国防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对内阁部长们具有强制力。

③ 至于橙色革命之前的内容，该表根据 Oleh Protsyk, “Troubled Semi-presidentialism: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binet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55: 7 (2003), p. 1080, Table 1 绘制。

2008年尤先科为了使总统权力再次得到强化而试图实施宪法修正。为了以公投的方式推行宪法改革，亲尤先科的法学家们提出了全新的宪法草案（包括很多不必要的修改）^①。因为公投比说服议会通过要简单得多。但这种以“直接民权”的方式来解决政治斗争的企图遭到了威尼斯委员会（欧洲委员会的宪法顾问机构）的严厉批评^②。

与此同时，橙色联盟与反橙色联盟最终全部崩溃。2005年到2009年间，所有内阁垮台或者内阁形成失败的原因，不是橙色联盟与反橙色联盟之间的竞争，而是各自联盟内部的背叛^③。在这种情况下，尤先科总统在任命总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主动性机会。因此我认为，2004年宪法没有使乌克兰总统成为议会意志的传声筒。

如果在2009—2010年总统选举中相互竞争的阵营将各自拥有的地区性支持者动员起来，那么2004年的选战僵局将会重新上演。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电视辩论等竞选活动中，亚努科维奇阵营经常将睿智的操乌克兰语的女政治家（其魅力不逊于季莫申科）推向前台，而季莫申科阵营也会使用同样的“伎俩”（将操俄语的男性政治家推向前台）。亚努科维奇阵营更关注下层人民，强调与季莫申科总理任期内（2006—2007）相比，他将会降低物价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季莫申科似乎将目标定位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政治主动意识的年轻人。较之于5年前，季莫申科的支持者对她寄予了不同的希望。一位在橙色革命中志愿担任“保卫队长”的年轻知识分子表示，“季莫申科比亚努科维奇更加强大。她就像普京，能够在乌克兰建立秩序”^④。总的来说，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东西部地区表现出的明显地区性分裂被2010年的进步与保守的分裂所取代，这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乌克兰第一次总统选举——车诺维尔（Vyacheslav Chornovil）对克拉夫丘克。

在总理-总统制下，尽管季莫申科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她还是可以暂时保留总理职务。而新任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对季莫申科阵营采取分化手段，甚至一些尤先科

① Proekt: Konstytutsiya Ukrainy. Published in *Glavred*, 28 February (<http://glavred.info/archive/2008/02/28/163946-5.html>, accessed on September 16, 2010).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Opinion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Prepared by a Working Group Headed by Mr V.M. Shapoval). Adopted by the Venice Commission at its 75th Plenary Session (Venice, 13-14 June 2008).

③ 比如季莫申科在橙色革命后第一次内阁垮台，是由于她与佩特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国家安全与国防会议秘书长）之间的冲突。尤里·叶哈努罗夫内阁部长名单能够得到议会通过，是因为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的地区政党做了笔政治交易。此外，2006年3月议会选举结束后，季莫申科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季莫申科派、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和社会党（橙色联盟中的左派）的联盟。而该企图失败，社会党最终选择与共产党和地区党结盟，其原因是社会党领导人奥列克山大·莫罗兹（Oleksandr Moroz）被许予以议会主席的职位。而尤先科则通过签署《国家统一令（Universal）》以及提名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候选人与反橙色联盟合作。

④ 2009年12月28日笔者对基辅莫吉拉学院副教授库什纳年科（Volodymyr Kushinarenko）的采访。

的“我们的乌克兰”(Our Ukraine)党党员也不再支持季莫申科。议会通过对季莫申科政府的不信任案。地区党、共产党和“利特温”派形成的政党联盟任命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为新总理。可见亚努科维奇不是一个被动的总统。同时他也不愿意重蹈尤先科的覆辙。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有：第一、任命不可能成为其政治对手的技术官僚阿扎罗夫为总理；第二、亚努科维奇公然主导内阁形成,无视乌克兰宪法关于总理-总统制的原则,他(而不是阿扎罗夫总理)实际上提名新内阁成员。由此看来,尽管尤先科也许希望通过 2008 年流产的宪法修正案使乌克兰重回 1996 年宪法,相比之下,亚努科维奇事实上使乌克兰回到了 2004 年之前的总统-议会制。

摩尔多瓦的斯洛伐克综合症

如果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不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而是拥有某些实际权力,比如否决议会已通过的法案、提名总理、解散议会等,而这样按议会简单多数原则选举产生总统势必会引发出一个逻辑问题,即为何由议会简单多数选举产生的总统有权否决选举产生他的立法机关提出的议案?因此,为了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的权威提升到民选总统的程度,宪法通常会设置更为严格的选举条件,比如议会中五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赞成。但是要想满足这些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斯洛伐克就曾经出现过总统在相当长时期内空缺的现象,从而引发 1998 年的宪法改革,确立了民选总统的体制。摩尔多瓦在 2000 年过渡到议会制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

摩尔多瓦 1994 年宪法规定,总统在提名总理人选时须与议会多数派先行商议(总理-总统制)。而另一方面,这部宪法却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机制来应对总统与议会可能会出现分歧(权力分散的总理-总统制)。摩尔多瓦在 1998—2000 年间,由于总统卢钦斯基(Petru Lucinski)与议会之间的长期对立,导致由共产党和中右翼政党组成的反卢钦斯基联盟对宪法进行修改,使摩尔多瓦成为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沃罗宁(Vladimir Voronin)和其他议员则踌躇于将摩尔多瓦总统变为德国式的象征性元首,并且不触动民选总统拥有的权力。由于议会不能通过简单多数原则选出这样一个强势总统,因此该宪法修正案要求超过五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赞成选举总统。从此,摩尔多瓦长期遭受斯洛伐克综合症的困扰。

在 2005 年选举中,共产党本来仅拥有 56 个议席,但是 11 名原本是共产党死对头的基督教民主党员突然决定支持沃罗宁。虽然基督教民主党没有进入内阁,但是在 2005—2009 年间,它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盟友。结果到 2009 年选举时,基督教民主党丧失了其固有传统和支持者。

2009 年选举前夕,共有四个政党(自由党、由民主党、民主党、我们的摩尔多

瓦党)反对“红橙色独裁”。选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反对党预计共产党将会在选举中出现大规模舞弊。投票结束后,摩尔多瓦选举中央委员会宣布共产党获得50%的选票和60个议会议席,两天后就有暴徒冲入并烧毁议会和总统大厦。

沃罗宁在6月通过解散议会的方式作出妥协。7月份的重新选举中共产党获得的选票下降了5个百分点,仅取得议会101个议席中的48个。反共联盟共获得51%的选票和53个议席。反对派成立了名为“欧洲统一同盟”(Alliance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的政党联盟,自由党领导人米哈伊·金普(Mihai Ghimpu)成为议会主席。因为无论共产党还是“欧洲统一同盟”都没有获得选举总统所需的五分之三多数议会议席,于是金普成为摩尔多瓦代总统。这次宪政出现的异常情况导致公众舆论支持摩尔多瓦回复到2000年以前的半总统制。

有些吊诡的是,摩尔多瓦领导人好像在试图重复尤先科2008年失败的宪法改革。2010年2月,威尼斯委员会建议摩尔多瓦在修改有关总统选出方法的条款时做出限制,即只能通过议会程序对其进行修改(而非全民公投)。3月份的时候,尽管欧洲统一同盟领导人就摩尔多瓦回复到具有民选总统的半总统制达成了共识,但他们还是提议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以此来回避目前宪法上的限制——只能通过议会程序对宪法做出修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金普这位看上去是“欧洲统一运动”(Euro-integration Movement)在摩尔多瓦的领导人却傲慢地表示,威尼斯委员会给出的仅仅是建议而非义务。他好像期望得到两年前尤先科没能得到的威尼斯委员会做出的正面回应(至少不是负面回应)。这可能是因为在摩尔多瓦70%的民众对长期政治失序感到厌倦,因此支持回到半总统制。而尤先科当时试图重新加强总统权威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公众支持。2010年9月5日摩尔多瓦就“是否使摩尔多瓦成为半总统制共和国”的议题再次举行公投。摩共产党呼吁民众抵制此次公投,结果仅有29.6%的具有资格的选民前去投票。

结 论

本文提到过的半总统制的四个子概念是:一、总统一议会制;二、总理—总统制,这两个概念在政治科学领域已经被广泛接受;三、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种类型;四、这篇文章提出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这一新概念。虽然现在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原创性概念,但我确信此概念在将来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理念类型。

本文所描述的宪政制度演进过程也表现出一种跨国家的特征。首先是不同国家政治精英间的相互学习,正如摩尔多瓦领导人经常会谈及(笔者希望他们能认真地

分析)尤先科的失败所表现的那样。目前政治制度变迁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软肋是对“法理制度的认知”(Cognitive Jurisprudence)的关注不够。虽然任何国家的宪政改革者的最初任务都是考察其他国家(通常是邻国)的经验,使用将一个或者另一个国家的经验与普世标准进行比较的通行方法,但却没能认识到国际社会中国政制度的演进过程本身的动力和参与性。

后共产主义国家半总统制盛行的原因是,第一、这些国家的政客官员都已习惯了半总统制与二元体制之间存在的相似性;第二、戴高乐主义者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是容易被理解和应用的,第三、总理—总统制的悖论。从相对缺乏民主的体制过渡到半总统体制没有使总统成为议会意志的表达者,总统反而继续积极地参与到任命总理和内阁形成的过程中;第四个原因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所带来的矛盾,即斯洛伐克综合症;第五、半总统制似乎比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制更民主,并且更能满足那些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民意诉求;第六、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剧场效应”。“走秀政治家”如瓦文萨(Lech Wałęsa)、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帕克萨斯(Rolandas Paksas)、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等,使他们国家的政治可以用来娱乐那些不会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指望这些由沉闷的议会选出的总统,比如扎特莱尔斯(Valdis Zatlers,拉脱维亚)和伊尔维斯(Toomas Ilves,爱沙尼亚),能够“娱乐”我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正在努力引进半总统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国内政治中利用那些在外交方面被证明是成功的“软权力”。然而“半总统制剧场”有时代价太高,例如2010年4月夺走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夫妇生命的空难。

【Abstract】 Semi-presidentialism has become a most vigorous genre of political science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new transitional state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namely, the former Soviet Bloc countries and Frenc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chose this regime typ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diversification between two most natural patterns of transition (to president-parliamentary and parliamentary regimes), a less smooth transition to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s, and two deviational transitions to highly presidentialized semi-presidentialism (Georgia, Armenia until 2005, Nagorny Karabakh until 2006) and contrarily disintegrated semi-presidentialism (Ukraine).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six reasons for the predominanc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particularly its president-parliamentary variant)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 Semi-presidentialism is similar to the communist executive diarchy betwee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2) Gaullist thinking to separate executive power into strategic and managerial functions is easily comprehensible and applicable. (3) Even if a constitution makes parliament the dominant organ in appointing the prime minister, a parliamentary majority does not always take shape as a result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is situation, the president finds abundant possibility to intervene in premier appointment and cabinet formation. (4) Transitions from a system of a directly elected president to a parliamentary president system are often followed by raised requirements for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of a president. This often results in a long presidential vacancy (Slovakia in the 1990s and Moldova since 2009). (5) Popular elections of president look more democratic and responds to the voters' desire to affect national politic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howmanship of politicians in semi-presidential republics made the politics of their countries entertaining for the people, who are unlikely to abandon their ticket to attend this theater of semi-presidentialism.

【Key Words】 semi-presidentialism;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Russia; Ukraine; Moldova; Armenia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ало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актив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поскольку в третью волну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эту систему выбрало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нов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стран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и бывш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и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й). Настоящая статья объясняет причины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амы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после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ереходами (к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ам), менее гладким переходом к премьер-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и двумя отклоняющимися переходами: к «почт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му»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у (Грузия, Армения до 2005 г. и Нагорный Карабах до 2006 г.) и, наоборот, к слаб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му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у (Украин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выделены шесть причин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версии) в после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1)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похоже н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диархию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2) голлист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разделению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и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й функциям легко понятен и применим; (3) даже есл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определила парламент главным органом при назначении премьера,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не всегда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президент находи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процесс назначения премьера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литовский и послеоранжевый украинский опыты); (4) переход от системы прямых выбо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к его назначению парламентом часто требовал повышения условий та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не простым большинством, а тремя пятыми голосов).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ресл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долго оставалось вакантным (словацкий и молдавский опыты); (5) всенародные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кажутся более демократичными, чем ег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и отвечают желанию народа влиять на общ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политику; (6) последняя по очереди, но не по значимости: балаган, характерный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в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является хорошим развлечением для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вряд ли откажутся от своего билета в театр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у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после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я, Украина, Молдова, Армения

(责任编辑 常喆)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 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大卫·兰恩**

【内容提要】自1989年以来，后苏联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沿革轨迹。这些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欧盟新成员国(NMS)、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群体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参与和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作出界定，而这些能力对其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产生着影响。国家群体对于世界体系的特定联系决定了其特定的经济（以及政治）能力和依附水平。通过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投资模式、贸易伙伴和金融依附情况，以及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压力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欧盟的后苏联国家坚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本国的市场及网络，因而其经济自立水平要高于欧盟新成员国。存在着三种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反应方式：更深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一个较少新自由主义色彩而较多协调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对峙力量”和区域集团为标志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体系。

【关键词】转型 独联体 欧盟及新成员国 世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 核心-半边缘体系 外资银行和国家银行

【中图分类号】F114.4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051-(23)

*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中国显然不属于所谓‘后苏联国家’。但在本文中，作者似乎把‘苏联’视为一种国家类型或一种经济政治模式，因而把中国也归于其中。对于这种归类方法，读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本刊对本文标题未作改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编者注”

** 大卫·兰恩（David Lane），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系教授。

一、导 言

在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之后，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采纳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做法，对于其对外贸易、外来投资和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性机构，拥有霸权的世界大国（美国和欧盟大国）试图将界定规范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强加给后苏联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能够促进增长和富裕的最佳经济体系；市场资本主义与经济财产私有制直接有关，而基于趋利动机的完备金融体系则驱使投资实现最强大和有效的资源使用。新自由主义产生效力的必备条件在于资本、劳动力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若以新自由主义的路径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就必须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和稳定的货币兑换率。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所实施的政策包括取消贸易方面的限制和规定，以及去除国家社会主义中相当部分的国家结构和运作程序。新自由主义政策假定：市场越是自由，转型的经济后果就会愈加合理和有效。据称，当国有制约束和共产党控制被释解之时，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接纳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范。这种观点还假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单一类型的国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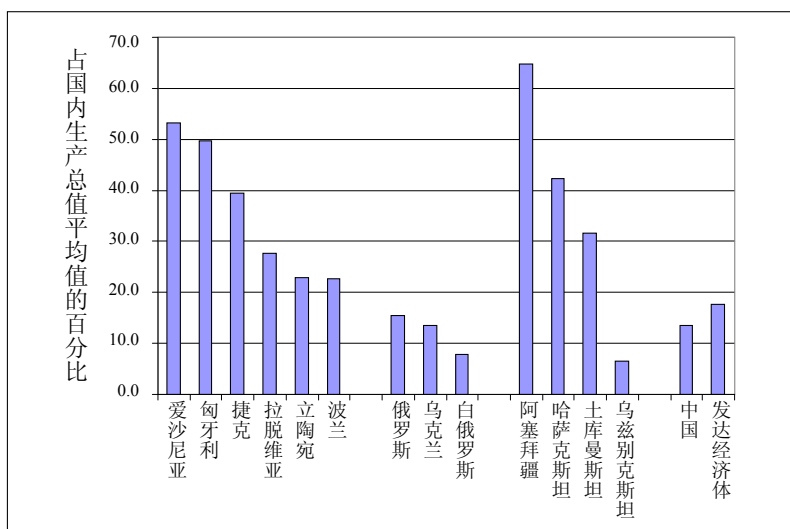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国家因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竞争力水平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后果。本文将比较以下四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沿革轨迹和地位，即欧盟新成员国（集中于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本文第一部分概述外来经济的渗入程度和对贸易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考察这些嵌入的形式对于 2007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后，笔者勾画出不同国家集团的未来发展可能性。

二、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经互会的崩溃和对西方开放市场，资本流入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形式推动发展。这样的投资通过对目的国的外国公司的拥有和控制，将后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联系起来，因而具有重大政治影

^① 比如，贝姆（Klaus von Beyme）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划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情况在欧洲宪政史上前所未有”。Klaus von Beym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Macmillan, 1996, p. 20.

响。这样，这些国家成了世界资本主义阶级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种资本流动的规模相对较小。



资料来源: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FDI, Derived from UNCTAD Statistics,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图 1 1995-2008 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值）

图 1 显示出 1995-2008 年间有关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值)。这些数据表明了在对对象国购买财产和对私有公司投资的情况。^①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包括俄罗斯)的外来投资流量相对较低——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值，但与中国的流量相当。欧盟新成员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外来投资流量很高。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很高的依赖度。

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资源产业的投资甚多，但若考虑到人口因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与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存在着差异。在 2007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前，整个转型时期（1989-2005 年）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外国直接投资

①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 将外来直接投资定义为：对于合伙公司和附属公司而言，外来直接投资流量包括股份净销售和母公司发放的贷款（内含非现金实物，如设备、制造权等等），加上母公司对子公司再投资获利的分成以及母公司内部提供的公司内部（短期和长期）贷款总额。对于分公司而言，外来直接投资流量包括再投资获利增长额加上从外来直接投资者那里获得的款项。外来直接投资负值（反向流动）表明以上细目中至少有一项呈负值，且无法为其他细目的正值所冲抵。外来直接投资额的范围如下：对于合伙公司和附属公司而言，该项数额指可归属于母公司的资本份额价值和储备金（内含留存利润），加上合伙公司和附属公司所欠母公司的债务。对于分公司而言，该项数额是指固定资产价值和现有资产及投资价值，除去应付母公司的款项，但不含欠第三方的债务。

额为人均 2714 美元。其中投资额最高的是捷克共和国，达到 5000 美元。独联体成员国的平均外国直接投资额只有人均 643 美元。^①中国位于这两者之间，为人均 681.1 美元。^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效应要低很多，因此这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也要低很多。中国的再投资利润水平很高，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资本数额巨大，这些都很有意义。

三、跨国公司

外国直接投资在母公司与目的国的附属公司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跨国公司在决定全球一体化程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③包括母公司（设在本国）和在国外的附属公司（设在目的国）。外国公司的渗入程度通过在对象国的投资水平得到反映，所产生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发展（新技术和管理实践）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外国的依赖以及阶级和政治身份的形成。在这方面，后共产主义的欧盟新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以及与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均存在着重大差异。

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有大量外资企业。2005 年，仅匈牙利就有 2.6 万个外资企业。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吸纳了世界上所有外国子公司（2005 年为 286323 家）的约 1/3。独联体成员国的外资企业要少得多，共有 10234 家。其中俄罗斯有 1176 家（2004 年）、白俄罗斯 71 家（2008 年）、乌克兰仅 367 家（2004 年）。俄罗斯吸引了为数不多的大宗投资，其他独联体能源出口国（乌兹别克斯坦除外）的外国投资均居高不下，哈萨克斯坦有外国子公司 2282 个、阿塞拜疆 67 个、土库曼斯坦 60 个。这三国还吸引了数量不大的大宗投资，而在后社会主义的中欧国家和中国，小额投资数量巨大，外资公司分布广泛。^④这表明资本主义公司的渗入导致了这两个地区（国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更大

① EB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ww.ebrd.com/country/stats, 2010 年 1 月上网摘录。

② 用 1980 年—2008 年的流动量 898038 (百万美元) 除以 1318309724 得出此数。引自: Unctad, FDI statistics data base, available at www.unctad.org, (Similar figure 624.4 fr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 to 2007).

③ 关于跨国公司的正式定义是：“由母公司与外国子公司组成的股份制或非股份制企业。母公司是指控制设在其他国家特定经济实体的企业，控制方式通常是持有一定份额的股票资产。”外国子公司是由外国居民通过投资方式组建的股份制或非股份制企业。外国投资人持有股份，获准从事企业的管理运作（持股比例在股份制企业为 10%，在非股份制企业亦与此相当）。在《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WIR) 中，附属公司、合伙公司和分公司均称为外国子公司或子公司。见: WIR 2005, United Nations: Geneva, 2005, p. 297. 需要注意的是，10% 的持股比例是界定“跨国”公司的极低门槛。

④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Geneva, 2009, pp. 222-223. 2008 年数据或可查到最新数据来自各国资料。发达国家子公司总共有 366881 个，世界总共有 807363 个。要注意的是，企业的总数有可能存在着低估的情况，但可用来对不同国家集团进行比较。

规模传播。

外国商业和工业活动在一个国家的比重可以用跨国指数(TNI)来衡量。该指数是取4种比率的平均值：过去3年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百分比、特定年份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特定年份外国子公司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特定年份外国子公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其中高数值指数表示这个国家高度依赖外国公司提供就业和创造产值；低数值指数表示这个国家也许有很多外国子公司，但其国内生产部门创造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2005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加权指数为12，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加权指数为14。^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曝光指数差异很大，日本最低，为1；德国也不高，为7。欧盟新成员国的曝光指数很高：爱沙尼亚为50，保加利亚为40，匈牙利为34，捷克为33，其指数大大高于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爱尔兰与之不分高下（在2007年危机中，该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俄罗斯的曝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为11（虽然2002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失衡，相关指数为18）。乌克兰的曝光指数为22（2004年仅为14），白俄罗斯只有3——为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②中国的相关指数失衡，其跨国指数为12，与发达国家相同。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大多来自该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所谓避税天堂国家（地区）。比如在2005年，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50亿美元，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只有150亿美元。^③（《世界投资报告》并未收录中亚国家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欧洲的3个独联体成员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和依赖程度都远低于欧盟的新成员国。不过，乌克兰的情况值得注意，该国的指数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指数高一倍。当我们考察这些国家的贸易伙伴、外国公司的进入，特别是银行所有权时，其对外依赖的情况便愈加清晰。

四、出口依赖

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可以从其进出口情况中得到显示。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收入十分巨大，那么它就会在经济方面依赖于出口的数量和价格，而那些国内消费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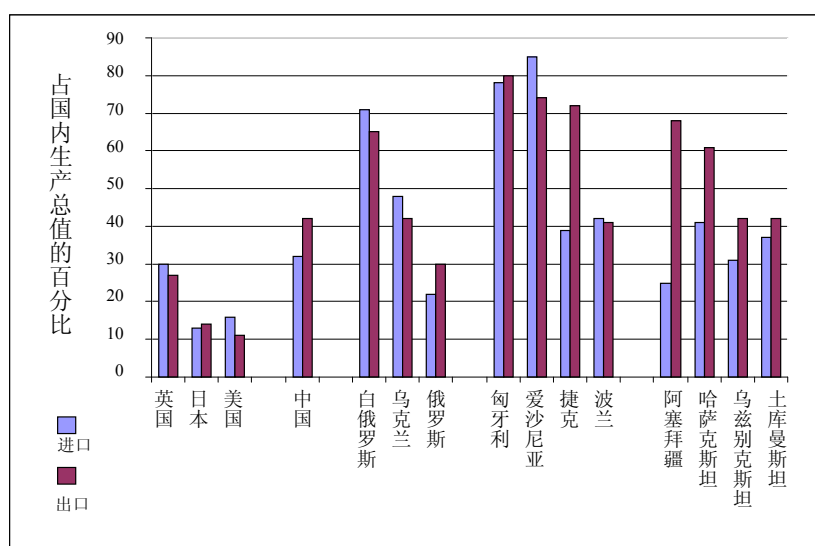
①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WIR) 2008（提供2005年及以后的数据），p. 12。（这些数据并未列入《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亚国家数据缺失。

②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Geneva, 2008, p.12. 中国也处于平均水平之上，为12（2004年只有8）。香港的指数最高，为108。

③ 数据引自，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7, p.403.

足的国家尤为如此。因此，对外贸易的模式和类别反映出世界范围的依附状况。

进出口可以列入国民生产总值（GNP），其指数越高就表示对外贸易越重要。图 2 显示出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不同贸易状况。所列数据也验证了上文提出的观点。欧盟新成员国（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对外贸的依赖特别高，远远高于西欧像英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白俄罗斯的外贸也十分强劲。乌克兰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国（按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连中国都位居其下）。俄罗斯则位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端。与英国相比，俄出口更多但进口更少。中国、俄罗斯和英国都是重要的贸易国家，但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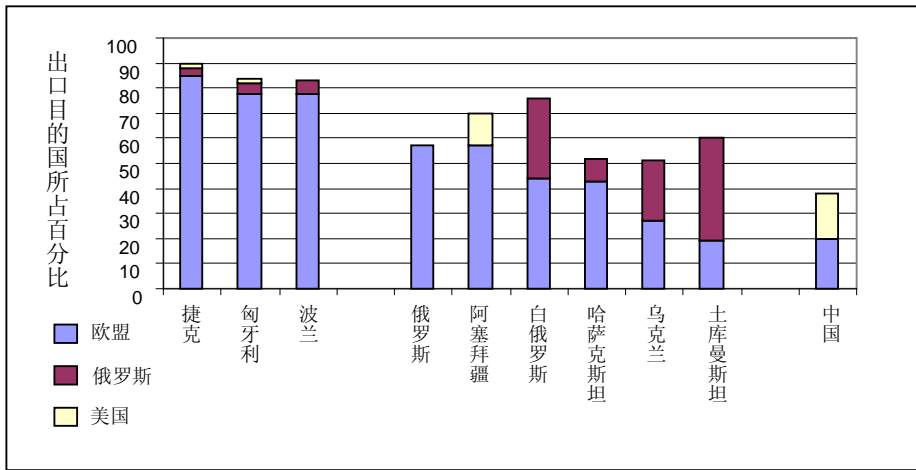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orld Bank, Key Development Data and Statistics, <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 Accessed 9 March 2010. 数据是指货物及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时间为 2008 年或可获取最新数据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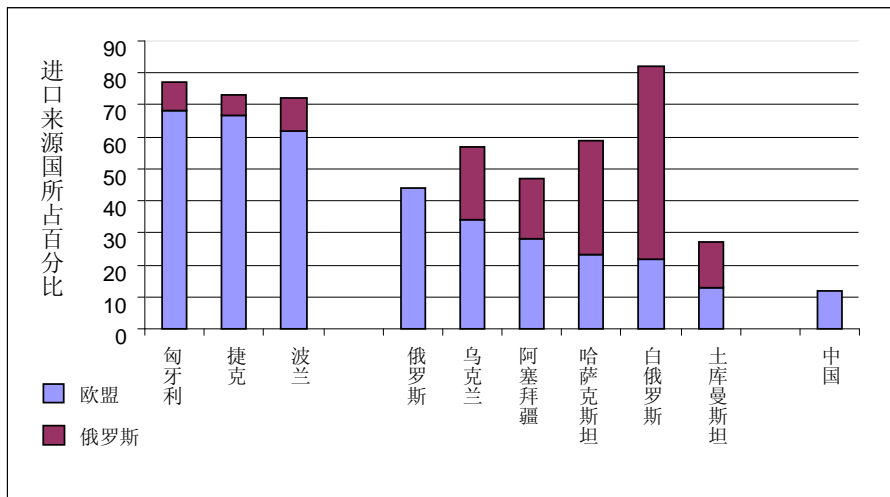
图 2 2008 年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情况表：
部分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中国和西方对比

出口目的国（地区）和进口来源国（地区）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的相互依赖方面的重大差异。图 3A 和 3B 表明欧盟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货物的最大进口者。俄罗斯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的很大比例来自欧盟。不过，白俄罗斯进口的 60%来自俄罗斯。

A. 出口目的国



B. 进口来源国：欧盟和俄罗斯



资料来源：WTO data base,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s>, 2010年1月上网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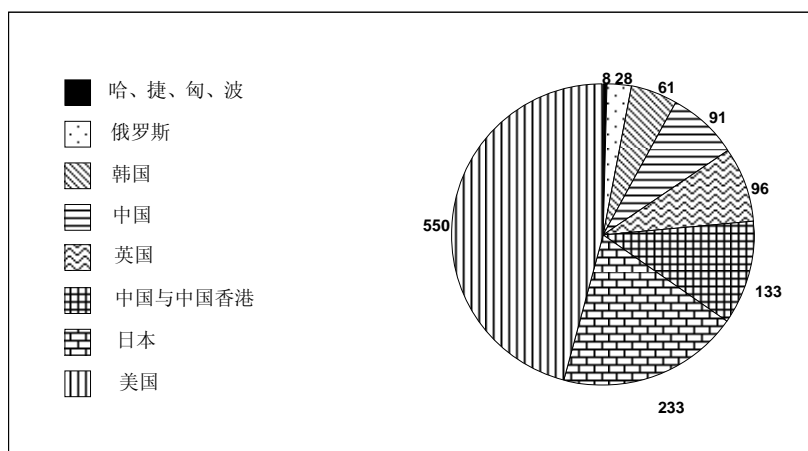
图 3 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

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巨大。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欧盟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 86%、78%和 78%，而对俄罗斯的出口分别为 2.7%、3.6%和 5%。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有关数据与之类似，但对俄罗斯的出口稍高（分别为 15%、10%和 16%）。进口的模式与之相似。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从欧盟的进口额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 67%、68%和 62%，而从俄罗斯的进

口额只有 5%、9%和 10%。波罗的海国家的进口情况也与之相同。^①显然，欧盟成员国身份明显改变了这些新成员国的贸易模式。而独联体成员国不仅与欧盟进行贸易，而且也保持相互之间的强大贸易纽带。中国的进出口更加多样化，但美国作为其出口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

五、金融与非金融股份公司

根据沃勒斯坦(Wallerstein)世界体系论的分析，通过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经济剥削，利润流向了核心国家。设在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是这种利润转移的主要载体。以本国为大本营的母公司从外国子公司及其利润中大获其利。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The American corporation General Electric) 销售额的一半来自子公司，沃达丰(Vodafone, 英国公司)的这个比例为 71%，英国石油公司(BP, UK) 则达到近 80%。^②对于跨国公司所有权的研究，显示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The Global 2000. Forbes, Special Report published 04.08.09. Accessed www.forbes.com/lists/2009.global-09. (联合利华, Unilever, 是荷兰与英国的合资公司。为保持统计的一致性, 本人将所有两国合资的公司各计 0.5)

图 4 2009 年世界 2000 强公司: 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主要国家

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外国子公司主要是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投资建立的。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外情况,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国大公司缺乏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的

① 数据引自: WTO data base,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s>, 2010 年 1 月上网摘录。

②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http://www.unctad.org/en/docs/wir2009>. Annex Table A.I.12. Table A.I.9.

支撑。很少能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能够与西方国家大跨国公司相比拟。《福布斯》编制了世界 2000 强公司名录，每个公司的指数由 4 类因子构成：销售、利润、资产和市值。再次需要指出的是，全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未公开帐目情况的公司未予收录。图 4 列出了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 2000 强企业，并与几家西方国家公司作对比。

欧盟新成员国中只有 7 家公司进入这个名录：捷克共和国的公用事业公司 CIZ 排名第 336 位；匈牙利有两家公司上榜：油气公司 MOL 列第 629 位，OTP 银行列第 748 位；波兰则有 4 家公司载入名录：PKO 银行、油气公司——Pgnin-Polskie 和 PKN Orient、材料企业——波兰 KGHM 铜业，它们的排名分别是第 618、959、1010、1469 位。尽管欧盟新成员在名义上加入了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但它们的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它们由不同种类的经济体构成，其中最发达的是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其大部分先进工业控制在外国公司手中。独联体成员国处于半边地区，拥有大量的原材料开采企业，但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陷入衰退之中。

在独联体成员国中，哈萨克斯坦只有 1 家公司、俄罗斯有 28 家公司列入名录。俄罗斯是在欧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货真价实的世界经济行为体。不过，俄罗斯的上榜情况大致与巴西（31 家公司）和意大利（39 家公司）相当。按行业划分，俄罗斯最大的公司集聚行业是油气业（有 10 家公司上榜），其次为原材料开采生产业（钢铁、铝、金、镍，7 家公司上榜），上榜的公司还有 4 家银行、3 家电讯公司、1 家公用事业公司（UES）、2 家耐用消费品公司和 1 家化学公司（Uralkali）。^① 中国是世界经济中更有意义的行为体，达到世界水平的公司（91 家）与欧洲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英国为 96 家）^②相当。加上香港，中国上榜公司总数上升到 133 家。（当然，许多香港公司创建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并不为大陆公民所拥有）。

中国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俄罗斯的情况也相差不大。两国既受到霸权国家资本的剥削，也运用本国资本获取世界经济的剩余价值。显然，国内的动力反映出 3 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抵触：本国的国际化公司、外国子公司、本国瞄准国内市场资本积累的公司。

六、外国金融渗入

在世界经济中，金融公司在引导投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银行投资“驱动”发展，当然资产投资并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 50 强跨国金融公司中，没有任何一个母公司设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日本有 3 家公

① “The Global 2000”, Forbes.com, Data for 8 April 2009, 2009 年 10 月 6 日上网摘录。

② 行业排名均引自《福布斯》(Forbes list)名录。

司上榜：三菱(Mitsubishi, 第 38 位)、野村(Nomura, 第 40 位)和瑞穗金融集团(Mizuho Financial Group, 第 47 位)。^①占支配地位的金融公司是美欧的注册公司，他们拥有十分强大的金融实力。比如 2008 年美国的花旗银行集团在 75 个国家拥有 723 家子公司，德国的安联公司(Allianz SE)在 52 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荷兰的荷兰银行则在 48 个国家拥有 703 个分支机构。^②那些希望从私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和寻求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转型国家，与核心国家的银行保持着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一个国家与世界金融体系建立关系的直接影响程度如何，取决于外资银行的渗入程度以及本国经济对西方银行的负债程度。当总行(或在当地的分行)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增加了本国信用下降的可能性。人们的预期是这些银行会削减放贷和从目的国撤出资金。2007-2009 年之间，中东欧国家的资本流入每年都大幅度下降，而储备金则大量外流。独联体成员国受到重大影响，2008 年投资流入为负 974 亿美元，2009 年为负 985 亿美元。(见表 1)

表 1 2007-2009 年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成员国直接投资和金融流动表(单位: 10 亿美元)

| 国家 | 项目 | 2007 | 2008 | 2009 |
|--------|--------------|-------|--------|--------|
| 中东欧国家 | 私有金融资产净流入 | 185.5 | 154.7 | 6.4 |
| | 私有净直接投资 | 77.1 | 69.3 | 31.8 |
| | 私有储备金净流入 | -2.9 | -9.9 | -7.5 |
| | 其他私有净金融资产流入 | 111.3 | 95.3 | -18 |
| | 非私有金融资产净流入 | -6.4 | 21.1 | 34.5 |
| 独联体成员国 | 私有金融资产净流入 | 124.9 | -97.4 | -98.5 |
| | 私有净直接投资 | 28.3 | 49.1 | 16.6 |
| | 私有储备金净流入 | 15.8 | -31.3 | 2.6 |
| | 其他私有净金融资产流入* | 80.9 | -115.2 | -117.8 |

* 其他私有净金融资产流入包括资本抽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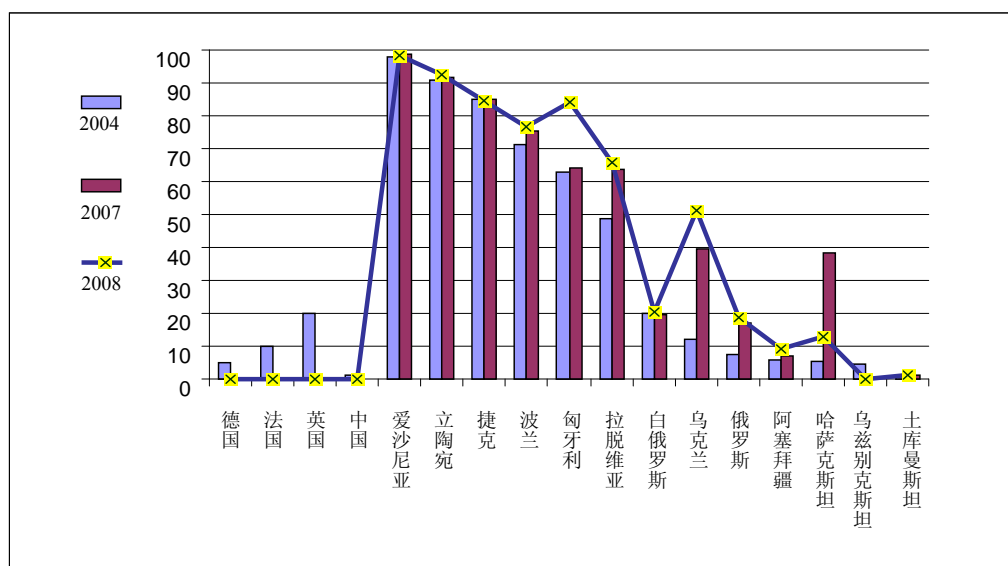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IMF, WEO 2009. Table A13, www.imf.org/external/pubz/ft/weo/2009/02/pdf/tables.pdf

外资银行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严重依赖这些外资银行。正如图 5 所显示的那样，2004 年欧盟新成员国 70% 的银行资产为外资银行所持有(爱沙尼亚的比率为 98%，捷克共和国为 95%)。而在欧盟老成员国，欧元区外资银行资产的持有率平均在 20% 以下，德国和法国还不到 10%。甚至像英国

①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Unctad website, <http://www.unctad.org/en/docs/wir2009>. Annex Table A.I.12, p.234.

② Ibid.

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外国持有的银行资产也只有 20%。^①自从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外国持有银行资产的比率在匈牙利和乌克兰稍有上升，而在哈萨克斯坦则稍有下降。乌克兰自“橙色革命”起就向欧盟新成员国看齐，外资银行持有银行资产的比率明显上升。外资银行在乌克兰持有银行资产的比率从 2004 年的 12.1% 上升到 2008 年的 51.1%。^②另一方面，在白俄罗斯的外资银行的金融资产持有率要少得多，与在亚洲的独联体成员国的情况相似。此外，外资银行在欧盟新成员国的放贷大部分为外国货币（通常是欧元）。



资料来源：EBRD data Base. Structural Indicators (Financial Sector), Ebrd/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stats/sci.xls. Accessed (Jan) 2010. 西欧国家数据（2004 年）引自：Martin Cihak and Wim Fonteyne, “Five Years After: EU Membership and Macro-Financial Stability in New Member States”, IMF Paper, WP/09/68. March 2009, p. 6. 中国数据(2003 和 2005 年)引自：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7. Table 19.2, p. 455.

图 5 2004、2007 和 2008 年外资银行比率表 (占银行总资产%)

俄罗斯并没有进行全面的银行私有化（尽管一些小型外资银行早在叶利钦任总统时就已设立）。因此，外资银行的金融资产持有率相对较低。直到 2007 年底，202 家银行有部分外资参股，62 家银行为外资全资拥有。但到 2008 年，外资银行的数目翻了一番，增加到 108 家（俄银行总数为 1108 家）。^③外资的银行资产持有率由 2004

① M. Cihak and Wim Fonteyne, “Five Years After: EU Membership and Macro-Financial Stability in New Member States”, IMF Paper, WP/09/68, March 2009, p. 6.

② EBRD, Structural Indicators, Ebrd/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stats/sci.xls, Accessed (Jan) 2010.

③ EBRD data Base, Structural Indicators (Financial Sector), Ebrd/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stats/sci.xls, 2010 年 1 月上网摘录。

年的 7.6% 增加到 2007 年底的 17.2%，2008 年再微增到 18.7%。^① 据范加科娃 (Zuzana Fungáčová) 和索兰科 (Laura Solanko) 的研究，外资银行在俄罗斯的运作情况与在中欧国家“截然不同”。^② 在 2007 年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银行已经增加了杠杆作用，但其衍生产品和抵押业务市场则可以忽略不计。

俄罗斯经济由于对外资银行的依赖程度较低，对银行系统的监管也较强，所以比欧盟新成员国具有更强的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俄罗斯的银行数目巨大 (2007 年底为 1243 家)，但大多数银行都规模极小 (2007 年，约 900 家银行只能从事家庭存款业务，只有 300 家银行拥有开展银行各种业务的执照)。范加科娃和索兰科引用 1999-2007 年的资料，指出俄银行的风险率低于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力度更大，而且大型国有和控股银行对于放贷更加谨慎。

中国很好地保持了源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大银行的核心地位。2005 年，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总资产的 52.5%，股份制银行拥有 15.5%，各城市商业银行只拥有 1.4% (2003 年与 2005 年的情况几乎相同)。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家持有比例也很高，如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③ 中国的贷款客户比俄罗斯的贷款客户更依赖国有银行。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受到冲击：大量投机性信贷涌入，但在经济衰退中受挫，银行坏账增多。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资本不足的银行，其大量贷款均为外币贷款。^④ 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是件好事：当目的国货币贬值时，这些银行能够确保按本国货币收取的利息不受损失。比如 2009 年第一季度欧盟新成员国只有 35% 的贷款是目的国货币贷款，而拉丁美洲国家的比率是 55%。^⑤

有关债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看外资银行的贷款水平如何。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在对象国的投资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涉及到资本投资和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借贷方需要偿还外国银行的贷款。图 6 将 2007 年 9 月-2009 年 3 月的一些独联体成员国和欧盟新成员国的外债加以合计，再除以相关国家 200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指数显示出相关国家在对外资银行债务方面的对比情况。欧盟新成员国的债务水平高于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2004 年橙色革命以来，由于尤先科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乌克兰的债务大幅度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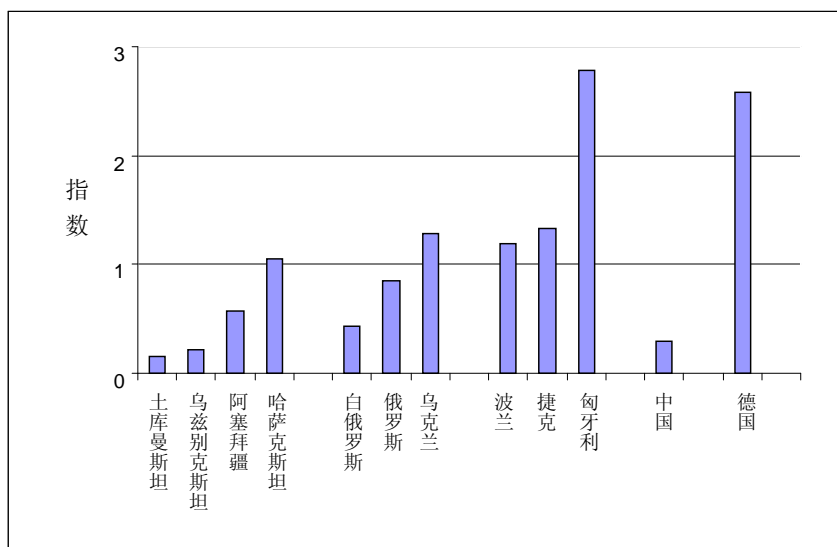
① Ibid.

② Zuzana Fungáčová and Laura Solanko, “Risk-taking by Russian banks: Do location, ownership and size matter?”, Bank of Finland (Bofit), discussion paper, 21/2008, p.13.

③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able 19.2, p. 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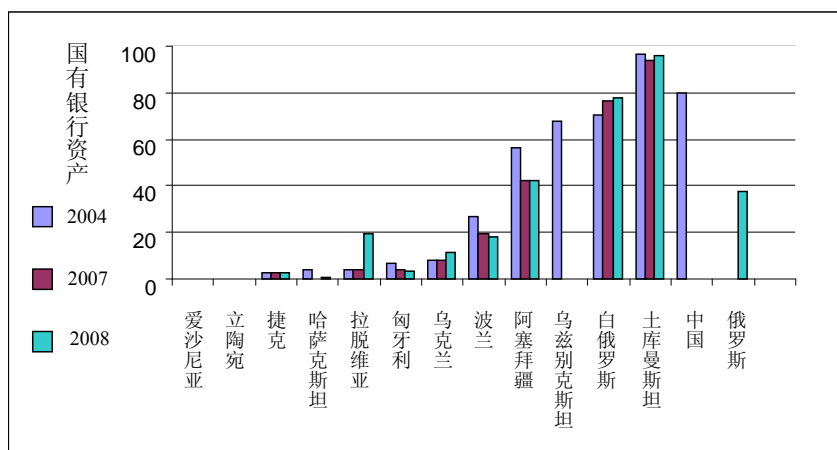
④ Cihak and Fonteyne, p.29.

⑤ IMF, WEO for October 2009, Box 1.2, p. 12.



资料来源：“Cross loans BIS reporting”，derived from data base located at: http://www.jedh.org/2007Q3_2009Q2.xls and GDP from World Bank, <http://ddp-ext.worldbank.org>. 所有贷款均相加，以得出一个固定指数。

图 6：2007-2009 年债务国外债指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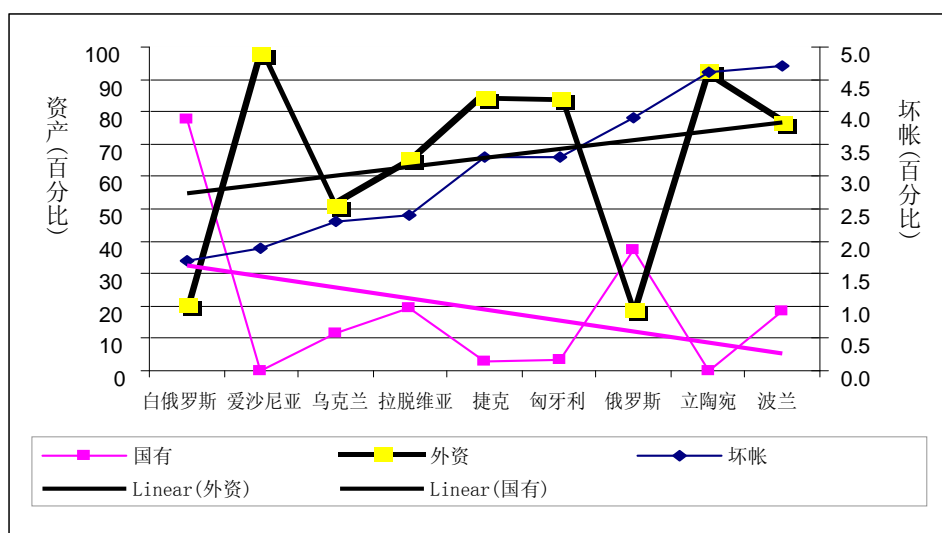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BRD data base, Structural Indicators (Financial Sector). Ebrd/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stats/sci.xls. Accessed Jan 2010. 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的缺失年份均无数据可查。中国 2005 年数据引自：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able 19.2 p. 455.

图 7：2004、2007 和 2008 年国有银行占银行总资产比率表

国有银行是政府用来稀释和抵消市场力量——包括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一种工具。独联体成员国不仅外资银行的数目要少得多，而且国有银行的数目要多得多。在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国家持有 65% 以上的银行资产。其

他国家持有银行资产比率较高的是阿塞拜疆（2008 年为 40%）和俄罗斯（2008 年为 38%）。在另一端，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持有银行资产的比率只有不到 10%，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由于在金融危机中对即将破产的银行实施国有化，因而增加了国家持有银行资产的比率。至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它们的情况形成对照，其中乌克兰的银行私有率居高不下。



数据来源：EBRD data base, Structural Indicators (Financial Sector). Ebrd/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stats/sci.xls. Accessed (Jan) 2010. 注：乌克兰的坏账比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比此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高得多。见：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09, 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2109. 坏账情况：国有银行为负关联度 (-.33)；外资银行为正关联度 (+.23)。

图 8：2008 年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坏账、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为情况表

那些外资银行比率高、国有银行比率低的国家，坏账的发生率也高。图 8 的右轴标出了坏账占贷款总额的百分比，左轴标出了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拥有银行资产的百分比。在欧洲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那些国有银行比率高的国家发生银行破产的风险较低，而外资银行比率高的国家发生银行破产的风险较高。2008 年，贷款坏账与外资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23，而贷款坏账与国有银行的关联度是负数(-.33)。这就是说，国有银行的比率越高，坏账的比率就越低；外资银行的比率越高，坏账的比率就越高。然而，俄罗斯虽然外资银行的比率很低，而且国有银行的比率很高，监管力度也大，但发生坏账的风险比人们预期的要高。尽管俄罗斯在 1998 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对银行业的控制，但私有银行仍然愿意承担巨大的金融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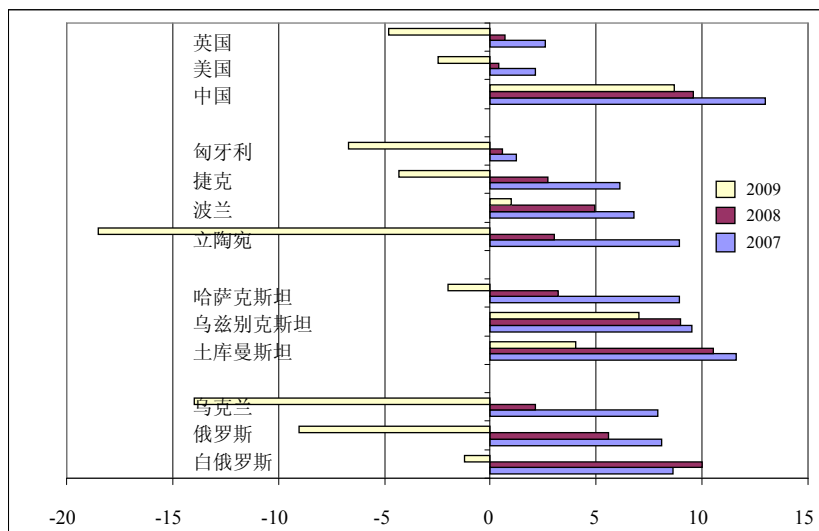
这些结果使人们对以下假定表示怀疑：外资银行比国有银行更易导致金融风险。正如我们所知的 2007 年经济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许多银行受到驱使去开展高风险的

投机业务，以获取高利润和高红利。

七、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2007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了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相互依存的水平。“世界危机”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经济萎缩、利率下降和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和信贷的减少。

在《世界经济展望》（2009 年 10 月版）中，^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世界产出的增长已经从 2007 年的 5.2% 降至 2008 年的 3%，并将在 2009 年进一步下降。然而，世界产出增长的下降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尽管所有国家都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发达国家（至少在初期）受到的影响要比新兴和发展中地区大。后共产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下降，但都一直保持正增长率，直到 2009 年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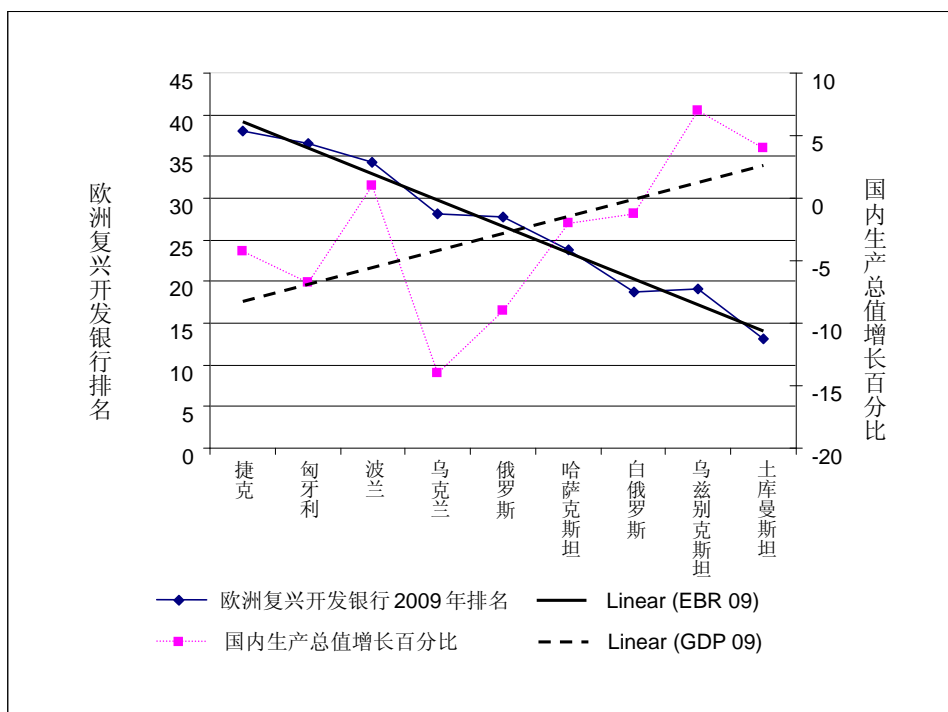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or October 2009, IMF: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9, Statistical Appendix, Tables A2 and A4 (Real GDP),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 2009 data WEO update January 2010, Table 1.1. *China. GDP growth, World Bank Data Base ddp-ext, except for 2009 where WEO update (January 2010).

图 9 2007、2008 和 2009 年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英国、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变化，逐年计算）

图 9 显示了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美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9),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

国和英国曾在 2008 年出现大幅下降，并在 2009 年陷入负增长。欧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欧洲的独联体成员国，在 2007 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并且在 2008 年保持超过 5% 的正增长率。然而，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增长率下降 10% 以上，俄罗斯和匈牙利下降的幅度在 5% 以上，白俄罗斯则在 2009 年出现小幅下降。独联体的中亚成员国（哈萨克斯坦除外）和波兰避免了负增长；中国的增长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但仍然保持正增长。



Pearson $r = -(\text{minus}) 0.51$

EBRD transition index (sum of indexes) and GDP change 2009

资料来源: Процесс перехода и показатели стран СНГ и Монголии в 2009г, London: EBRD 2010, p.9. 每个国家总排名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评分。捷克共和国没有出现在 2009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排名表上，因为不被认为是转型国家，因此给予最高得分 (38)。

图 10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排名与 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表

那么，2009 年造成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不同下降的因素何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以及银行的贷款政策。我们可以作出假定一：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外国银行就越多，而国内贷款发放越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下降幅度就越大；假定二，外国贷款越少，银行的国有化程度就越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下降幅度也越小。我们将在以下的图表中探讨这些假定。

图 10 运用多种世界性变量绘制出 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后共产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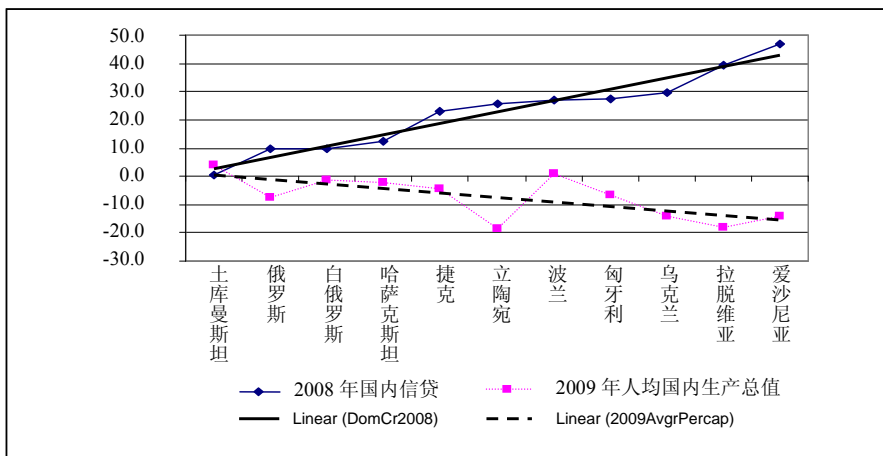
义国家在不同层次上参与世界经济，而且有不同的资本主义框架结构，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图 10 左轴基本上按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标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转型排名^①，右轴绘制了 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使得欧盟新成员国更不稳定，2008 年至 2009 年 1 月间货币大幅度贬值：兑换美元的汇率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下降近 20%，在白俄罗斯下降 23%，在捷克共和国下降 32%，在波兰下降 41%，在乌克兰下降 42%。相比之下，英镑汇率下跌 29%，欧元下降 29%。^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因为能源出口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现财政大幅紧缩。外国投资者抛售那些预期会下跌的股票。这种货币贬值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同时刺激了国内产业。然而，俄罗斯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减轻了许多不利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损失来自它们对发达经济体投资价值的下降，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股票价格出现了巨幅下跌。

我们注意到，国内的家庭贷款（包括抵押贷款）成为 2007 年之后的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图 11 显示了欧盟新成员国和独联体主要成员国之间的 2008 年国内信贷水平和 200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关系。通过选取后一个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值，我们可以估算国内信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数字呈高度的负关联度，即 2008 年国内信贷水平越高，200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就越低。那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直线下降的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匈牙利，乌克兰）均有非常高的国内信贷水平，而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国内信贷水平较低，因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下降幅度也较小。在金融危机时期，欧盟新成员国和乌克兰的金融化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银行不仅为企业投资提供贷款，而且还为投机获利提供资金。

①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8: Growth in transition. Russian edition accessed at <http://ebrd.com/pubs/econo/tr08.htm>. 该指数将政府消费作为总消费的一部分，指数因子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转移和补贴比例，国营企业的数目、构成及产出份额，政府占总投资的份额，价格控制情况，最高边际税起征点（top marginal tax thresholds），征兵制的服役期限和实施，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外币银行帐户使用情况，汇率控制，财产没收的风险，政府取消合同的风险，国际贸易税收收入，关税税率变化情况，非关税限制覆盖的贸易部门份额，贸易业的规模，私有银行所持的银行存款比例，私有企业占国内信贷比率，市场力量确定利率的程度，外资进入国家资本市场情况等。从以下资料归纳：Appendix 2, Explanatory Notes and Data Sources, EBRD, Transition Report 1999 (EBRD: London 1999, p.24)。在解释这些数据时，人们应该注意，某些国家的私有公司中可能仍然存在着相当比例的国家控股情况，其中大工业公司尤其如此。对于其他指数见：Philip G. Roeder, “The Revolution of 1989: Post commu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lavic Review*, 1999, Vol.58, No.4.

② Ведомости. 2009. 2 февраля. 引自：Julian Cooper (Birmingham University) circulated paper, April 2009.



2008 年度是指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9 年度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百分比。2008 年国内银行信贷和 2009 年的人均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联度呈负值 (-.71)。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or October 2009, IMF: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9. Statistical Appendix, Tables A2 and A4. (GDP growth rates). Domestic credit, EBRD Structural Indicators, www.ebrd.com/country/sector/stats/mpfdi.xls, (Domestic credit), 2010 年 2 月 10 日上网摘录。

图 11 11 国 2008 年国内信贷和 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表

具有高跨国性指数的工业出口国的经济收缩将会更大，如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乌克兰深受其害，主要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需求减少。其金融体系已经实施了更高层次的私有化，外资持有比例提高。白俄罗斯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国外衰退的全面冲击。但该国受到了间接影响，出口贸易因国外需求下降而受到重创。

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趋向呈矛盾态势。俄罗斯是唯一拥有广阔市场和庞大外汇储备的后社会主义欧洲国家，但它因商品价格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而遇到困难。欧盟新成员国和大多数独联体成员国（特别是大能源消费国如波兰和乌克兰）受益于能源价格下跌，但受到出口需求下滑、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以及外国撤资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表明，虽然所有国家都受到损害，但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受害程度更大。俄罗斯和中国均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已经（或可能）通过刺激国内市场来弥补出口方面的损失。两国都累积了相当多的财政储备，而且跨国指数较低，从而降低了外国公司撤离的影响。由于信贷减少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负面影响，欧盟新成员国遭受的打击尤其沉重，（见上文的表 1）。这些国家持有的补偿性资产主要是低成本、欠保护的劳动力储备（本文不予讨论），仍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因此受到国际公司的青睐。然而，当劳工面临失业时，这种运作方式导致了核心国家的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八、经济依附：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和中国之比较

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财政状况并不相同。尽管俄罗斯在最近几年更加开放，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国有银行，外资持有银行资产比例不高。乌克兰 2004 年后的发展（这是尤先科、季莫申科及其支持者获得权力发动橙色革命的后果）使该国更多地是向欧盟新成员国看齐。独联体成员国用于投机性国内贷款的银行资产比率较低。独联体成员国（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受外国银行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小于欧盟新成员国。

数据显示欧盟新成员国的商业和经济影响力微乎其微，俄罗斯也主要是一个初级原料出口国，完全不能与领先的欧盟成员国、美国或中国相提并论。俄罗斯和中国仍然拥有庞大的国内经济基础，这正是欧盟新成员国所缺乏的。独联体内的能源出口国都对世界经济开放，但它们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较低。由于这些国家的公司外资比例较低，受世界资产阶级的渗入程度较低，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是霸权核心国家。

欧盟新成员国和中国在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和拥有外国子公司方面甚至超过了许多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这些外国子公司的规模很小，只有为数很少的大型国有企业被西方资本并购。而中欧的一些国家，大量的企业并购导致外国公司越来越占优势。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除了中国）都无法组建大型国有资本主义企业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中，为数不多的面对全球市场经营天然资源的俄罗斯公司亦属例外情况。^①外资银行在欧盟新成员国占据支配地位。自 2008 年以来，进入独联体成员国（乌克兰除外）的外资银行相对较少，因为独联体成员国拥有强大的国有银行部门。虽然欧盟新成员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其政治和军事（北约）框架，但它们不能等同于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

九、结论和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沿着不同的沿革轨迹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或与之打交道。在全新的欧洲联盟中，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这些国家与那些“核心”成员国一体化之时，外国投资造成了外资大规模地持有金融、商业和工业资产的局面，并使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外国

^① 最大的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福布斯》世界排名第 13），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世界排名第 64），卢克石油公司 Lukoil（世界排名第 76），苏尔古特石油 Surgutneftegas（世界排名第 168）和储蓄银行 Sberbank（俄罗斯的主要是国有大银行，世界排名第 172）。

公司。外资控股金融和非金融公司和与欧盟老成员国金融体系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些都导致 2007 年经济危机的蔓延。它们是欧盟的经济依附型成员国，出口生产链中的低端服务和产品。此外，它们是（欧盟）老成员国的劳动力储备库。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和回流移民。独联体成员国经济的抵消性力量在于其羸弱的劳工组织和低成本生产（但对本国公民几乎没有意义）。

世界经济危机加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美国和英国）与协调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分歧。新自由主义学说促进了欧盟的扩大，却因金融崩溃的作用而经历着合法性危机。法、德、意等大陆成员国复兴了协调主义的“社会模式”。成员国关于欧盟正当性的“怀疑主义”将会加强。国家身份的强化导致了有关国家加强国家团结和国家主权的诉求。新成员国（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许多老成员国（特别是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严重经济困难加剧了欧盟的分裂。一旦某个新成员国发生财政破产和需要巨额欧盟财政援助（除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供的援助之外）时，这种情况会更加恶化。

独联体成员国远没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源行业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型跨国公司行将成型。不过，外国资本对这些公司的渗入有限。制造业和农业具有地方性质，处于衰落之中。除了乌克兰之外，独联体成员国的出口构成中高技术产品比重很低，而原材料产品构成很高。跨国资产阶级通过拥有和控制原材料出口产业来寻求在独联体成员国的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原材料出口构建了与核心霸权国家的稳固联系。但是，外资的渗入比在欧盟新成员国要弱得多，后者的外资银行尤为普遍。在所有独联体成员国中，国家一直是重要的经济和金融行为体，促成中央集权制协调主义的崛起。然而，经济危机蔓延开来，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能源行业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中国经济在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最为成功。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从外来直接投资中获益。但是，国家通过银行体系和国有公司保持对经济的强有力控制。中国的辽阔幅员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国家指导下的投资是推动发展的关键政策。中国也有大量的跨国公司，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来源国赚取了利润。这个国家正在成为占据霸权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的“对峙力量”。这样的对峙力量有可能发展出在别的国家进行开发的自身方式（比如，中国在非洲特别活跃）。

经济萧条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负面影响，在于从总体上削弱全球化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吸引力。法、德、意等大陆国家重拾了一种更注重监管的财政协调，这使得欧盟新成员国的变革具有合法性。欧盟新成员国和南欧成员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将加剧欧盟内部的分裂。在独联体成员国中，乌克兰在 2004 年后率先启动金融化 (financialisation) 进程，导致了由世界性萧条引发的更严重的经济

衰退。亚努科维奇的当选预示着政策的逆转。

世界性萧条引起了对核心霸权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体系中角色的质疑。对当下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反应方式：其一是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世界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是，非八国集团国家对世界性决策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像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政治上获益，而已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二十国集团则吸收了来自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增加了所有具有投票权的成员国的基本权利，将于 2011 年调整投票权配额。中国和日本将会以欧洲国家为代价，增强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与国家资本主义一样不够稳定，其不兼容性将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推动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制度性监管之间凸显出来。

第二个反应涉及到诉诸国家主权，同时排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另一个从新自由主义倒退的次要举措是转向和强化更注重监管的资本主义（如同德国和法国那样）。甚至连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美国和英国都不得不（至少是暂时的）接手主要的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战略股权。问题在于政治精英寻求以更加中央集权制性质的“凯恩斯主义”来化解金融危机，这与金融精英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发生冲突。在这里，国家拥有金融公司资产的举措并没有导致国家控制金融公司，而是对它们提供国家补助。从世界体系的层面上看，这个战略降低了半边缘国家选择政策的可能性。

另一个场景是对世界经济的核心、边缘和半边缘的概念重新界定。对于世界体系的批评家预示了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利益的极化。他们认为核心国家会扩大作为政治霸权和军事力量基础的经济权力。边缘国家对外提供资源、初级产品和半成品。许多世界体系理论家都将半边缘国家视为注定会滑向边缘地区的经济体，或者作为例外，加入到核心国家的行列（如韩国）。

这样的观点过于武断，无法理解霸权国家与从“半边缘地区”崛起的国家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的确，许多边缘国家面对核心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时，除了屈从于其政策之外别无选择。其他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选择却比世界体系论者所认为的要多。

俄罗斯和中国拥有自相矛盾的经济动力。它们的跨国公司日益增多，赞同扩张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公司利润汇回国内（国家也从中获益）。与此同时，两国一方面受制于赚取经济剩余价值的西方资本主义公司，另一方面，本国公司在国家范围内运作。因此，三种利益形成三角关系：全球化的母公司、买办性质的国际子公司和本国公司。中国和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制性质会阻碍其跨国公司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在并购处于霸权地位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子公司时会受到歧视。

一个重要的政治变数是俄罗斯政府拥有和控制能源公司的程度如何。外国所有权的

提高将会使经济力量的平衡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支配地位的延续将会扼制这种倾向，并奉行民族主义的政策。一个不同的场景有可能出现：经济“对峙力量”使得国际化公司和本国公司的增多具有合理性，但会限制外国跨国公司在这两国的运作。我以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概念过于简单化，无法体现世界经济和政治网络的性质。

局势的进一步演变将会导致不同类型国家集团的兴起，它们既与核心国家互动，又不受其左右，与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前的情况相似。这类国家集团将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对峙力量。许多国家的生产具有地方特性，但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发展。区域性公司和政治行为体具有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巨大活动空间。^①世界经济危机有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区域性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加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诸如上海合作组织、^②集体安全条约组织、^③欧亚经济共同体^④和中亚合作组织^⑤的形成和发展，便是区域经济和政治集团兴起的明证。

世界经济萧条极大地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变革模式，将会加速以上趋势的演进。诸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完全有可能学习中俄的榜样，建立更加强调国家主导性的贸易集团，减少对处于霸权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这样的集团能够建立一种有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提供就业，更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财富，减少贫困，发展地方和区域产业。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下，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发展政策只能由社会中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代表——国家来主导。凯恩斯理论全面论述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除了利率和货币之外，我们还应当更多地关注就业问题。公共补贴甚至给予了那些导致经济体系崩溃的银行，而不是用于就业方面。公共补贴的优先次序必须倒转过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视为世界上各家银行的“最终放贷者”，世界经济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最终雇佣者”的国际机构。

在某种程度上，劳动和资本的利益能通过资源的分配得到承认。作为新自由主义模式注重货币监管和市场协调做法的一种替代，我们需要优先强调经济发展和就业，运用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经济刺激的模式。但相关政策应当比凯恩斯主义走得更远。作为对参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的另外一种选择，可以考虑的“对峙力量”包括推行国家股份公司制资本主义，或者恢复再分配的某些社会主义要素。

（潘兴明、李贵梅 译）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H. Kitschelt, P. Lange, G. Marks and J.D. Stephen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Advanced Capitalist Democracies”, in H. Kitschelt, P. Lange, G. Marks and J. D. Stephens (Ed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27-460.

② 该组织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

③ 成员国为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④ 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⑤ 成员国为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Abstract】 Since 1989, the post socialist states have pursued different trajectories. There are four groups of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in the present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NMS), the European and Asian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and China. Divisions are defined between their industrial and trading capacities which influence the extent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financialisation. Distinctive linkages of the country groups to the global system give rise to different economic (and consequently political) capacities and dependencies. By examining the patterns of investment, trade partners and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stress caus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 2007-., it is clear that: whereas the post-socialist members of the EU are firmly bound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t is contended that large economies (such as Russia and China) have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their own internal markets and networks thus giving greater levels of economic autonomy compared to the NMS. Three main responses to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re suggested: greate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dominant institutions of world capitalism; a movement towards a less neo-liberal and more coordinated world system; and the rise of ‘counterpoints’ and regional blocs in a more pluralistic global system.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CIS, EU and New Member states, Global economic crisis, neo-liberalism, Core, semi-periphery, Foreign and State banks

【Аннотация】 Начиная с 1989 г.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шли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траекториям развит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роведён анализ уровней участия и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четырёх групп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обществ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ы ЕС (НГЧ),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 азиатские члены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 и Китай. Деле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их промышленными и торговыми способностями, которые влияют на степен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финансиализации. Отличительные связи групп стран с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приводят к различ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ям.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модели, торговые партнеры и финансов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а такж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стресса, вызванного миров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кризисом, начавшимся в 2007 г.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члены ЕС прочно связаны с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крупные страны (такие, как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меют потенциал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внутренних рынков и сете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вая более высокие уров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НГЧ.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ответа на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большее включение в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мир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движение в сторону менее нео-либеральной и более с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ной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и рост «контрапунктов»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блоков в более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НГ, ЕС и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ы, глоба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 центр, полуперифер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банк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政治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徐凤林*

【内容提要】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关键词】施米特 俄罗斯 例外状态 委员专政

【中图分类号】G13/1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074-(13)

纵观中国和苏联—俄罗斯近20多年来哲学思想的变化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都出现了几次西方经典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流行潮。我们这里先后出现过西方存在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出版热；在苏联—俄罗斯，则有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平反和流行，有90年代初海德格尔和现象学著作的大量出版，有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的阐释。近几年，俄罗斯哲学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德国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对施米特译介、研究和关注已成为当今俄罗斯学术界的一种独特现象。有俄罗斯评论者指出，近几年来，施米特的翻译著作在俄罗斯学术书店的“哲学”书架，

* 徐凤林，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研究。

乃至在“精神畅销书”书架上，越来越占据显要位置^①。“今天他的著作在俄罗斯大量出版，被广泛引用（并且被各流派的学者所引用），而伴随着对他的思想的严肃的科学接受，在思想领域周边形成了阅读他的精神时尚……对施米特的兴趣还有一个表现：一些与当今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人物也援引施米特的著作，这些人物包括：格列勃·巴甫洛夫斯基（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урков）以及其他所谓的‘体制’思想家”^②。

那么，施米特这位活跃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德国思想家，为什么会成为“普京—梅德维杰夫时代的理论家”呢？

一、施米特在俄罗斯流行的原因

众所周知，施米特因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有某种联系而曾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俄罗斯的“精神时尚”，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学术影响。俄罗斯的施米特流行，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学术思潮在俄罗斯的“延迟”反应。1985 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施米特研究著作先是在德国大量密集出版，涉及宪法、国际法、现代政治思想史、国家理论、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等领域，同时，在英美学界，新左派和新右派理论家的同时关注，促成了施米特著作英文译本的陆续发表。“著名的左派学刊 Telos 在 1987 编辑了一期施米特专号，以后多次发表施米特文章的英译和注释，主张从施米特学习对自由主义的批判”^③。在这种西方思潮背景下，把施米特介绍给俄罗斯读者，是施米特著作的最早俄文译者亚历山大·菲利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еллипов）当年翻译《政治的概念》（最早发表于俄罗斯《社会学问题》杂志 1992 年第 1 期）的主要动机^④。同时，也是这位“施米特在俄罗斯的伴唱者”后来为施米特著作在俄罗斯传播进行辩护的理由之一。他对反对者说：“难道您不知道，20 世纪末的任何一个著名思想家，没有哪一个不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注施米特及其朋友或论敌的思想吗？难道您从来没读过 Telos

① См.: Дмитрий Кралечкин.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прошел.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2009).

② О. Кильдюшов. Карл Шмитт как теоретик (пост)пут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 Чудесное превращение из маргиналов в новые классики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9.03.26.

③ 刘小枫：《现代政治思想纷争中的施米特》，见《刺猬的温顺(讲演及其相关论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43 页。

④ см. А.Филипов. Карл Шмитт. Расцвет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 в кн.: Карл Шмитт.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логия. М.,2000. с.259.

杂志或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著作吗？”^①

当然，实际上西方的施米特研究也许并没有俄罗斯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火热。德国法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offe）2009年6月在接受俄罗斯电子杂志“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知识界如今还在讨论像施米特这样的战前时代的思想家，令人感到遗憾。他说：“在德国，施米特是不被社会所需要的……虽然欧洲有许多研究施米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专家。但施米特无论如何不是社会讨论的核心人物。施米特是旁注”^②。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施米特研究在俄罗斯依然方兴未艾。这显然是由于西方学术影响之外的原因，即施米特的理论是认识当前俄罗斯政治现实的需要。

第二，国际政治现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两极体制不复存在，美国独霸世界，俄罗斯不再具有原来的大国地位，丧失了许多领土，失去了一些同盟者。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方面面临新的迫切问题。施米特政治学说中的“大空间”（Больш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Grossraum）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划分敌友的国际政治思维等，对俄罗斯面临的问题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思想价值。施米特在90年代的俄罗斯学术界主要是以地缘政治学家的角色被了解和接受的。在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帕纳林（А. С. Панарин）的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著作中，施米特的有关学说都占有一定地位。

第三，国内政治现实。普京当政时期，俄罗斯政治出现了反民主的倾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方改变了原来的许多自由民主的话语。“在俄罗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出现了‘语言罢工’。也就是那时已不可能继续8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建立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语言游戏了（顺便指出，企图诉诸已经失去大陆的白银时代哲学，也是徒劳的）。被作为俄罗斯光明未来的自由主义的简单化信条已威信扫地”^③。第二方面是政权运行方面，反民主和中央集权的因素也在加强。政府提出和推行所谓“国家方案”，企图利用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来解决一系列无法推脱的社会问题。这些现实的变化导致了俄罗斯国内思想的变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有所加强^④。这些思潮都可以在施米特学说中得到支持或找到共鸣。

施米特与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的关系应该包括三方面的问题：1）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的“赞成与反对”；2）俄罗斯学术界对施米特学

① 转引自：Дмитрий Кралечкин.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прошел.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

② Отфрид Хеффе. Шмитт – маргинален. Кант – актуален//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2009.06.08.

③ О. Кильдюшов. Карл Шмитт как теоретик (пост)пут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

④ 参见俄罗斯《逻各斯》杂志2004—2007年关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问题的专题讨论系列论文。

说本身的研究和阐释；3) 俄罗斯学者运用施米特的理论和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的理论解释。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第一个问题的赞成方面，下面我们着重叙述后两个方面的问题。

二、“例外状态”与“敌友划分”

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的思想经由当代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的系统阐发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阿甘本高度评价施米特的思想洞见和现代意义。他认为，正是施米特正确地把握了从一战以后开始延续到现在的政治时代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就是“例外状态”制度的不断强化。这种“例外状态”机制“从一战开始，到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时代，直到现在，都在一直不停地发挥作用。但只有在今天，‘例外状态’才得到了全世界性的传播：法律的规范方面可以被不受惩罚地贬低价值；政府可以违背法律规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采取经常不断的例外状态机制，然后做出所有这些都是运用法律的样子”^①。

俄国学者杜金早在 1992 年首次发表（后来收录到他的多部著作中）的论文《卡尔·施米特：对俄罗斯五个教训》中，就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与决断的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并指出了这一思想对当代俄罗斯的意义。杜金认为，施米特的杰出思想之一是被引进政治法律领域的“例外状态”原则。按照施米特观点，法律规范所描述的只是正常的政治—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均衡的、连续性的，没有断裂。只有对这种完全正常（规范）的状态，法学家所说的“法”的概念才是完全适用的。根据施米特的看法，经典法学倾向于把正常状态的标准绝对化，倾向于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具有相同标准的法制化过程。这种观点的最完全表现是汉斯·凯尔逊（Kelsen）的“纯粹法学理论”。但施米特把这种对“法律观点”、“法律国家”思想的绝对化看作是乌托邦的机械论和幼稚的普遍主义，来自具有理想主义神话的启蒙时代。在把法律绝对化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企图，即企图关闭历史，剥夺历史的创造性的情感维度、历史的政治内涵和历史的民族性。在这些分析基础上，施米特提出了“例外状态”（Ernstfall）理论。

所谓“例外状态”，就是在不能再用通常法律规范来有效调节的情况下采取政治决断的时刻。“例外状态”下的决断要求考虑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有机因素，这些因素既属于历史传统、文化常量，也属于人的激情迸发、英雄精神、深处生命能量

^① G. Agamben. *Ausnahmestand*. Frankfurt a. M.: Suhrkamp, 2004. S. 102. 转引自 В.Куренной. Мерцающ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диалек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Ле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7. № 1. С. 17-24.

的突然表现等。“决断”这个术语也是施米特法律学说的关键概念。真正的决断正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政治过程的自然流动发生“断裂”的状态下采取的。决断在“例外状态”下，在社会政治灾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例外状态”不只是灾难，它使一个民族及其政治有机体面临自己的历史本质、自己的神秘本性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决断，是一个民族精神深处的这样一种意志的自发表达，这种意志是对普遍的生存和历史挑战的回应。

在运用“例外状态”理论和决断思想看待当代俄罗斯现实的时候，杜金指出，施米特的这一思想对今天的俄罗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俄罗斯正处在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在这里，“例外状态”成为国家的自然状态；在这里，民族的政治未来和对民族历史的理解都依赖于决断。如果人民意志能够在这一悲剧时刻确认自己的选择，从历史中得到自己的政治自我确认，那么，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决断就将是自己的、历史的、生存的决断，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就将是俄罗斯的。如果决断被另外一些人做出，比如由“一般人类观点”、“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追随者（他们是启蒙主义乌托邦和机械论意识形态的唯一直接继承者）做出，那么，不仅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将是“非俄罗斯的”，“一般人类的”，也就是最终“谁也不是”，而且俄罗斯的未来也将失去意义。^①

敌友划分是施米特政治哲学中颇有争议的观点。俄罗斯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分别从民族主义立场和战略假设的观点对敌友划分思想所进行的两种辩护与解释。

杜金认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中关于不同民族作为不同政治共同体而彼此对立的观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全部世界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真实历史（而不是所宣布的历史）都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虽然乌托邦意识和后启蒙主义意识不能承认这一事实。在现实中，“自己人”和“非自己人”的政治划分在一切政治制度中的所有民族中都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划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有面貌，不能具有自己特有的道路和自己的历史。“敌友这对概念，对于在政治上具有完全价值的社会来说，是它的对内和对外政治所必需的，对这对概念应当冷静地加以承认和接受。在相反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将成为敌人，而任何人也不会成为朋友。这是历史的政治律令”^②。

有人断言这种“自己人”与“非自己人”的划分是反人道的、非人性的。而在施米特看来，这样的划分是一个先在的事实，抽象人道主义的宣传者已经在这样的划分之中了，是把自己所理解的人性当作普遍人性，这反而更具有危险性。施米特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рл Шмитт: 5 уро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и//Русская вещь. М., 2001.с.157-158.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рл Шмитт: 5 уро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и. с.157.

说：“如果有人开始以全人类的名义讲话，以抽象人道的身份讲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因此而说出这样一个极其可怕的奢望，即他奢望剥夺自己的可能反对者的全部人性，宣布他们在人类之外，这样就潜在地要求战争，达到可怕的、无人性之极限的战争”^①。这样，导致可怕后果的不是现实主义地承认民族政治生存的本质特点（这一特点总是要求敌友划分），而正是企图强制推行普遍化，把不同民族和国家挤压到毫无机体差异和历史差异的“统一人类”的乌托邦观念框架中。

弗拉基米尔·尼基塔耶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итаев）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理解为战略。战略一词本是军事术语，如果推广到一般意义，则战略是对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长远前景的谋划，因为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领域是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领域，因此战略——是在依靠直接作用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把握与对手关系的方式或艺术。

战略谋划要从“处境反思”（рефлексия в ситуацию）开始。“处境反思”作为政治认知方式，具有实物与反映、原型与表象相统一的特点。在“处境反思”中，所反思的处境总是被理解为在处境中的事物本身，也就是“客观”与“主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因此在这里，事物本身与对它的解释，客观现实与主观幻觉胶合在一起，难以划分彼此。敌与友的政治划分，是作为战略的政治思维与动机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处境反思中假设的可能性。按照施米特的观点，政治不在于斗争本身之中（斗争有自己技术的、心理的和军事的规律），而在于由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中，在于对由战争的可能性所决定的处境的清醒认识中，在于正确划分敌友的任务中^②。

这样，划分敌友不是主观意识的事实，而是从防御意识出发所进行的处境反思。敌与友的划分不同于其他划分，它是战略谋划上的处境反思，是从战争的可能性来考虑的。而战争的可能性也只是具有假设性，并不是现实性。因此敌与友的划分不意味着某个民族是另一个民族的永远的敌人。

三、“大空间”与“欧亚联盟”

俄罗斯学者运用施米特关于“大空间”的地缘政治学说来论证重建“欧亚联盟”的必要性。施米特的“大空间”观念后来被许多欧洲经济学家、法学家、地缘政治家和战略家所接受。“大空间”概念的含义在于划分一些地理区域，在这些区域范

① 转引自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рл Шмитт: 5 уро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и. с.163.

②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ита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ак стратегия власти//Логос. 2004, №6.

围内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自我表现能够形成和谐和不矛盾的综合体，叫作“大地缘政治联盟”。这不是某一超级大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和战略整合，而是建立几个大的地缘政治联合体，其中的每一个都用灵活的、超国家的原则来管理，类似于“欧洲公法”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神圣同盟”。施米特认为，具有帝国—联邦类型的灵活政治结构的“大空间”能够保证各民族多样性，调节可能发生的局部冲突和“制度战争”。

杜金指出，如果把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运用于当今俄罗斯，可以说，苏联这个“大空间”的分裂是与欧亚大陆统一体的逻辑相矛盾的，因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不再可能诉诸超国家的仲裁者，这个仲裁者能够调节或限制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另一方面，在否定了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之后，应重建“东方欧亚联盟”，因为这样的重建符合欧亚空间所有本土民族的利益。应当重建“联邦帝国”，东方大陆的“大空间”，恢复苏联解体后丧失的国家统一性。此外，施米特的大陆思想还能使我们在陆地上划分“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关于陆地和海洋大国必然对立的意识，能使新“大空间”的倡导者和建立者清楚地知道“敌”与“友”：美国及其海洋盟国英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注定是欧洲、俄罗斯和亚洲的敌人。^①

尤里·索洛佐波夫（Юрий Солозобов）分析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门罗主义”^②。施米特多次指出，门罗主义在历史前进中经受了辩证转型。它从所谓维护的工具变成了征服的工具，变成了美国扩张主义的武器。门罗主义把美国的意志表达作为新国际法的唯一源泉。门罗主义语言成为政治语言舞弊的典型例子。如果不理解这一政治语义学问题的存在，干涉主义——就将永远被看作是自我保护，殖民主义奴役——被看作是确立民主，建立傀儡政权——被看作是建立或保护文明的统治制度。

索洛佐波夫强调必须建立新的欧亚大空间，他把这一大空间与门罗主义所确立的美洲大空间作了某种类比。这一政治空间应当绝对排除任何外国干涉，首先是美国干涉。对于俄罗斯来说，这首先意味着脱离外部支配体系，在后苏联空间内形成自己的合法化标准。

施米特在自己著作中规定了“大空间”的理性原则概念，把帝国纳入这一概念中。按照施米特的观点，帝国“是主导性的支撑力量，它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的大空间中占据统治地位”。大空间之间的行为法典是互不干涉。这样，索洛佐波夫提出，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рл Шмитт: 5 уро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и. с.164-165.

^② 1823年由美国总统门罗的国情咨文，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主张，要求欧洲不得再向美洲大陆殖民，宣称如果欧洲干涉美洲事务，将被认为侵犯美国利益；同时也表示美国不向欧洲扩张等。

俄罗斯今天可以通过施米特的方法找到这样一种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即建立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непризнан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以及一切其他国家的相互承认的体系。^①

四、当代俄罗斯的“委员专政”

俄罗斯学者维塔里·库连诺伊（Виталий Куренной）运用施米特的概念工具来分析当代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本质。他写道：“当代俄罗斯形成了怎样的政治制度？它的结构性政治本质是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是选择适当的政治理论话语，借助于这种话语能够确切表达关于俄罗斯政治制度之本质的分析性结论。我们这里将运用早期施米特的政治理论话语。我们认为正是他的概念工具能使我们有效地（以分析方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方式）确定当代俄罗斯政治状况的某些特点”^②。

在普京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执政权力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他履行制衡和反对派角色的机构，都是如此组建的，也就是使其不阻碍执政权力统治的运行。当代俄罗斯政治的一系列现象，人们习惯于用“民主改革的缩减”、“回到权威主义”、“言论自由的恶化”等等概念来描述。如果用施米特的概念来概括表达，可以把这种制度定义为“当代俄罗斯的总统权力专政”，只不过这种专政不同于比如罗马的专政体制，它不具有合法性，而只具有事实性。

在施米特那里可以找到两种专政类型：委员专政和最高权力专政（комиссарская и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иктатура）。两种专政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目的是维护宪法还是“创造宪法”。委员专政的目的是消除正式宣布的制度运行的障碍，创造必要条件使不发挥作用的宪法能够发挥作用；这是暂时的和具有明确技术任务的专政，其全权期限应当由它所解决的问题来确切规定；委员专政者无权任命继承人，无权制定法律。这种专政类型在民主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例如一些美国总统就运用了这种专政。在这里，委员专政是以非民主的方式维护民主，或者说，是以非宪法的方式维护宪法。“而最高权力专政则把整个现有制度看作是应当用专政行动来消除的状态。它不终止现行宪法，而是力图达到推行它所认为的真正宪法的状态。这样，它所依据的不是现行宪法，而是应有宪法”^③。

如果根据上述特征，我们无法清楚地回答当代俄罗斯具有哪一种专政形式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形式—技术意义上，俄罗斯当代政治状况是不确定的，因为这种制

① Юрий Солозобов. Непризнанная Евразия//Логос. 2004 №6.

② В. Куренной. Мерцающая диктатура. С. 17-24.

③ К.Шмитт. Диктатура. От исток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де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д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СПб.: Наука, 2005. С. 158

度既可以解释为委员专政，也可以解释为最高权力专政。这是“闪烁不定的专政”。如果考虑到毕竟保持了宪法和总统任期这一决定性因素，那么这种专政更倾向于前一种。

这种专政的出现是有俄罗斯国内和国际背景的。因为1990年代俄罗斯普遍强调西方的、市场的、民主的选择，但这种政治方针没有得到相应的生活质量改善的支持，因此遇到了国家大多数居民的对抗。其中包括普通选民，也包括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文化阶层。对这个问题的自然解决在于确立委员专政，它应当创造这样一种条件——在这一条件下，市场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有可能较为平稳地运行，不至于再出现前一位总统时期不得不定期采取极端挽救措施的情况。

从世界政治状况来看，政权的权威主义完全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它从属于西方“民主”历史上的实践，也处于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之中。库连诺伊援引阿甘本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判断：“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在今天失去了意义，行政权力实际上吞噬了立法权力，至少是部分地吞噬。议会不再是具有确立公民法律的绝对权力的自主机构。议会的活动只限于批准执政政权所颁布的命令。从技术观点看，共和国现在不是议会的，而是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显著的是，当今在不同规模上贯穿于全部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类法制变化，是公民所完全没有察觉的，只被法学家和政治家所意识到。正是当西方政治文化力图给其他文化和传统上民主课的时候，它却不知道，它自己在民主问题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标准”^①。

在这种一般趋势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仅在于，当今俄罗斯政权的专政运行得更加粗糙。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当今俄罗斯政权力图重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如果富有内容地描述本世纪初俄罗斯政权所经历的演化，那么可以说，它经历了从建立自由经济社会的模糊目标（这个目标是作为叶利钦时代的遗产而得到的），到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这个制度可以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一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朝着苏联经验发展。如果说为行政官僚阶层服务的苏联体制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那么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重建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能否转化为欧洲模式的“社会国家”，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五、探索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话语

俄罗斯研究者没有停留在对施米特的历史研究，而是力图把这一研究运用于俄

^① Agamben G. *Ausnahmezustand*. Frankfurt a. M.: Suhrkamp, 2004. S.26-27.转引自 В.Куренной . Мерцающ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диалек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Ле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7. № 1.

罗斯现实，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基尔久绍夫（Олег Кильдюшов）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俄罗斯的当代处境与施米特创作高峰时期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非常类似，就是一战失败和经济崩溃后的魏玛共和国。那时在德国产生了“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的现象。德国人从西方胜利者过去的历史中借鉴的制度和话语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自己当时的问题，正如 90 年代的俄罗斯一样。因此施米特著作才对分析当代俄罗斯具很大的启发意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中的“民主”、“议会制”、“法制国家”、“人权”等经典概念，是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开始的文化和政治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话语斗争的结果。这些话语不仅是社会和历史过程的“指示器”，而且能够作为这些过程的“因素”而直接影响历史变革。但施米特没有简单地接受这些话语，而是力图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施米特看到，一些传统的西方话语已经成为分析德国新状况的障碍，例如“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划分。这一划分是欧洲作为与皇权斗争时代的遗产而获得的：“社会”曾经是进行政治争论的概念，它是用来与当时的君主制军事官僚国家（монархическое военно-чиновн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相对立的。一切不属于这一国家的东西，就被叫作“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被区别于社会。国家可以独立地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对立。但这种划分在国家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成为虚幻的了。国家成为“社会的自我组织”，因此已经不可能划分国家政治领域与社会非政治领域。结果，一切建立在这一前提基础上的概念和机构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新理解。

第二，施米特首先关注的是具体的制度，力图从制度中引出规范，而不是相反，以纯粹规范的标准建立和评判制度。“因为从规范主义观点看，所说的不是具体的制度轮廓，而只是抽象的‘焦点’，对这些焦点来说，一切都是自然地与一切相容，‘内在的’不相容性永远也不可能被承认。我们知道，规范是以规范的处境和规范の様式为前提的。任何制度，包括‘法律制度’，都依赖于具体的规范概念，但這些具体概念不是从一般规范中得出的，相反，这样的规范是从自己的制度本身和为了自己的制度而制定出来的”^①。

把施米特的方法运用于分析俄罗斯现实，就要认识到，不应当把传统的西方经典概念套用到当今的俄罗斯现实，而应当建立适合于当代社会实践的新话语来认识和描述俄罗斯的国家类型和社会类型。按照西方模式探求俄罗斯“发展的正确道路”的做法无助于理解现实存在的关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代俄罗斯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不起作用。

① 转引自 O. Кильдюшов. Карл Шмитт как теоретик (пост)пут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

当代俄罗斯面临的新现实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没有的，这就是，一方面自身在追赶现代化路程，另一方面又面临世界的现代性危机和后现代世界观的挑战。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全球化时代。这种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时代的一般精神背景，而且改变了各生活领域的具体行为模式和这些领域的构成本身，包括政治领域；产生了传统民主政治组织（党派，选举，议会）的危机。这样所造成的结果是，无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组织者朝哪个方向努力，无论是恢复革命前的政治制度，还是重建已经被详细描述和分析过的西方制度榜样，都显得与时代精神不符。于是造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混乱无序，表现在没有政治运动和党派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团体的认同、执行政治路线的“虚线”性、各政党自我命名的随意性、政治领袖的政治认同的变化无常、没有稳定的个人选举和地方选举模式等^①。

施米特的经验还表明，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生活与既有的成文规范和形式程序都是不符合的，叶利钦宪法及其他政治法律制度在现行国家机器运行中已经失去意义。在新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运用从前时代产生和确立的政治话语资源来进行制度建设，是十分困难的。基尔久绍夫总结说：“由于俄罗斯照搬西方制度来进行自己的‘文明’制度建设实际上已遭到破产，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在俄罗斯经典作家所说的‘永恒的俄罗斯’”^②。因此，俄罗斯没有什么或谁可指望——无论在过去还是在西方，都没有任何一种超级理论能够解释清楚俄罗斯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俄罗斯自己来研究和探索，假如不想被他人“算计”的话。

六、研究施米特思想的理性原则

回到施米特现象在俄罗斯流行的“赞成与反对”问题，我们看到，与施米特著作在俄罗斯思想界广泛流行的同时，也有一些俄罗斯公共知识分子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反对不加分析地接受施米特思想和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主张在俄罗斯建立对施米特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俄罗斯著名学术杂志《普希金》主编瓦列里·阿那什维利（Валерий Анашвили）在该杂志 2009 年第 2 期发表的“哲学类图书快评”中提出，施米特、云格尔（Eberhard Jünge）等人著作的大规模出版可能是不无危险的，因为这些出版物如果不建立在当地的研究语境之上，那么它们就可能提供另外的政治语境，它“有助于帮助种族主

^① Леонид Ионин.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 Логос. 2005 №3.

^② О. Кильдюшов. Карл Шмитт как теоретик (пост)пут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

义、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成为可以进入体面家庭和值得讨论的完全正当的思想和实践”。总是可以找到某个天真的读者会“原本地”接受云格尔的思想。因此，对这些作者的宣传就已经是某种“隐秘的法西斯主义”^①。

还有一些人认为，必须不仅要拒绝施米特的思想，而且要停止翻译他的著作。他们的证据可以归结为如下论断：在这位德国思想家和德国保守革命理论家的著作中有这样一些政治思想，它们今天可以被用来建立法西斯主义类型的残酷专政^②。

德米特里·克拉列奇金（Дмитрий Кралечкин）指出，德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在俄罗斯变成了“现代艺术”的某种翻版，其理论体系的某些成分被当作崇拜对象。这是违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俄罗斯在“按照西方的榜样”来翻译和阅读施米特和云格尔的时候，却漏掉了重新构建施米特和云格尔的这样一种在西方榜样那里仍然起作用的方法，也就把这些作者严格区别于“普通作者”。

要使俄罗斯的施米特研究学术空间与国际接轨和平行，而不是跟随其后，俄罗斯学者就要进入讨论一系列一般理论问题，比如法学和地缘政治学问题，建立这些理论问题研究的国际空间。这要求另外一种认识，即认识到谈论这些问题的科学趋势已经超出了“作者语境”的界限，也超出了重建“历史语境”的界限。不应局限于对施米特、云格尔等思想家进行食古不化的讨论，不应把他们当作历史纪念碑来研究。同时，在接受方面还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防止陷入他们的文本，将其作为仿佛是自己的东西加以接受；另一个是防止他们的思想被不具备批判能力的大众所滥用，比如把云格尔的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③。

我们在对俄罗斯的施米特现象作了一番考察之后，自然也会以此反观自身，即俄罗斯的施米特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简言之，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学者的研究立场、方法和成果中得出以下启发：第一，施米特学说的流行是俄罗斯现实与思想的特定反映，因此，透过俄罗斯学者对施米特的研究和争论，我们可以窥见当代俄罗斯政治状况和政治思潮之一斑，增加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维度。第二，因为政治哲学也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施米特的许多著作以及西方学者对他的研究著作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并有一些研究者，因此俄罗斯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的施米特研究以及一般法理学和政治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三，如果说得更远一点，我们国家与俄罗斯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在现代化道路上同样面临着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俄罗

① Валерий Анашвил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ушкин.2009 №2.С.190–191.

② Отфрид Хейфе. Шмитт – маргинален. Кант – актуален.

③ Дмитрий Кралечкин.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прошел.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 (2009).

斯学者的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和分析中得到更切近的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下探索适合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It has been one of the popular phenomena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circle that various books of Carl Schmitt, the German jurist, were published and quoted widely in recent years. This phenomenon is due to the West's academic impact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Russian domestic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are different attitudes for or against Schmitt and his doctrine among Russian intellectuals. During this academic contending, Russian scholars not only carried on in-depth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 regarding Schmitt's main idea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cluding "Emergency", "differentiate by friend and foe", "big space", "Eurasian Union" and etc, but also gav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Schmitt's basic conceptual tools such as "commissar dictatorship", "nation" and "politics" etc.

【Key Words】 Carl Schmitt, Russia, Ernstfall, commissar dictator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ниг немецкого юриста Карла Шмитт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и широко цитируется, 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х явлений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реды. Это явление связано с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 влиянием Запад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и внутри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реалиями в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ред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ов есть как защитники, так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учения Шмитта в Росс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эт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спор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провели глубокий анализ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ю таких основных идей Шмитта, как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ение на друзей и врагов, «больш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а также, используя такие основные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Шмитта, как «комиссар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олитика», провел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й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рл Шмитт, Росси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иссар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责任编辑 常喆)

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之影响

——叶利钦与普京时期之探讨

蔡秋如*

【内容提要】府会关系、政党政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民主政治的判别标准之一。苏联瓦解，俄罗斯联邦取而代之，并随之采取激进的政策进行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以期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型。转型期间，府会关系产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冲击到政府的威信与国家的存续，以叶利钦时期为最。继之，普京执政，扭转了情势与府会关系，将国家社会带向新高峰。如此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普京调整了国内政策，特别是颁布了“政党法”来整合政治势力，使国内出现了政党政治的雏型，对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可见，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有绝对的影响，其中以对国家政策方向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为最，这从叶利钦与普京两个时期的府会关系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可具体看出。简言之，俄罗斯的府会关系明显影响政治稳定，议会中的政党政治又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关键词】俄罗斯 府会关系 政治稳定 普京 叶利钦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2-0087-(21)

一、前言

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是现代民主政治之政府类型的区分标准，亦可说，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判别标准，是民主政治的真髓所在。

苏联是世界上共产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大，由其建立了此制度，亦由其瓦解了该

* 蔡秋如，台湾元培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制度；其彻底转向及采用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与所有马列主义追随者始料未及的；苏联亦是两度撼动世人与改变世界秩序的世界大国。如今，苏联已进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联邦之新国家、新体制与新社会秩序。新制度与新面貌与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开放相接轨，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欢迎。但是，伴随而来的社会混乱、政治动荡和国力衰退等现象却引来国际忧心，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再度引发动乱与革命，波及区域与国际和平？国际关心的重点不外乎如此，只问其果不问其因，只要符合国际共同的利益，以及既有的制度、秩序与游戏规范，国际必定双手欢迎与多加肯定，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然而，“因”才是知本之道、探究的精髓。也因此，探究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之因才是问题的实质与重点，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俄罗斯改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与策划，伴随而来的乱象可说是既有社会的利益矛盾与反扑的表征化。所以说，俄罗斯从旧有制度与社会转型到新制度、新社会中的乱源，还是要到政治因素中去探寻。因而可以说，政治因素是探讨俄罗斯政经、社会问题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在政策面、政治权力结构面，而俄罗斯政治的稳定性又系于中央的府会关系与党政关系。也因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俄罗斯转型问题与乱象的锁钥。因此，探究俄罗斯改革以来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尤其是从紧张的叶利钦时期进入转折性的普京时期，可谓是明显的大转折与对比期，遂成为研究的重点。

基于前述之理由，希冀通过对此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达到以下几点目的：第一、了解政治稳定的概念与界定；第二、知悉影响政治稳定的可能变数；第三、透析叶利钦、普京时期的府会关系与转变；第四、提出俄罗斯府会关系影响政治稳定的变数。为了达到这四项研究目的，研究架构安排如下：第一、政治稳定之概念；第二、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变化，叶利钦与普京时期；第三、俄罗斯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的变项分析等。研究方法的采用，则以历史文献分析、比较分析法、演绎法等为之。重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以俄罗斯 1993 年到 2007 年的五次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及数据分析之。资料来源，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官方网站，一部分来自西文研究，另一部份则来自中文研究。在俄罗斯官方网站中，主要以官方公布的选举结果为分析国会选举的重要参考。西文研究部份，学者主要分析俄罗斯议会选举制度的改变、国会的权力运作、府会的冲突与合作关系等。中文研究部份，大陆学者大都着重在俄罗斯政党的发展、特点、未来与府会冲突的情形等等；台湾学者则以民主化途径切入分析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未来等。本研究不同于这些中西文的研究之处在于，从民主政治的重要指标“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切入，探讨对政治稳定的影响。首先，从厘清政治稳定概念开始，进而探讨叶利钦与普京时期的府会关系，最后，再

从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提出其相关变量，并作辩证性的解释。

二、政治稳定的概念

政治稳定 (political stability) 一词，学界有不同面向的界定与诠释。例如，大陆学者华健康的观点，认为：政治稳定是指某一政治体系的延续性、秩序性和可控性，它包括政权体系的延续性或稳定性、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政治运行过程的可控性。政权稳定是政治稳定的核心，其包括：一为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如国家统一、完整、主权独立和不受外来侵犯等；二为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延续；三为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法制化和守常性。^① 当代政治学家罗尔斯 (John Rawls) 的“正义论”提到：政治稳定是正义的政治概念，也就是“重叠的共识”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产生一个公正与稳定的政体；无论权力分配、人事变动、共识的支持度，皆无碍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之获致；此共识是来自大多数理性公民 (a large majority of reasonable citizens) 所愿意接受、认同与支持的政体价值、社会秩序与政体；假若不为大多数理性公民所接受，社会的稳定将遭受威胁，因此，也隐含了正义的公共性 (the public conception of justice)。^② 台湾学者吕亚力认为，一般研究学者的政治稳定概念，隐含两层涵义：一是合宪或合法的政府存在之时间，另一是暴力如群众示威、暗杀……等发生的频率及丧生人数。^③ 学者李光平对此有完整的归纳，^④同时，本人亦针对这些定义提出个人不同的论点。

1、政治稳定是一种无变迁的状态，单纯地指一种事物长久不变的状态。此种看法，本人认为过于僵硬。因为根据伊斯顿 (David Easton) 的系统理论之解释，系统本身是开放的，同时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且不断进行着输入项与输出项的反馈 (feedback) 作用，进而影响到中央决策系统不断进行政策修正。因此，就整个政治系统、过程及与内外环境的互动而言，它是一直呈现动态的状况。当然，动态状态不代表不稳定，不变迁也不一定是稳定，而很可能是一种停滞。

2、政治稳定是一种具有适应变迁的能力的状态。依本人于第一点所述，政治系统经由输入、输出及反馈的重复过程，本身具有自我调整因应国内外环境变迁带来之冲击的能力，才有可能进一步反馈成输入项，再进入中央决策系统进行新决策。

① 华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② Shaun P. You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e Need for Moral Affirmation”, <http://www.ul.ie/~philos/vol4/rawls.html>.

③ 吕亚力：《政治发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47页。

④ 李光平：《政治共识与政治稳定》，台北：黎明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17-26页。

3、政治稳定是一种合法性状态。意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现行政治体系有信心和共识，认为该体系是合法及有效率的，能够处理与调适外在环境的变化，满足人民的需求。此点，本人亦有不同的看法，即合法性只是各方势力妥协、讨价还价、利益勒索等的暂时性产物，一旦有挑战现状或权力当局的势力出现，表示合法性已受到质疑和挑战。若要合法化状态维持长久，就必须佐以明确之法制与游戏规则，并且，各方达成共识，否则，所谓“合法化状态”之界定会过于空泛、模糊。

4、政治稳定是一种持久性的民主政治。学者大都同意时间是政治稳定的条件之一。但是，笔者认为：持久并非僵硬、停滞，只要政治变迁能和平地遵守民主程序与规则进行，必要之政治变迁反而有利于营造另一阶段新政治变革与政治稳定的条件。

5、政治稳定是一种均衡状态。本人所持的观点为：此种观点为经济学供需均衡原理，行为主体基于偏好、需求与利益所达到的均衡状态。不过，就第三点看法，假若社会各势力能达成共识，且将其法制化，此均衡状态可视为一种政治稳定，但此种政治稳定不能保证持久。因为若有一方或一种势力意图挑战现状，均衡随时会被打破，不稳定会再出现。因之，要持续均衡状态，必须有一套合法、公开、透明的权力游戏规则，即民主化程序与规则为之。

6、政治稳定即是维持宪政秩序。本人认为：遵循法制，不随便逾越，是民主的重要原则与精神之一，可说是以最具体的形式将政治变迁限制在法的约束之中，不致于造成失序状态。不过，要维持法的约束力长期有效，必须仰赖所有政治精英的民主素养，以及民主文化的养成。否则，政治稳定仍然易为轻法者所破坏。

7、政治稳定是政治权威持续的状态。本人认为，政治权威之存在，自属于政治特质之一。然而，权威的持续与存在，或许可视为一种政治稳定，但并不必然是民主政治。因为独裁或专制政体可以透过强制的、镇压、军事统治的手段持续统治，绝不允许任何挑战权威的势力存在或出现，因此，此类独裁或专制的长期稳定并不是民主的政治稳定。

8、政治稳定是不存在政治暴乱与骚动的。本人与大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政治暴乱与骚动是不稳定的现象，更是不民主、野蛮的举动，对社会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与影响。

总而言之，政治稳定是政治系统持续性的发展与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暴力、革命和武力等情事发生，只有宽容与包容；各方不断经由合法管道与程序调解冲突、对话与协商，以达到共识及均衡；奉行宪政主义，不以牺牲宪政秩序为代价以换取个人权力的取得；同心协力解决内外因素造成的变迁或有计划的变迁；带领国家朝向高民主素养与文化发展，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及保障生活无忧等等，才谓为政治

稳定的完整概念与最高境界。

三、俄罗斯府会关系的变化

俄罗斯的府会关系自 1991 年民主化以来受新宪法的产生、两次总统选举及五次国家杜马选举等因素影响，明显地发生阶段性变化。从这些阶段性变化中，亦可具体观察出俄罗斯府会关系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变量。为了探讨这些变量，本文将从叶利钦时期（又分三阶段）、普京时期的民主化改革阶段分析之。

（一）叶利钦时期

第一阶段：激进震撼疗法阶段（1991 年“8·19 政变”后—1993 年新宪法产生）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 1991 年 5 月通过总统直选修宪案，并赋予总统实权。随后在 6 月 12 日举行总统选举，结果叶利钦胜选，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民选总统一选出，俄罗斯双重行政首长制(或半总统制、准总统制)的政体也随之成形，也就是，总统与沿袭苏联体制规定而掌有行政实权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总理)共治，成为两个实权的双首长制或称“半总统制”、“准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1991 年 8 月 19 日保守派发起反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政变，叶利钦勇敢捍卫国会的名声大噪，同时也了他再度扩大权力的机会。^①他要求国会给予其一年的紧急命令权，兼任总理权力，以因应政治危机。叶利钦掌有总统及总理职权后，实则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半总统制”逐渐带向美国式的“总统制”，也标志着激进改革派的胜利。但是，此期间政治体系因领导者的改革意识形态歧异，呈现高度的不稳定，进而演变成府会间严重的权力斗争。^②

首先是以国会议长哈斯布拉托夫(R. I. Hasbulatov)为首的改革保守派和盖达尔(Yegor Gaidar)副总理的激进经改路线的争执。叶利钦上台后，以盖达尔为副总理(1992 年 6 月至 12 月任代总理)，仿波兰的震撼(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进行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但在政治上则呈现权力把持与议会争权的局面。在自由化方面，自 1992 年 1 月 2 日起物价全面自由化，取消国家长期对价格的控制，结果造成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1992 年约高达 25 倍)，生产急速下降，社会秩序混乱。此动荡不仅激起人民高亢的抱怨与不满情绪，亦开启了以哈斯布拉托夫(R. I. Hasbulatov)为首的议会和叶利钦政府的权力斗争之门。然而，叶利钦仍坚持民主改革路线，只能换下盖达尔，以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代之。虽然切

① 吴玉山：《俄罗斯转型 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北：五南文化事业机构，1990 年，第 68、71 页。

② 蔡秋如：《俄罗斯引进外资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1994 年 5 月，第 35 页。

尔诺梅尔金采纳了议会的经改建议，但经济状况仍未缓转，府会冲突愈形严重。在物价开放的同时，俄罗斯实行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政策，分阶段采取票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抵押拍卖等方式具体为之。

表 1 俄罗斯国会杜马选举政党获得 5%得票率情形

| 1993 年 12 月 12 日 | | | 1995 年 12 月 17 日 | | | 1999 年 12 月 19 日 | | | 2003 年 12 月 19 日 | | | 2007 年 12 月 2 日 | | |
|------------------|----|-------|------------------|----|-------|------------------|----|-------|------------------|-----|-------|-----------------|-----|-------|
| 政党名称 | 席次 | 得票率 % | 政党名称 | 席次 | 得票率 % | 政党名称 | 席次 | 得票率 % | 政党名称 | 席次 | 得票率 % | 政党名称 | 席次 | 得票率 % |
| 俄罗斯选择 (RC) | 40 | 15.38 | 俄罗斯选择 (RC) | 0 | 3.9 | 共产党 | 40 | 12.61 | 共产党 | 40 | 12.61 | 共产党 | 57 | 11.57 |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DPR) | 59 | 22.69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DPR) | 50 | 11.2 | 团结党 (Unity) | | 1.17 | 团结党 (Unity) | | 1.17 | 统一俄罗斯 | 315 | 64.3 |
| 共产党 | 32 | 12.35 | 共产党 | 99 | 22.3 | 祖国俄罗斯 (OVR) | 29 | 9.2 | 祖国俄罗斯 (OVR) | 29 | 9.2 | 俄罗斯民主党 (DPR) | 0 | 0.13 |
| 俄罗斯农民党 (APR) | 21 | 7.9 | 俄罗斯农民党 (APR) | 0 | 3.8 | 右翼联盟 (SPS) | | 3.97 | 右翼联盟 (SPS) | | 3.97 | 正义党 | 38 | 7.74 |
| 俄罗斯妇女 (WR) | 21 | 8.1 | 俄罗斯妇女 (WR) | 0 | 0.46 | 苹果党 (Yabloko) | 16 | 6.1 | 苹果党 (Yabloko) | | 4.3 | 人民力量 | 0 | 1.05 |
| 苹果党 (YBLOKO) | 20 | 7.9 | 苹果党 (Yabloko) | 31 | 13.8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DPR) | 17 | 6.15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DPR) | 36 | 11.45 | 右翼联盟 (SPS) | 0 | 0.96 |
| 俄罗斯团结党 (PRES) | 18 | 6.76 | 俄罗斯团结党 (PRES) | 0 | 0.4 | 其它政党 | 0 | 0 | 俄罗斯民主党 (DPR) | | 4.3 | 苹果党 (Yabloko) | 0 | 1.59 |
| 俄罗斯民主党 (DPR) | 14 | 5.5 | 俄罗斯民主党 (DPR) | - | - | | | | 俄罗斯农民党 (APR) | | 3.64 | 俄罗斯农民党 (APR) | 0 | 2.30 |
|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 (RDDR) | 0 | 4.1 |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 (RDDR) | - | - | | | | 统一俄罗斯 (PRES) | 120 | 37.57 | 社会正义党 | 0 | 0.22 |
|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NDR) | - | - |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NDR) | 45 | 10.1 | | 0 | 1.2 | | |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DPR) | 40 | 8.14 |
| | | | | | | | | | | | | 俄罗斯爱国党 | 0 | 0.89 |

资料来源：① Yitzhak M. Brudny, "Continuity or Change in Russia Electoral Patterns? The December 1999-March 2000 Election Cycle", in Archie Brown 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64. ② Tiffany A. and Troxel, *Parliamentary, Power in Russia (1994-2001, 200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48-49. ③ A.I. Podberezkina, *Rossiia (sovremennaya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Moscow: BOPD: Duhovnoe nasledie, 2000, p.259、311、558. ④ http://gd2003.cikrf.ru/prot_fed_2003.d.

在府会冲突方面，表现为政体应采总统制或内阁制之权力争执。从 1992 年 4 月开始，两者不仅在经改路线上发生争执，而且在国家体制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对国家体制的主张，叶利钦赞成采取总统制，而议会主张采取议会制。在对立无法解

决的情况下，1993年10月，叶利钦以武力炮轰议会，强迫议会解散。12月议会重选，选举结果由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i)领导的“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赢得22.69%的选票，占59个席位，成为国会多数党；而由盖达尔领导的亲叶利钦的“俄罗斯民主选择”(the Democratic Choice of Russia)遭到挫败，得到15.38%的选票，40个席位(参见表1)，暂时结束了府会冲突

叶利钦为了摆脱旧宪政体制下国会对总统权力的牵制，决定修宪来改变传统体制，以明确政府体制为美式总统制或英式内阁制，再度展开总统版与国会版宪法修正案案的府会冲突。为了取得合法性，叶利钦决定将修宪议题付诸公民投票。新宪法草案于1993年12月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获得58.4%的多数票，通过了新宪法草案，正式建立起叶利钦的“超级总统制”(super-presidential system)，或如学者吴玉山所称的“强势总统的半总统制”。^①

第二阶段：由激进转向温和改革阶段（1993年—1996年总统大选结束）

1993年新宪法通过，不仅明确了国家政体、各权力机关的职权与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亦将总统与议会之间、各政治势力及党派间的游戏规则法制化，让各政治势力的竞争全面化、全国化、透明化，这似乎带给大家喜悦，认为俄罗斯将进入政治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事实不然，议会与总统的冲突仍台面化，只是转变成“超级总统”(super-presidential system)、“小政府”(state)与“弱议会”(weak parliament)三者间权力不对称、但合法的对抗关系。^②而权力竞争的场地也由俄罗斯白宫转到国会，议会成为各方势力的主要竞技场。

这段时间，经历了1995年的国会改选(参见表1)及1996年的总统大选。在1995年的国会选举中，从参选的政党可看出，俄罗斯政党已经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依政治光谱(spectrum)大致可分为民主派(包含叶利钦总统家族与内部官员的派系)、保守左派、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派。选举结果，“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席次超越“自由民主党”，获得99个席次，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当然，共产党的得势，一部份是因国内情势有利共产党再起；另一部份原因是，选举法有5%的选举门坎，剔除掉了多数未能通过门坎的参选政党，共产党因而能囊括44%的国会代表席次。此外，相较于1993年国会选举，共产党势力再度崛起，支持改革派、保守派、民族爱国主义力量的选票在快速流失中。由此可观察出，俄罗

① “强势总统的半总统制”即总统权力相等或大于总统制的总统。参见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67页。

② 总统掌握着人事、军队和外交大权，直接领导政府；虽然议会对总理人事任命有同意权，但总统对议会仍拥有强力的否决权及解散权，议会对总统的制约相当有限。有关1993年新宪法对俄罗斯政经结构的转变。请参阅李炳南主编，叶自成：《俄罗斯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出版社，1997年；邢广程、潘德礼等编著：《俄罗斯议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斯人民对叶利钦的改革已失去信心，因为改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太高了，人民对未来充满忧心与恐惧，从而怀念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好处，重投共产党怀抱。共产党地位的再崛起与亲叶利钦党派力量的没落，增加了新议会对叶利钦总统的敌意和冲突。

在议会中，各政治党派及府会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国家改革政策、方向的争论、执政权力的取得等。由于这时期的经改成效不彰，国会与总统的权力斗争凌驾于经改议题上，导致议会对叶利钦任命的总理不满，内阁频频改组。由于议会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迟迟未改善，叶利钦担心 1996 年总统大选失利而不能连任，并且注意到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野心，决定结合国内金融寡头(financial oligarchs)与金融工业集团 (Financial-Industrial groups) 之势力，以保证总统大选成功。^①选举结果，叶利钦在第一、二轮选举中分别获得 35.28%、53.82%的选票（参见表 2）。^②打败了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G. A. Zyuganov)（其得票率第一、二轮分别为 32.03%、40.31%），再度蝉联总统宝座，持续其强势总统统治。但是，由于改革派在国会选举的失败，表现出其社会的民意基础在消退中，让叶利钦不得不妥协于现实，放缓经改脚步，对议会妥协让步，由激进转向温和路线。但是，由于议会席位仍受多数反对派控制，府会的冲突仍然会持续不断，只是比第一阶段缓和多了。

表 2 1996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得票率

| 候选人 | 第一轮(6月16日)(%) | 第二轮(7月3日)(%) |
|-----------|---------------|--------------|
| 1. 叶利钦 | 35.28 | 53.82 |
| 2. 久加诺夫 | 32.03 | 40.31 |
| 3. 列别德 | 14.52 | 4.82 |
| 4. 亚夫林斯基 | 7.34 | 1.05 |
| 5. 日里诺夫斯基 | 5.70 | |
| 6. 费德洛夫 | 0.92 | |
| 7. 戈尔巴乔夫 | 0.51 | |
| 8. 萨库 | 0.37 | |
| 9. 夫拉索夫 | 0.20 | |
| 10. 别列洛夫 | 0.1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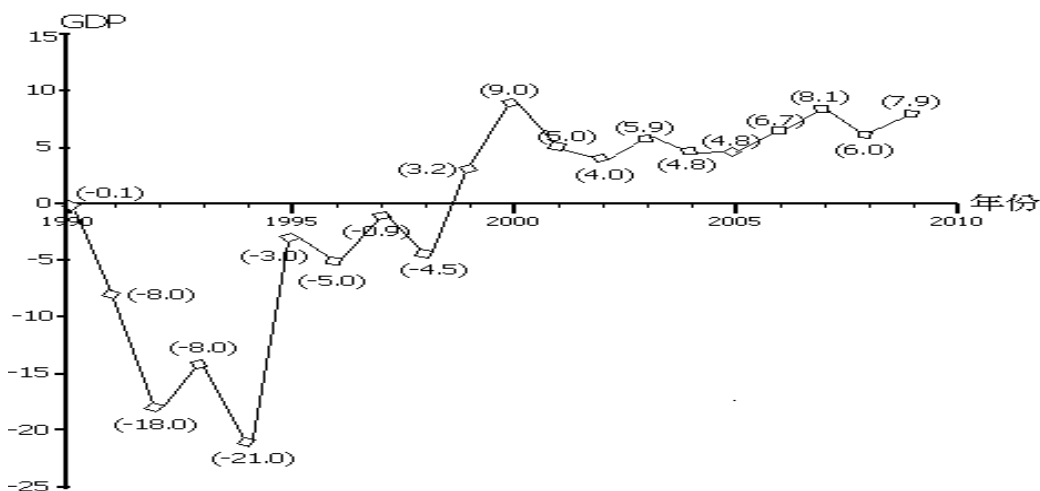
第三阶段：稳定雏形阶段（1996 年总统大选后—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辞职）

① 学者吴玉山也提出叶利钦能够顺利打败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原因除了西方的协助、高明的竞选技巧、俄罗斯企业大亨的支持外，还有共产党不妥协的性格，和行政首长选举“胜者全拿”的选举逻辑。参见吴玉山：《俄罗斯转型 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 84、85 页。

②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и (1996), <http://ru.wikipedia.org/wiki>.

经过 1993 年、1995 年两次国会选举和 1996 年总统大选后，中间派的政治势力逐渐成为权力核心，叶利钦本人及其核心幕僚的民众支持率大幅减低，以及 1994 年 12 月、1998 年 8 月两次车臣战争和 1998 年 8 月金融风暴等的影响，严重地打击了俄罗斯老百姓对叶利钦的信任，因而迫使叶利钦于 1999 年 12 月以健康为由辞去总统职位，由普京代理总统职权（acting president）。

在叶利钦去职前，这期间府会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缓颊之道则是议会与叶利钦之间的相互妥协与让步，以内阁人事异动作为条件，因此，内阁呈现高度不稳定，内阁总理历经四次更换，由切尔诺梅尔金到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普京等。总体来说，这时期府会关系基本上是和諧的。但是，适得其反的是，由于议会时常与叶利钦政府产生冲突，造成内阁人事频繁更替，严重影响了议会在老百姓中的形象。



资料来源：① Динамика мир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валового продукта (ВВП) и ВВП ведущи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по годам,% к предыдущему году. <http://www.globfin.ru/stat.htm>. ② ВВП России сократился почти на 8%.<http://www.vesti.ru/doc.html?id=350689>. ③ ВВП России в 2006 году вырос на 6.7% -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оценка Росстата. <http://www.gian.ru/economy/20070131/59991077.html>. ④ Росстат:реальный объем ВВП России за 2007 год вырос на 8.1%.<http://www.banki.ru/news/lenta/?id=463796>. ⑤ ВВП России за 2008 год вырос на 6%.<http://www.vesti.ru/doc.html?id=246158&cid=6>.

图 1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化(1990~2009 年)

此外，值得高兴的事是俄罗斯经济在 1997 年出现正成长。相对于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成长了 0.9%，是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好转(参见图 1)。1998 年因亚洲金融海啸的波及，经济又衰退，GDP 下滑为-4.5%。不过，经济的衰退幅度已经在缩小。1999 年后的普京执政阶段，政经局势稳定，加上受惠于国际油价的上涨，经济快速地增长(参见图 1)。

叶利钦去职后，普京代理总统职权、府会关系相安无事、经济出现成长等好景，勾画出俄罗斯复兴时代的来临，也是自称为“民选沙皇”、“鲍里斯一世”的叶利钦统治的结束，^①

（二）普京时期（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2008年总统大选前）

普京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以52.94%的高得票率压倒群雄，包括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参见表3)。普京登上总统职位后，立即对外宣示其强国富民、维护国家利益、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等治国方针与政策，决定抛开叶利钦的治政包袱，即权力至上、民族英雄的统治特质，展现以强调重视国家利益、国民福祉为中心的个人领导与治国作风，坚持民主与市场的改革方向，不激进也不全盘西化，要走捍卫俄罗斯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自己的路线。为了落实治国理念，在经济方面，于2000年6月、2001年1月分别公布了“俄罗斯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2002—2004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后续也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在政治方面，为了清除经济发展的阻碍，开始整肃金融寡头、垄断集团；切断叶利钦家族与班底的残余势力；重划俄罗斯联邦行政区（8个联邦区），集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降低地方的影响力；提出强国意识、爱国主义以凝聚民族的国家认同；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接收两大国营电视台；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扶持“政权党”或“执政党”（the ruling party or the party of government），通过“政党法”（a law on political party），整合政治力量；^②修正选举法，规定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政党的选举门坎（electoral thresholds）由5%提高到7%，只有通过此门坎的政党才能通过选举获得国会席位。在外交方面，则展现其刚柔并济之外交手腕，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受惠于国际油价的上涨，经济成长率逐步提升，1999—2002年的国内GDP增长分别为3.2%、9%、5%、4%）（参见图1）。

在普京积极与强势的作为下，民众的支持度也快速提升，终于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再度成功蝉联宝座，获得高达71.31%的选票(参见表3)。^③接着，在2003年与2007年国会大选中，普京支持的大党“统一俄罗斯”赢得胜利，成为国会多数政党，俨然“普京的政权党”已经成形，而且其国内政治声望与地位日渐巩固。普京除了有“统一俄罗斯”党的拥护外，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共产党”也全力支持，对普京提出的温和经改政策几乎无异议通过。所以，所有法律提案，几乎是“零审查”(zero

① 王立新：“俄罗斯民主与民主化解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第83页。

② 俄罗斯政党数量，在1992年6月俄罗斯司法部登记者高达1000多个，是世界上政党最多的国家。郭增栋：“浅析俄罗斯政党政治特点”，《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8页。

③ <http://politpskov.com/index.php/information/954-message2078.html>

reading)就被同意通过。2003—2004年期间,议会的法案通过率高达95%。^①相对于1993—1995年叶利钦时期被议会通过的法案数低于50%,可看出普京的国内政治声望与影响力超过叶利钦,俄罗斯人几乎普遍认同与支持普京的治国理念与政策。得助于顺民意、得民心的正面效应挹注,使普京的声望如日中天,国内外政绩亮眼。

在2004年至2008年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普京持续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治国目标与领导,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环境加惠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达到高峰,成为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世界经济排名由第19名进步到第8名;外汇存底累计高达5683亿美元;国民实质所得成长了1.5倍;失业与贫穷水平降低了一半;国内GDP成长率高达8%(参见图1);国内的政治环境也相当稳定。

表3 2004、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得票率

| 2004年候选人 | 2004年得票率(%) (第一轮) | 2008年候选人 | 2008年得票率(%) (第一轮) |
|----------|----------------------|----------|----------------------|
| 1. 普京 | 71.31 | 1. 安德烈夫 | 1.3 |
| 2. 哈林托纳夫 | 13.69 | 2. 弗拉基米尔 | 9.35 |
| 3. 戈拉日耶夫 | 4.10 | 3. 久加诺夫 | 17.72 |
| 4. 哈卡玛达 | 3.84 | 4. 梅德韦杰夫 | 70.28 |
| 5. 马利什金 | 2.02 | | |
| 6. 米洛纳夫 | 0.75 | | |

资料来源: ① <http://www.minjust.ru>. ②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2004、2008. <http://ru.wikipedia.org/wiki/>.

四、俄罗斯府会关系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变项分析

从以上俄罗斯府会关系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府会关系由叶利钦时期的对立、武力冲突及权力斗争逐渐转变成抗衡、合作与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主要受议会的政党政治影响。特别是普京政府与议会多数党的亲密关系,对政治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笔者拟从这些阶段中明显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变项分析之。

(一) 意识形态分歧(无法获得共识): 宪政体制、修宪形式、经改方向的差异

从1991年“8·19政变”后到1993年俄联邦新宪法公布前,是议会与总统权力对峙的高峰期,核心焦点包括三个方面:政府体制采取总统制抑或议会内阁制、经改与修宪问题。在政府体制方面,叶利钦主张总统制,议会则主张内阁制。而在经改问题方面,叶利钦主张激进改革,而议会主张渐进改革,采混合经济体制。在修

① The State Dumas, <http://prutland.web.wesleyan.edu/Documents/Duma.pdf>.

宪问题上，叶利钦主张制订新宪法，以合法化解体后的俄罗斯，而议会则主张在现存宪法基础上增修条文，其主导权由苏维埃人大为之。由于这些国事问题尚未解决，加上在苏联时期产生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直未改选，且议员大都是共产党员，与叶利钦政府不属同一政党。学者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指出：“总统依赖政党的权力现象，意味着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相对权力会时常与突然有所改变，因此，在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比在内阁中更不稳定，意即，当总统获得国会中政党多数支持，或与国会多数党同属于一政党时，就是“政党统治”(partyarchy)的表现，总统容易得到国会的支持，彼此配合愉快。反之，若总统与议会属于不同党时，则两者间会时常出现僵局，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未完全建立起政党政治前时常发生的经验”。^①以此观之，俄罗斯议会中俄共占多数议席且坚持反对改革立场，必然会与叶利钦的激进民主改革对立，而陷入权力争斗之中。所以，总统与议会在此阶段处于一种高度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叶利钦为了解决府会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决定进行公民投票与制订新宪法，以废除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②结果引起议会反弹。最后，叶利钦以军队炮轰议会，逼迫议会就范，结束了府会对峙的局面。

(二) 府会权限的偏颇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通过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弱议会”的行政与立法权力不平衡的结构。该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结构确立。依宪法对总统与议会权力之规定，俄罗斯政府体制属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国内学者称之为半总统制或准总统制)，但是总统权力凌驾于内阁与议会之上，同时掌控了相当的行政权与立法权。

依宪法规定，总统职权有：(1)经国家杜马同意后任命政府总理，任命国防最高统帅；(2)领导政府与撤换内阁权；(3)三军统帅权；(4)主导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5)解散国家杜马权；(6)立法提案权；(7)外交事务主导权；(8)紧急命令权等等。而国家杜马的权力包括：(1)总理同意权；(2)对总统的信任权；(3)罢免总统权；(4)对政府的信任权；(5)立法权与通过法律、法案等等。^③以这种“帝

① [美]阿伦德·利普哈特：《民主类型》，高德源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1年，第141页。

② 俄罗斯公民投票于1992年12月12日举行。公投四个问题为：(1)是否信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2)是否赞同总统和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3)是否认为必须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前选举？(4)是否认为必须进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提前选举？公投结果，前两个问题的回答2003年“是”的选票过半，后两问题，答“是”的票数未过半。可参见<http://lyubarev.narod.ru/elect/referend.htm>。

③ 有关总统与议会权力之详细规定请参阅叶自成著，李炳南编：《俄罗斯政府与政治》，第146、204页。

王级总统” (imperial presidency) 或“俄罗斯现代版沙皇”的权力优势, 以及在 1993 年 12 月国家杜马选举结果由支持叶利钦的民主改革派构成议会中多数的有利情势下, 相对于议会只能以有限的权力去牵制政府, 严重阻碍了议会去扮演监督与制衡政府的角色。^①

总统权力凌驾议会的情势经过 1995 年与 1999 年的国会改选, 已大为转变 (参见表 1)。从两次国会选举中, 可以明显看出, 支持叶利钦改革的阵营已经出现分裂, 同时, 叶利钦的声望地位在急速下降; 相对地, 中间温和派势力在快速崛起与壮大, 对叶利钦的权力已构成严重威胁。议会与总统关系的情势逆转, 让议会有恢复与总统抗衡的机会, 其抗衡情形如下:^②

1、1993—1999 年间, 因经改问题、外交政策、两次车臣战争等议题, 对叶利钦提出 4 次内阁总理不信任案 (前面已提及)。

2、1993—1995 年期间, 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为国会多数, 相对于“帝王级的总统权力”, 导致议会议事效率低落, 低于一半的法案能够顺利进入第一读(the first reading)议程。但是, 国会中反叶利钦的党派力量亦有足够能力杯葛叶利钦政府提出的法案, 近 1/2 的法案遭国会退回。^③

3、1996—1998 年, 被国家杜马否决的案件数及占总议案之百分比, 分别为 34 (36%)、45 (67%)、47 (63%)。

4、1996—1998 年, 总统对被国家杜马驳回拒绝无效的案件再行使否决权, 分别为 20、37、44 件。未被总统签署公布成法律之法案, 分别为 23、50、80 件。被通过并公布成法律的法案, 分别为 146、159、173 件。

5、1994—1998 年, 国家杜马通过并经总统同意公布之法律案, 总数分别为 79、228、515、159、193 件。

6、1994—1998 年, 总统通过公布之法令数, 分别为 2259、1344、1792、1392、1656 件。

根据以上数字, 可以发现, 议会中的政党因 1996 年总统选举及 4 次国家杜马选

① 台湾学者吴玉山对此也提到, 总统权限大过于国会, 可以解散国会, 亦可任免总理, 是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此也凸显出结构性的因素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请参阅吴玉山:《俄罗斯转型 1992-1999: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第 160 页。

② Tiffany A. Troxel, *Parliamentary Power in Russia 1994-2001*,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80、84、95、98、99。

③ The State Dumas, <http://prutland.web.wesleyan.edu/Documents/Duma.pdf>.

举，^①造成了议会内的政党生态发生明显变化，直接影响到府会关系的对立与合作，笔者归纳出如下几点发现：

1、议会中的政党角色已逐渐加强，表现在对总理的不信任案、法案否决权与决定权。

2、总统与议会的对抗，有逐渐回归到以宪法规定之人事任命、法案提案、否决与通过上，逐渐理性地表示反对或合作立场，而非以脱离法制、暴力冲突的形式进行权力竞争。其中，双方有出现让步、合作的态势，反映出叶利钦早已注意到不与议会合作或作必要的妥协将造成权力不保。同时，亦反映出议会政党态度转趋温和，在与总统僵持与对立之时，也顾及与总统合作之必要。

3、政党在不同的议会阶段找寻自己的定位与方向。不合时局的政党，有些被其它政党吸收整合，有些已经成风中残烛，势力逐渐减退。由此，可观察出中间派俨然已成为政坛中的主流，而共产主义派将逐渐修正怀旧传统与坚持，采用符合现代与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以重新定位自己与继续生存下来。

4、政党政治活动对社会的教化成效已表现出来。不论总统或国家杜马选举，可看出政党对社会动员、组织与教化的作用，俄罗斯人民的公民意识已在增长，公民社会也日渐出现雏形，未来其对府会关系将会有更理性及现实的选择，有助于俄罗斯政党政治之产生，促进政局稳定。

（三）党政共识的改变（政府与政策的改变）

自2000年起，俄罗斯总统权力轮替转向更合法、竞争更公平的阶段。不言而喻，这意味着普京政权已经渐趋稳固。普京于1999年8月以黑马之身出任总理后，历经2000年的总统大选，支持率由2%提升到58%。治国作风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一方面，整合国内各政治势力，打击与压制分化破坏国家社会的势力、集团，推动政党政治；另一方面争取俄罗斯人民的信任，采取以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人民福祉、提高国际地位等为诉求的对内、对外政策。结果，国内民心恢复，社会各种势力集结，转趋支持普京。普京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以获得71.31%的高票成功连任，^②、人气之旺超过叶利钦，且将俄共提名的久加诺夫的支持率挤到空前低下的水平。

当然，普京的成功并非仅凭一己之力，而是由于中间派系整合成功，组织策略

① 参与选举的政党从1993年至2003年分别为14、43、26、44个。根据司法部公布，至2003年11月16日，登记参选第四届(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的政党有44个。这些政党是依照“政党法”规定重新登记完成。实际上，在司法部登记的政党数有47个。请参考网页<http://party.scli.ru>。能突破5%获票门坎的政党数分别为8、4、6、4个。

② <http://www.minijust.ru>

运用得当与广泛的社会动员的结果。“团结党”成功整合成“统一俄罗斯”党，^①皆得力于亲普京的路线。加上普京的加持，该党在2003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37.57%的选票，赢过俄共，跃居国会第一大党，也因而被视为普京的“政权党”。总统与议会政党的合作经验，使彼此的理念更相近，府会关系将更融洽，议事效率与妥协性也会提高。所以，在普京任期内，政治持续保持稳定，而国际环境稳定、国际油价持续上升，对普京的政绩也有加分效果。进而言之，普京与党政关系日渐加温，有助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政党政治的形成及游戏规则的法制化。若无特别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对俄罗斯民主化、政党政治、政治稳定有正面的影响。

（四）议会政党政治的形成

1、叶利钦时期：多党林立、无国会多数党、无执政党

叶利钦执政初期，俄政党状况处于党派林立、社会新势力突起的态势，这些政党一部份源自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一部份从叶利钦的改革阵营分裂而来，另一部份则由爱国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份子组成。所以，大致可分类为反改革的保守派、支持激进改革的民主自由派、中间温和派、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派四类。这些党派组织松散，党纲、党章不明确，党员忠诚度不稳定，属于苏联解体后权力真空时期的产物。在1993年新宪法未公布前，各党派尚未能挑战叶利钦的权力，属于派系林立型的多党制。而围绕叶利钦身边的派别是一批改革理念相近的民主主义者，不是一个执政党，学者称之为“无执政党的政治”。^②也因此，在叶利钦独揽大权的态势之下，得以设计出一部“超强总统、弱议会”的新宪法，而无强大的反对党来加以制衡。超级总统的设计，不仅使议会难以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也阻碍了政党在议会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叶利钦公开地与金融寡头结合，造成黑金政治与金融寡头势力深入政、经、社会、媒体等各个层面。所以说，叶利钦时期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并未对政治稳定产生正面作用，反而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来源。^③

2、普京时期

由于目睹叶利钦时代政治势力的分散与对立导致政经情势极度不稳定，普京于2000年上台后，积极推动政治党派的整合，以产生多数的政党，以作为克服府会冲

① “团结党”在2000年5月改组成“团结及祖国联盟”（Soyuz Idinstvo I Otechestvo）；在2001年12月1日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Idinaya Rossiya）。<http://www.edinros.ru>

② 唐贤兴：“现代政治文明与俄罗斯的‘无执政党政治’”，《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第3页；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77页。

③ 同样地，台湾学者吴玉山也提出分析结果，1994~1999年间俄罗斯总理与内阁更动四次、府会冲突不断，政争剧烈，国家政策摇摆不定，政治极度缺乏稳定，从而影响了经济转型。请参阅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160、161页。

突之道及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柱。这一理念在普京出席“团结党”(Unity, 或Idinstvo)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具体提出, 他说道:“俄罗斯经济改革与制度改革需要有可靠的支柱”,“建设有效的政党体系是一项重要任务”。^①因而, 有了俄罗斯“政党法”(a law on political party)之产生, 以及以“团结党”为核心、结合中间力量组建的“统一俄罗斯”党。该党有“普京政权党”之称, 成功地辅佐普京于2004年总统大选中蝉联成功。此时的政党制度虽然仍属于多党制形态, 但因有“政党法”规范及中间派、右派势力的整合——分别为“统一俄罗斯”党和“右翼联盟”(the Union of Right Forces), 加上打击寡头、重划行政区为8大联邦区、整治媒体等强势作为, 此时期的党政关系处于稳定、和谐状态。但是, 从中可发现, 普京与叶利钦有相同的强人领导风格, 以及有人气指数型的政党依附关系, 是影响政党组成或联盟策略的主要原因。所以, 此阶段的政党组合、联盟、分化、竞争仍是权力倾向的, 只是这时期的权力竞争场域已从街头对抗、示威、游行转到议会内, 对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政局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 政党的性质有朝向议会政党发展的趋势。

(五) 国会选举制度的改变: 国会多数党、政党政治、执政党产生

普京为了建立起俄罗斯的议会政党政治、国会多数政党和组建执政党, 除了出台“政党法”以约束国内各党派的运作合乎法制外, 还于2007年修正了国会选举法, 以促成国会政党政治的法制化和多数党的出现。攸关政党取得权力的游戏规则变得更严苛, 则进一步利于各政治势力的重组, 国会多数党及执政党的出现将更容易。权力游戏规则的重要修订, 有如下要点:

一是提高选举门坎 (electoral thresholds), 由5%提高到7%。参选政党必须获得7%的选票才可以分配到国会席次。所以, 2007年的国会选举结果, 11个参选的政党被淘汰了7个, 只有“统一俄罗斯”党、“共产党”、“正义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4个政党获得7%以上的选票, 分别得到315、57、38、40个席次, “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多数党)。2008年4月15日普京正式宣布接受“统一俄罗斯”党党主席一职, 并全力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与2008年总统选举及获得胜利。这意味着, 俄罗斯执政党宣告产生, “统一俄罗斯”党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执政党的地位正式确定, 俄罗斯政党政治也由此宣告上路。

二是废除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单一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制度, 改成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一般民主国家实行的选举制度大致可区分为单一选区多数制或相对多数制(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 or majority system)和比例代表制两类。单一选区多数制是赢者全拿(winner-take-all), 只要在

①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的理念与实践评析”,《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第3页。

选区获得多数选票即可赢得胜利，此制度对大党及两党制(two-part system)的发展有利。相对地，比例代表制是按政党得票比率分配席次。政党得票越多，获得的席位越多；反之，得票越少者，获得的席位越少。此种制度，对小党有利，但容易造成政党林立。

2007年选举法修改以前，俄罗斯议会的选举制度采取德国制，混合了单一选区多数制和PR制，学者李发特称之为“混合的比例代表制”(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MMP)。根据1993年10月叶利钦公布的“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及“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代表选举条例”，俄罗斯最高立法机关为俄罗斯联邦议会，由国家杜马(下院)及联邦委员会(上院)(Sovet Federachii)组成。联邦委员会的议员有178位，以PR方式从89个联邦主体中各选出2位。国家杜马由450位议员组成，其中225人以单一选区多数制选出，另外225人以PR选出；而且，政党得票率不得低于5%的选举门槛才有分配席次的资格。此门槛，学者又称为“阻挠点”(cut-off point)，对小党有相当大的限制作用。在选区规模方面，PR部分俄罗斯采取以全国为范围的单一大选区；而单一多数制则将全国划分成225个小选区，每个选区选出1个名额。学者李发特认为：“在混合制中，大选区可以弥补小选区在席位上造成的失衡(disproportionality)。”

鉴于过去议会党派林立，以及府会之间高度的冲突与对峙情况，不仅造成议事效率不彰，而且影响到内阁与政局的稳定，因此普京决定整顿国内政治党派，以减少派系林立和政治对立。2007年公布的修正后的选举法，宣布以比例代表制(政党比例代表制)选出国家杜马全部450位代表，废除过去其中225名代表以“单一选区多数制”产生的选举办法。此外，参选政党的得票率提高为7%，必须通过此门槛才可进入国会。新选举法实行后，从2007年国会选举结果可以观察到四点影响府会关系由对抗转向和谐的要素，亦是影响政治稳定的原由：

第一、参选的政党皆是俄罗斯司法部登记在案，最后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核资格无误的政党。

第二、1995年、2007年选举法规定将政党获得国会席位的选举门槛提高为5%、7%后，减少了能进入国会的政党数，由1993年的8个缩减到2007年的4个(1995、1999、2003年分别为4、4、4)(参见表1)，发挥了避免政党林立、提升议事效率与政党协商机会等功效。

第三、国会多数党产生。1993、1995、1999、2003年进入国会的政党数目虽然已经降低到4个，但是都未能构成国会的多数。因此，在国会议事进行中，党派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因意识形态分歧而产生冲突和对立等现象仍难以避免。2007年选举法再度提高门槛到7%，不仅限制了国会政党数，而且形成了国会多数政党，即“统

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从普京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成功获选后，即全力拥戴和支持普京政府，最后，在 2004 年、2008 年总统选举时，大力推举普京、梅德韦杰夫，让其高票当选总统。“统一俄罗斯”成为国会多数党与支持政府的政党，明显地，普京时期的府会关系是和谐、合作的，政局高度稳定。

第四、支持政府的执政党产生，府会同属一个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3 年国会选举中，虽然获得国会多数，120 席，但非绝对多数，议事顺畅与否仍然必须取决于与议会中其它 3 个党派的合作。至于普京是否全力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愿意加入该党成为党主席，普京的态度仍未明朗，所以，2000—2007 年前府会关系处于彼此试探与磨合状态。但是，大致上，“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时期全力拥护与支持普京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关系可将其视为“准执政党”（quasi-ruling party）。

2007 年国会选举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政党，“准执政党”的地位与声望日高。此时，普京个人的政治地位与声望也达到了高峰。执政的顺利与政治声望的累积，强化了普京的政治企图心，不仅冀望 2008 年总统选举能够如愿让其选定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成功当选，同时，也希望形塑国会成为中央与地方贯彻总统政令的倡导机构，而不能成为牵制总统的绊脚石，以实现权力集中的治理。2008 年 4 月 15 日，普京终于点头答应接受“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一职，宣告俄罗斯第一个执政党正式产生。此后，“统一俄罗斯”党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党，亦是执政党，府会关系的和谐性与政令的一致性，是必然的趋势，对政局的稳定相对是加分的。由此，可归结出，俄罗斯国会绝对多数党与执政党出现的重要性，尤其是府会同属于一个政党，其对俄罗斯政治稳定与政党政治的发展有绝对的影响，有助于带领俄罗斯朝向“责任的议会民主”（accountable parliamentary democracy）发展。但是，相反地，议会中绝对多数的政党与执政党同属一个政党时，容易造成多数独裁的议会政治，以及议会成为政令传声筒等弊端，无形中导致民主退步。因此，未来俄罗斯要朝向民主的政党政治发展，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治与文化，最理想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绝对多数政党，而是形成有竞争且能合法轮替的两大政党，即两党政治。

五、结 论

综合俄罗斯府会关系之分析，可以发现，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来自四大变量：第一、宪政体制、修宪形式、经改方向的歧异；第二、府会权限的偏颇；第三、党政共识的形成（政府与政策的改变）；第四、议会政党政治的形成。这些变量对政

治稳定的影响是否符合定义所述，笔者最后拟以这四大变量与定义相对照，进一步诠释俄罗斯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之影响，作为个人研究的心得与结论。

第一、就政治稳定是一种无变迁的状态、指一种事物长久不变的状态而言，俄罗斯的状况与其并不吻合。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在叶利钦时期的敌对、武力冲突、宪政危机与权力划分的偏颇，严重危及政权的稳定——内阁生命短暂、频繁（4次）更替、国人对政府失去信任、武力对峙等等，明显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第二、就政治稳定是一种有适应变迁能力的状态而言，在叶利钦阶段，也可以说是没有的。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叶利钦解决问题倾向于以武力、军队、炮弹、集权及勾结社会政经势力等方式为之，而非以民主的协商机制与包容方式处理。可见，是在以民主的糖衣掩饰其专制与霸权的真实面貌。

第三、就政治稳定是一种合法性状态而言，叶利钦政权遭到人民的唾弃。民众以议会敌对、街头抗议、议会选举投反对票等方式逼其辞职下台，显示叶利钦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无法符合人民的期待，对政治稳定造成极度的威胁。而对普京而言，恰巧相反。因政党、府会与人民的向心力遽增，认同其治国方针与领导模式，当然政治稳定相对高于叶利钦时期。

第四、就政治稳定是一种持久性的民主政治而言，俄罗斯也是明显不吻合的。那是因为俄罗斯在转型中，且以激进的方式为之，方才出现转型过程中的乱象而危及到政治稳定。所以，持久的民主政治在俄罗斯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的，包括普京现在与后普京时代，还须经历一段相当时间的考验。

第五、就政治稳定是一种均衡状态而言，正因转型初期权力与社会资源分配未能取得各方均衡与共识，才会出现各方的分赃与争夺，结果是两败俱伤，付出的社会成本更多。

第六、就政治稳定是维持宪政秩序而言，俄罗斯府会争执的主要核心也正在于此。虽然目前宪法以“强总统”与“弱议会”的权限来框限府会关系，塑造合法的宪政政治秩序，但两者间权限的失衡与偏颇状态，仍将呈现。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宪政体制的偏颇会被修正，但修正过程与方式不会再出现叶利钦时期的武力炮轰，而会倾向以民主机制与程序为之。

第七、就政治稳定是政治权威持续的状态而言，叶利钦时期的政治权威，包括总统、内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皆受到挑战，直到叶利钦让普京代理总统职位，并日渐取得各方的信任后，普京的政治权威才得以持续至今。

第八、就政治稳定是不存在政治暴乱与骚动而言，叶利钦时期可说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时期充满对立、抗议、暴乱与骚动，具体的证明以叶利钦下令军队炮轰议会为最。

第九、政治稳定系于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换句话说，在于政党的共识、妥协、包容与法制精神等民主素养的养成。俄罗斯政党的民主政治素养是否会形成，还需一段很长的观察时间（从过去至今已花了 14 年）。于此，产生了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另一个困局，即“时间问题”（the issue of time）。^①当然，改革的脚步应选择激进或渐进路线，在叶利钦与普京任期中的府会关系已找到答案。也因此，学者将叶利钦的改革形态称为“革命的转型”（revolutionary transition）。^②相对于叶氏，普京采取稳健理性做法，创造了“俄罗斯的盛世”。若未来（后普京）的执政者即梅德韦杰夫(Dmitry Anatolevich Medvedev)总统能持续普京作风，在最佳组合“梅普配”的运作下，^③引导俄罗斯国内政党政治健全发展，与政党和平权力转移，可预期地，绝对会带来进一步的政治稳定与和谐的府会关系。

总而言之，叶利钦时期的府会关系充满对立、冲突、僵局，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几度近乎危及政权。然而，在普京阶段，府会关系缓和，由“无执政党”的府会关系到“准执政党”的府会关系，政治稳定显著提高，并持续至后普京时代。今日，后普京时代即新总统梅德韦杰夫时代的“梅普配”产生的新府会关系，将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谓“总统-议会-政府”三头马车驰骋俄罗斯政坛，带给俄罗斯新气象与新动力。由此，可以明确归结出结论：在目前的宪政体制安排下，从俄罗斯民主转型经验中可以确信，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有显着的影响。影响因素，包括：府会的意识形态、权限关系、党政共识、议会政党政治、国会多数政党与执政党关系等，其中尤以国会多数政党、执政党的产生为最。普京时期，国会多数政党与执政党同属于一个政党，府会关系相当和谐，政治稳定度高。但美中不足之处是，容易造成普京以“准总统”的超权力独揽议会与行政大权，塑造普京强人统治的俄罗斯政治，影响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因此，未来最有利于俄罗斯府会关系与政治稳定的政党政治发展，应是两党政治的建立，而非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目前的状态，短期或过渡期而言，虽然对政治稳定与政令贯彻有利，但长期而言，对民主发展是一种伤害，一种退步。

【 Abstract 】 The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party politics'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important criterions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Instead of

①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1.

② Michael McFaul and Markov Sergei, *The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Parties, Personalities, and Program*,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9.

③ 2008 年 5 月 8 日俄罗斯杜马通过普京总理任命案，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也签署命令，正式任命普京为俄罗斯新一届总理。<http://news.qq.com/a/20080509/003380.htm>.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ok radical policies in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to restructure destroyed econom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re appeared serious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 in the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which impacted the government's prestige and the nation's survival especially during the Yeltsin period. Afterwards, when Putin came into power, the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was reversed and the country was brought to a new peak. Such a major change was principally thanks to that Putin has adapted the domestic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cluding implementing "Party Law" to integrate the political forces leading to the embryo of party politics, which has great effects o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has absolute effect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particularly including the nation's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arty politics' influences which was concretely demonstrated during Y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In other words, Russia's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obviously affect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parliament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Key Words】 Russia, Government-Parliament Relationship, Political Stability, Putin, Yeltsin

【Аннотация】 Влия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и партий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тличитель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демократии. С распадом СССР и появлением РФ, были приняты радикальные меры по проведению политики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и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комплекс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период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парламентак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роявились серьёз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повлиявшие на доверие 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Ельцина.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ситуация претерпела изменения, парламентак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акже изменилис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шли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та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утины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инятие "Закон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с целью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стране появился прототип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то оказал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Замет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парламентак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артий. Изучая периоды правления Ельцина и Пути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лия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в России парламентак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парти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грает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утин, Ельцин

(责任编辑 姜睿)

无处不在的身影 ——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林精华*

【内容提要】东正教在俄国远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俄罗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后苏联成为俄联邦重构的重要社会资源、政治力量和精神动力，被视为是标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标志。在后苏联到来过程和重建过程中，东正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源于俄国的历史进程。其实，无论是就基督教神学理论还是就俄国史而言，缺少了对东正教因素的考虑，就无法描述俄国社会进程。近20年来，俄国社会进程和东正教紧密相关，因此，当代俄国人能基于东正教信仰，去批判性地面对后苏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除此之外，东正教还积极介入俄罗斯的对外事务，成为影响俄对外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东正教 后苏联俄罗斯社会 介入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108-(20)

历史和现实都显示出，东正教在俄国远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俄罗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后苏联成为俄联邦重构的重要社会资源、政治力量和精神动力，被视为是标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标志。

后苏联著名理论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在他的《未来之后：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与当代俄国文化》(1995)中说，自基辅罗斯以降，尤其是学习西方的18世纪以来至今，俄国文化是不断循环的，但无论怎样循环，“社会的”、“道德的”、“宗教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的”和“审美的”四因素总是同时起作用，且宗教的因素主要是东正教^①。而东正教在后苏联的复兴，更是与政治变革、社会进程、道德重建和审美重构等相互融合的，成为后苏联俄国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正如普京在那篇已成为俄语经典文献的《千年之交的俄国》（1999年12月30日《消息报》）中所说，“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不仅是每位信徒的道德准则，也是全体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以博爱思想、良好戒律、宽恕和正义为本。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俄国文明的特性。千百年来，它那永恒的真理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人民，给他们以希望，帮他们获得信念”，“对基督教的卓越评价在两千年前就有了，但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深远的意义。我坚信，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中加强互谅和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督教理想是可能达到的，也为祖国的精神和道德复活做出了贡献”。显然，东正教作为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在俄国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影响包括对外关系在内的任何重大战略的制定，及其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实施程度。

这一现象是令人感兴趣的。天主教会对于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自16世纪以来就不断下降，而随着更多的民族国家兴起，政教分离的趋势成为20世纪以来的国际性潮流，导致基督教和佛教影响国际事务和国家内部政策的程度大大降低。那么，为什么在经历了苏联时期那个无神论时代之后，东正教在后苏联的俄罗斯社会进程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左右后苏联俄罗斯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后苏联到来过程和重建过程中，东正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源于俄国的历史进程。其实，无论是就基督教神学理论还是就俄国史而言，缺少了对东正教因素的考虑，就无法描述俄国社会进程。其中，世俗化程度大大提高的1850—60年代，在国家支持下，东正教堂仍然遍布全国每个角落，职业神职人员超过10万人，东正教徒占成人总数的73%^②。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的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无法叙述国家的历史。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③。马克思对东正教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因为他是在相对自由得多的德国新教氛围中成长起来，

① Mikhail Epstein, *After the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Amherst., 1995, pp. 79–88.

② Е. Грекулов, *Церковь,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 Москва, 1969, С. 4–2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1–142页。

看不惯高度政治化的东正教，相反，他切实抓住了东正教的实质。按别尔嘉耶夫的《东正教中的真理》所言，“（在俄国）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在组织，不是外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道路”。他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思想》中更声称：“东正教信仰就是俄罗斯信仰，不是俄罗斯的信仰——也就不是东正教的信仰(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есть русская вера, не русская вера—не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①。德国和俄国思想家的这种认知，得到了俄国著名文化史学家米留科夫(1859-1943)的证实。他在其名作《俄国文化史论》中说：“如同其他文化一样，（东正教）教会(церковь)和学校(школа)是俄国精神文化的两个主要因素”，“在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中，教会和宗教的文化影响绝对地占据着主流地位”^②。

苏联时期，这种成为俄国民族性组成部分和文化传统存在方式的基督教，虽然因苏俄推行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神论意识形态而遭到大破坏，但苏联末期还是不得不恢复了东正教的合法地位。1986年3月，苏共27大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此后就迅速同意开放教堂，许可国民自由信教，开始有限度地容许组建宗教团体。继而，东正教会提出政治诉求，如1987年5月6日，“祖国俱乐部”领袖维克多·瓦索利耶夫带领6千人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性游行，名义上是要求重建代表斯拉夫民族信仰的东正教教堂，实际上是最早提出了要把俄罗斯民族认同与苏联国家观念相分离，把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的斯拉夫文明视为苏联存在的基本依据。此举后来居然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俱乐部的力量迅速增长，并扩展到很多加盟共和国和东欧。

殊不知，东正教一旦在苏联合法化，就和伊斯兰教一道，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之一。1988年在苏联政府支持下举行俄国接受基督教千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很快地，就有4位宗教领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年10月苏联颁布《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从法律上完全肯定了组建宗教团体的合法性。这种政治生态环境的巨变，导致苏共进一步放弃其意识形态，进而也就使苏共领导国家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最终使苏联迅速解体。然而，东正教在促进后苏联时期到来过程中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却使东正教在后苏联时期的重要地位得到了确认，东正教也成了俄联邦法律特别保障的对象。如1997年9月俄联邦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和批准的《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特别确认：“俄联邦为世俗国家，

① См. Н. А. Бердяев, Правда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Кризис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а и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русском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ышло на немецком в журнале Orient und Occident, 1929, №1. (Клепинина, №341);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1997, С. 249.

② П.Н.Мило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2, Ч.1, М.: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 1994, С. 15, 17.

承认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俄国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尊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它们是俄国各族裔历史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02年2月又通过《俄联邦传统宗教组织法》，进一步确保国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肯定东正教之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作用，保障东正教组织展开正常活动等，这就更刺激了东正教会及其领袖、团体对俄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力。诸如此类的情形表明，东正教已经成为后苏联时期俄国进程的重要力量。

正是这些政治和法律行为，意外地建构了全俄性的东正教氛围。在这种氛围中，1990年代宗教界和社会就组建了几十个渗透有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性东正教组织，造成“东正教民族主义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人群之一。具体说来包括：1995年底，全俄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领导创立了一年一度的论坛“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Всемир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собор)，由当时的教会对外联络部部长、现在的大牧首基里尔负责。该论坛吸引并团结了分布在国内和国际不同领域、不同倾向的政治家、宗教领袖，如普京就出席了2001年底举行的第六届论坛。以后的论坛他虽未再亲自出席，但每次必致贺信。1995年秋天创立、199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参与的东正教公民联盟(Союз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граждан)，包括俄共等激进的政党、新闻出版界团体都积极参与其中。1988年底出现的Радонеж兄弟会，由商人叶甫盖尼·尼基弗洛夫所创立，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宗教政治团体，有自己的学校、报刊、出版社等一整套机构，既积极参与东正教的政治活动，又吸引一些东正教人士和政治组织参与其中。此外，还有1991年创立、后逐渐由东正教领导的东正教兄弟联盟(Союз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братств)，1992年创立的东正教—民族主义大众媒介(电视频道和杂志)《俄罗斯之家》(Русский дом)，1995年斯拉夫书面文化国际基金会创立最大的民族爱国周报《俄罗斯通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都主教约翰·杜舍诺夫创立的月报《东正教罗斯》(Рус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以及《俄罗斯之线》(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等。这些规模不小的东正教团体和媒体，汇集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成为后苏联时期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俄联邦的政治导向和社会变革走向^①。这些团体，连同一年一度的全俄东正教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和最后发表的宣言，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东正教在后苏联时期越来越成为俄国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得以有效表达的重要途径。这些在著名政治活动家帕里贝洛夫斯基(В.Прибловский)所编纂的简明词典《俄罗斯民族爱国团体》(1995)中有所表述。换句话说，东正教在后苏联时期的复兴，是和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相关联的。这正是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俄国民族主义运动乃是一部保卫俄罗斯的宏大历史，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Русск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ы, 1995-2001 гг. М.:СОВА, 2003.

而俄国作为一部巨大的启示录图景的组成部分，可以描绘俄罗斯民族意识是如何涨落的。20 世纪末，这个问题变得明朗了——我们的民族未来必将和东正教同时继续存在^①。既然如此，俄国政府的任何重大政治举措和外交行为及其实施，都很难不考虑如此声势浩大、融合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的东正教复兴运动。

正是在这种融合民族主义诉求的东正教氛围中，东正教会和政治相互联姻，使东正教合法地介入后苏联社会进程有了政治和民意的支持。相应地，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政治组织、社会名流也能合法合理合情地动用东正教作为政治资源。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和政治家谢尔盖·莫兹格沃伊(Сергей А. Мозговой)在为《1990 年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国的作用：政治与宗教的变化动力》(2009)所写的序言中说，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复兴了东正教，“东正教堂成了许多热心于基督教价值的人的道德基础——救赎、道德生活、履行戒律”，东正教吸引了许多政治家参与其中，东正教会也积极参与后苏联俄国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活动，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②。这种表述没有夸大事实：1991 年 4 月叶利钦率领一些官员参加复活节活动，公开宣称自己出生于信仰东正教的家族，并于 1993 年 1 月 7 日(东正教圣诞节)去莫斯科大教堂参加教皇主持的圣诞节祈祷。普京也同样声称母亲背着父亲给他受洗，他特别珍惜母亲送给他的十字架，任职总统后每年新年总会去一所教堂和信徒共度新年。1991 年 7 月，全俄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见证叶利钦总统就职典礼，并致贺词说，“人民选择了您，您不仅对人民而且对上帝都负有责任”；1999 年岁末叶利钦辞职和普京担任代总统，大牧首成为政权交接仪式的见证者，并且时任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负责保管叶利钦和普京签署权力交接的秘密协定。以后历次总统就职典礼，大牧首都是很重要的现场见证人。2007 年议会大选前，普京把 17 世纪波斯沙阿(国王)阿巴斯送给大公米哈伊的沾有耶稣殉难时所流鲜血的耶稣血衣^③送给俄罗斯东正教会，更显示出东正教在俄国的政治地位。

也正是在重大社会事件总有东正教的身影活跃于其中的事实，使得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东正教的俄共，也和其他绝大部分政党一样，都积极和东正教融合。1996 年大选期间，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拜访牧首时称，“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他并保证，若俄共在大选中获胜，不会实行苏共的无神论政策。著名的《黑色百人》报主编在俄联邦第二次总统大选时发表文章称，“我不是作为主编，而是作为普通的俄罗斯人，去支持俄共久加诺夫，以此

① A. Solzhenitsyn, *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 century*.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5, P. 88-107.

② Greg Simons, *The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since 1990: 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N.Y. :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P. v.

③ 参见 http://www.riza.s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Itemid=45.

誓死捍卫民主，不让国家和人民分裂、社会分化。我们满怀希望，久加诺夫能改变局势，减弱西方对俄国的致命影响”。^①。而东正教方面也希望和包括俄共在内的政治团体合作，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政治资源。同样是在第二次总统大选中，神父阿列克谢(奥斯塔耶夫)在《俄罗斯通报》(1996年第6—8期)上发表的《小心，亵渎神灵者》一文称：“较之和东正教徒联合，俄共的意识形态很快更要使共产党人或者和民主派或者和天主教徒结盟。因为正如上帝有一个敌人——恶魔及其帮手，东正教俄国也有一个敌人——私通者和罪孽深重的世界，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向它妥协的”。他吁请俄共和东正教会合作。对此，东正教会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家德米特里·杜德克在《论摆脱危机》(1998)一文中说，“我想，一般地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走向东正教”^②。俄共和东正教的这种关系，显示出俄国人对平等、人权、自由的追求，并表明，和东正教息息相关的传统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俄国仍有巨大生命力^③。当然，俄共和其他政党一样，已经脱胎换骨成为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的政治团体，不再是苏联时代的政党。1999年夏天，彼得堡的政治活动家在和俄共为总统大选磋商候选人名单后证实，久加诺夫及其党团已经“进化”为东正教民族主义政党，和东正教集团“俄罗斯之家”相当^④。可以说，在后苏联，主导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事务等不同领域的重要人物、党派或团体，很少有不信仰东正教的。政治上是否获得东正教会的支持，结果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影响到地方政治，如1999年选举州长时，库尔斯克教区主教塔拉索夫强化东正教原则对社会的影响力，结果帮助了支持东正教的州长亚历山大·鲁茨柯伊连任)。正是这样的情感，使东正教有可能直接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进程的不同环节，并能更快地取得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效应。

东正教在对后苏联社会进程的政治介入过程中，更自由地参与后苏联重建的方方面面。1994年3月，国防部长和东正教会牧首签署联合声明——教会负责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军队中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快超过5000人，完全取代了苏联时代的政委制度。1994年，莫斯科政府听从牧首劝告，建立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基金会，开始重建被苏联政权1932年炸毁的东正教最大教堂。6年后，这个世界上13个自主东正教会中最大的教堂终于建成。此后，在以恢复历史原貌为诉求的各大城市重建潮流中，更多的是修缮东正教堂和新建教堂，此举重新唤起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在1994年之前，俄联邦教育部就宣称东正教可以进入教育领域。阿

① От редактора // Черная сотня, № 32.

② Русь Державаня, 1998 № 11-12.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отков, Миссия Росси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социализм в ххi веке. СПб.: Русский остров, 2008.

④ Время собирать камни // Рус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1999, № 8.

列克谢二世 1994 年 12 月 29 日会见教育科学院院士时发表东正教之于俄国教育的作用演讲以及稍后在第比利斯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发表演讲《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当代世界上的作用》(《教会与时间》1998 年第 1—4 期)就宣称,东正教教育过去帮助俄国人坦然面对世界,在目前这个转型时代更需要东正教的引导。相应的,俄罗斯成立了四所东正教大学和成千上万所大小规模不等的宗教学校,而且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地去国立大学和中学宣讲神学,东正教伦理学成为必修课,中学高年级还开设了《东正教世界观与现代自然科学》、《进化与神学》之类的选修课,各中学则普遍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课程。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学术界重新发掘东正教作为俄国民族精神的现代文化资源意义。包括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舍斯托夫(1866-1938)、神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1871-1944)、M.格尔申棕(1869-1925)、C.弗兰科(1877-1950)、别尔嘉耶夫等在内的著作不断重版。它们和圣经一道,成为后苏联俄罗斯社会重建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与东正教有关的许多历史问题(如俄国与拜占庭关系、“莫斯科—第三罗马”概念等),成为知识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外,电视栏目《神父的话》(中央第一频道每周六 9 点)、《东正教百科全书》(中心频道周六 8:30)、《圣经故事》(文化台周六 10 点)等,以及地方台栏目《教会日历》、《忏悔》、《东正教之晨》、《和神父对话》等,纷纷开办。1995 年举办的国际东正教电视广播汇演,有 100 多个国家的东正教教会和媒体代表前来参加。此后,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东正教会的这种越界现象,导致东正教成为后苏联俄国最为醒目的社会景观。按《剑桥东方正教神学指南》(2008)的说法,“神学家、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关注弥赛亚与福音书,关注教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位置。这些讨论和争论,不仅发生在教会圈子中,而且在社会的更大空间、报纸和公共论争中产生反响”^①。可以说,各种现象表明,东正教的确成为后苏联俄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和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这样全方位地介入后苏联俄国的重建历程,必然影响到俄国社会对双边国际关系或其他与俄国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之认知。

正是东正教与政治联姻并全方位介入国家重建过程,使东正教有可能成为重建俄国认同的重要力量。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和稳固以后,大批教会人士和知识分子流亡境外,加上苏联长期推行无神论,侥幸逃脱的神职人员不断加入侨民队伍,从而使侨民有可能在国外成立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1920 年 11 月,成立了以安东尼(1863—1936)都主教为首的临时最高教会管理局(后来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最高管理当局),并于 1922 年 2 月以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名义发布“告

^① Mary B. Cunningham & Elizabeth Theokritoff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rthodox Christian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62.

世界代表会议宣言书”，宣布和莫斯科东正教会分立。1927年，苏俄本土教会承认苏维埃政权，海外教会与本土教会正式分离，海外教会公开宣称莫斯科东正教会是邪恶的敌基督组织。1950—1960年代和1970—1980年代的移民潮，给国外教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信徒，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外教会的势力。面对国外教会的主教最高会议所辖的350个教区、超过百万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以及198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宣称希望回归的心愿（“苏联完结之日便是国外教会使命完成之日”），俄联邦政府，尤其是普京时代，加大了国外侨民认同祖国法案的财政预算，并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海内外教会统一，最终促成了2007年5月17日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国外教会都主教拉夫里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共同主持教会统一的庆典。此事当即被俄国社会各方面视为当年俄国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后苏联时期最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这种合并，使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等地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成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吻合俄国推动全球俄侨认同祖国的战略。

除了直接促进海外俄侨统一到祖国认同上来之外，东正教还在国家认同之类的国内事务上有很大的发言权重。后苏联时期宗教合法化的过程，也复活了穆斯林族裔作为独立民族的记忆，激活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这在高加索地区则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波及到现在的北高加索联邦区——北奥塞梯-阿兰、车臣、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印古什等共和国，甚至导致两次车臣战争。而这种情形并非临时性的族裔诉求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而是历史的延续：1552年俄罗斯以武力夺取喀山汗国后，伊斯兰教开始被迫成为其中一个部分；18世纪以来为夺取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这些穆斯林地区，进行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征战，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著名文学家都曾参与过这样的战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穆斯林居民遭受的创伤更甚于东正教徒。后苏联俄国改变了这种状况，宪法规定俄联邦是保障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所有宗教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而在理论上东正教并不比伊斯兰教更优越。这样，就与东正教的尊崇地位形成了悖论。“东正教要成为主导宗教的主要障碍，是关于所有宗教皆平等的致命谬论。理智健全的东正教徒是不需要解释东正教是真正的信仰、其他信仰在相当程度上是谬见的”^①。面对这种落差，尤其是车臣战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制造的诸多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都主教基里尔呼吁，“永远要记住，俄罗斯由来已久就是东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相交融的。作为欧亚国家，我们不是超越个人愿望，而客观地期望沿着这两种文明的边界线来建立我们的生活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则声称，“我是绝对反对使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исламский

^① А. Степа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мысла // Рус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44; Ср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4 января 1997.

экстремизм)概念的, 因为这是对等的, 我们若说东正教或基督教极端主义, 就会伤害全体东正教徒”^①。这种呼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国民的认可, 在北高加索地区, 东正教和当地穆斯林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已故的外高加索大主教格杰声言, 东正教从未打算进攻穆斯林, 而是希望相互支持,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这种主张是有其基础的。在北高加索地区, 东正教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帝国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 使得当地俄罗斯-斯拉夫族裔居民的比重与穆斯林相当, 东正教堂和清真寺并存, 这样便保证了这个地区俄罗斯-斯拉夫族裔移民的精神归属, 能缓解相互对抗的情绪, 达到与伊斯兰教居民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 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之间不采取激进态度^②。可见, 东正教之于俄罗斯, 是关乎国家完整的问题, 为后苏联时期多族裔地区重建俄罗斯国家认同提供了有效保障。

可以说, 知识界共同认同俄罗斯国家成于东正教, 是基于俄罗斯主体民族多信仰东正教, 这种情形是俄国历史在当代的合法延续。这种情形, 使东正教能成为直接介入后苏联俄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后苏联社会的变革, 重新演绎了俄国历史是教会参与的情景: “俄罗斯信仰即东正教信仰, 因为罗斯、俄国和俄罗斯概念之形成和光大就得益于东正教。若罗斯过去没有东正教, 那么也就没有罗斯自身……”^③, 这便是俄罗斯东正教不仅仅是纯粹宗教领域的信仰问题的实质所在。哪怕俄罗斯宪法上规定政教分离, 但东正教和社会进程如此密切融合的结构, 客观上使俄罗斯实行和落实任何重大战略, 在相当程度上都要考虑到融合了东正教诉求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重建后苏联俄罗斯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支撑

后苏联取代苏联, 也就放弃了苏联的无神论, 使得东正教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 并与国家政治生活相互渗透。苏联解体之后就从小格勃格退职、任教于莫斯科外交学院并组建俄罗斯经济安全服务处的尼古拉·列昂诺夫(Николай Леонов, 1928—)在其《俄国 2000—2008: 衰退抑或上升》(2009)一书中说: “普京可能是宣布无神论作为国家宗教政策的 1917 年以来最虔诚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苏共责成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 成为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为敌视宗教的国家, 如有计划地消灭神职人员、毁坏教堂和宗教崇拜的祭品。很难想象俄国如此仇视自己的俄罗斯历史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С. 40-41.

② С. Раздоль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и Кавказской епархии и их роль в культур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Майкоп: СКНЦ ВШ, 2006.

③ Защитим веру от богохульников // Черная сотня, 1996, № 32.

史和传统，要炸毁救世主大教堂去建造苏维埃宫”^①。无神论给予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俄居民以巨大的创伤记忆是很难被遗忘的，如遭遇迫害的东正教信徒无以计数，斯大林最后十年关闭教堂达 14000 座左右，仅解冻思潮之后的十年间就有几百万人从集中营获释。

可是，俄罗斯东正教是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苏俄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所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即使是在推行无神论意识形态最甚的 1937 年，在唯一一次涉及宗教信仰内容的苏联人口普查中，仍有 56% 的居民承认自己是东正教信仰者^②。在东正教合法之初的 1990 年代初，有近两千万苏共党员声明自己同时信仰东正教(超过党员总数一半)^③。俄联邦时代，成为主流信仰的东正教，信仰者人数不断上升，从六千万发展到七千万，至今在理论上有一半的俄罗斯国民是东正教信徒^④，以至于 2002 年的人口普查已不再涉及宗教信仰问题(但 2006 年初专门就东正教问题的调查数据表明，自认为是东正教徒的俄国人已占到国民的 60%，即超过 8 千万居民信仰东正教)。不仅如此，宗教合法化不久的 1988 年，苏联很快就有了 9600 座教堂，同时许多父母和祖父母带着孩子来到教堂受洗。今天有超过 130 个教区(即全国一半以上的教区)有自己的学校或学院，有 170 名左右大主教，星期日学校超过 1 万所，有两万多座教堂分布全俄各城市的每一个社区、村镇，仅莫斯科就有大小教堂 720 座、神职人员超过 1500 人，吸引了大量的大学生加入其中，莫斯科的东正教圣季洪神学院有教师 500 多人、全日制学生 1000 多人、函授部 3000 多人^⑤。东正教之如此成规模，成气候，其效应早已超出了宗教领域，“对俄国许多政治集团和社会团体而言，包括民族主义者，东正教不是扮演客观的角色，保存下来的并不比族裔和强国、文化或文明认同的特征更多或更少。这类大大小小的集团表现出对东正教的尊敬，但在现实中其意识形态的基点并不仰赖于它”，如苏共、俄共、自由民主党等，都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密切^⑥。这些数据显示，东正教信仰者是俄国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而且他们分布于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政党、团体、组织，他们的价值趋向一定会对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及其实施发生影响。

近 20 年来，俄国社会进程和东正教紧密相关，因此，当代俄国人能基于东正教

① Николай Леонов, Россия 2000-2008: закат или рассвет. Киров: Русский Дом, 2009, С.339-352.

② Felix Corley, Relig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 Archival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6.

③ Известие, 4-01-1990.

④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 июня 2001, С. 8.

⑤ А.Ефим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иссионерств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 ПСТГУ, 2007, С. 635.

⑥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русск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ы, 1995-2001. М.: Октябрь, 2003, С. 7.

信仰，去批判性地面对后苏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国民的公共伦理道德水平急剧降低、环境破坏等现象的批判，更为激烈。例如，1990年代，杜马党团就经常为俄国经济改革是“人民资本主义”还是“野蛮资本主义”展开过持续不断的辩论。

这种情形的发生，并非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国政界、民间社会刻意所为，而是俄国社会由东正教主导的特质所决定的。东正教区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正是它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痛恨私有制，更不会赞同消费社会的价值观。按教会经济思想史学家C.布尔加科夫所论，东正教主要是适合农业生产地区，以及工业和货币资本主义意识薄弱的国度(节气和农事安排与基督教的种种要求对应，这个经济生活带来许多光明、温暖和宗教诗意，摆脱了工厂劳动的机械性)。“东正教不捍卫私有制本身，甚至不捍卫天主教所确定的私有制，天主教会把私有制看作是自然法的规定(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新事物》通谕)。私有制是一种历史制度，其内容和社会意义总在变化，它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都没有自足的和永恒的意义”，“东正教也不能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因为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基础上的，尽管东正教可以暂时容忍资本主义，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它有自己的功绩”，而这两个原则都适用于现代社会^①。此类论点，远非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俄罗斯东正教大部分信徒的共识，也影响了俄国社会进程。诸如“贫穷能使富人富裕起来。富裕则使穷人穷下去。不相信这样的箴言，意味着穷人会被富人剥削”之类的谚语，在俄国是深入人心的^②。正是这样的认知，使大部分俄联邦国民尽管获得了比苏联时代多得多的政治自由，但从心底却不能接纳后苏联时期所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

有意思的是，俄国在推行私有制过程中，反对资本主义的东正教却能深入人心。这种情形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原因：

1、东正教作为俄国主体民族的信仰，实际上是超出宗教领域的社会伦理行为，并且渗透进斯拉夫-俄罗斯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出生、结婚、离婚、生病和去世、劳作、交际等实践领域，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人的一生所经历的，无不显示出东正教的深刻影响^③。在后苏联时期，东正教这种超出宗教领域的魅力继续保持着，并且演化成对世界的认知范式。按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所言，“我们生活在宗教世界。因而，教育、科学和教会必须结盟，以共同对付神秘主义、恶魔、邪教和异教。宗教教育是保障我们的儿童和青年

① [俄]C. 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9-217页。

②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деньгам. М.: ДАРЬ, 2006, С.

③ В. Лещенко, Семья и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x-xx вв.).СПб.:Фроловой Т. В.

的重要条件”^①，“信仰的产生和强化不是因为理性——而是上帝对人的神秘赐予。可以确信，从理性观点看，宗教信仰有诸多矛盾。可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能见到神迹——即使不是信徒。‘东正教不是证明的，而是展示的’，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②。这种现象和论述都表明，后苏联俄国的确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无神论，宗教影响之深刻和广泛是难以估量的。要理解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就必须了解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影响。

2、俄联邦所进行的一次次私有化改革，实际上保留了许多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和医疗等)，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能源、交通和保险等)。换句话说，后苏联俄国号称是要建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化程度很高，如经常以国家政策干预市场运行和经济生活。而每一次并无法律依据、只使用现行法律条文去打击金融寡头的行为，却得到广大国民的支持。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批评的东正教是阻止俄国走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形，在后苏联时期仍然明显地存在。这种情形很多，如东正教兄弟联盟 2000 年发表的经济纲领就包括：“(6) 石油、天然气、森林和矿业立即国有化；(7)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8) 制止资本外流；(9) 重新清理生产中的交易投机及其所造成的财政洗劫；(10) 重新恢复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11) 不许发放电能和天然气价格许可证”^③；与此相类似，基督教复兴联盟(Союз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发表的经济纲要同样称：市场经济是野蛮的经济，“这是一滩浑水，在其反俄罗斯和反基督教的资本中，成功地运用其经济工作洗劫和奴役俄国。因此需要一场激烈的思想—经济战争。必须回到国家监控俄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按国家经济增长标准处理国家和市场调节之间关系的做法将要改变。必须且应该坚持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和团体利益的原则。我们应该拒绝快速进入任何价值的世界市场的概念。俄国经济的开放，会导致俄国无力抵御外国的跨国企业之侵略”^④。这些不仅仅是言论的表达，也是后苏联时期融合东正教和民族主义的诸多政党和团体的主张，是杜马反对叶利钦式的改革所依据的“合法性”。而社会上许多融合东正教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某种程度的联合，并不是按商业利益方式进行的，而是根据东正教信仰去组织、依据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去行动的。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反复诟病俄罗斯以国家行政力量限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之所在，但西方并不进一步去批评这种限制背后的强大民意基础——东正教。可以说，俄国推行在保证全体国民生存权前

①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Ру. 18 июня 2001.

②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4 декабря 1998 г.

③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0, № 47-48.

④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программы СХВ // Сайт СХВ <http://cxb.chat.ru/program.html#eko>.

提下的私有制，那些和国家利益有关的个人、团体、行业获得最大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东正教理念；而东正教在后苏联时期的发展给民众带来的福祉，是促使政府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正是阿列克谢二世所期望的——“知识分子是否明白，东正教不仅属于过去的俄国，也属于未来的俄国”^①。时任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都主教与全俄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基里尔在会见俄联邦委员会委员谈到免除教会税收问题时曾公开说，“今天社会期待宗教组织的不仅仅是负责宗教崇拜，而且还参与决定和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②。

3)成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东正教活动，连同全民还原东正教原貌的文化补救工作(如恢复了苏联时代禁止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合法地位，而这些人有不少是宗教哲学家，或受益于宗教哲学而成长为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主张认同俄国要与信仰东正教一体化)，使得俄罗斯东正教教义(包括《旧约》38部分、《新约》和七次大公会议通过的《信经》等所宣扬的崇拜圣母玛利亚、坚信原罪、对救赎的特别投入、肯定末世论、相信爱等)，不仅成为俄国主体民族的普遍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社会重建的共识。如在世纪之交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就流传过这样的预言：“在基督耶稣出生的第二个千年末，正在变成现实的末世论的狂风暴雨到处肆虐着”。充满着奥秘的东正教教义，帮助俄国人去面对转型时期的困难，诚如叶利钦总统在纪念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被炸毁60周年集会上发言所说，今天全国上亿的居民哀悼为庆祝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而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堂被炸毁60周年，“我深信，在残酷改革的艰难时期，东正教会可以帮助人们，给予他们力量，强化他们的信仰。尤其重要的是，宗教界现在能帮助和支持被迫陷入困境的人们”^③。或者说，原本是东正教神学的内容，成了后苏联时期俄国人的信念，哪怕它与个人主体性或市场经济的机制相矛盾。

当然，这种情形使我们看到，后苏联时期的价值观与苏联时代的主流认识之不同在于，东正教活跃于后苏联国民的观念中，使全球化时代的后苏联俄国自觉地与国际社会保持相当的背离(与苏联时代用意识形态同西方社会隔离是不同的)。然而，俄罗斯没有把始终在防御甚至进逼它的欧洲和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2001年10月初，在圣彼得堡举行了“全球化和心灵救赎”圆桌会议。会议的基调是俄国应该和西方一道治理世界，如著名的政治学家谢尔盖·格里格利耶夫声称，要承认东正教意识

① Алексей 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яя Руси. Церковь и духов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слова, речи, послания, обращения, 1990-1998. С. 771.

② О. Тропкина, Церковь хочет жить без податей // Известия, 29 октября 2004, С. 2.

③ Г. Штриккер (сост.),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ью (Книга 2). М.: Проппелей, 1995, С. 328.

对于全球化过程的作用。他说，“彼得大帝已经具备这样的立场，因此俄国成为强大的帝国……我确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使人民哪怕在复杂条件下仍坚守对上帝的信仰”，这种信仰唯有基督教文明才具备^①。

东正教作为超越宗教界域的重要力量，广泛地活跃于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此其一；其二，后苏联俄国试图建立公民社会，同时受囿于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情结，而这种情结与俄罗斯东正教信念纠结在一起，就希望国家强大要有适应时代的经济支撑。也就是说，发展经济不是以公平的法律方式推行惠民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能更好地强盛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方式，即国家应该具有世界性水平的科技经济，这正是库切连科和卡拉什尼科夫在《东正教国家与技术革命》(1999 称)所宣称的，“东正教国家的物质基础、下一个千年突破口的保障，可能正是俄国的技术革命。我们确信，未来俄国将成为由许多大公司组成的国家，在这些公司中有高级的综合——我们创建军事—工业综合体，同时致力于国民的经济利益”^②。这种越出宗教界关注社会经济变革问题的现象意味着，东正教实际上远不只是从精神上与无神论对抗，而且还切实介入社会经济发展。

可以说，俄罗斯东正教全方位介入后苏联进程 20 年，促进了俄国社会从苏联时代向后苏联时期的迅速转变。其之所以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不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及包括无神论在内的苏联式意识形态的退场，而由东正教填补信仰真空，而是因为俄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俄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一向和东正教相关联。正因为东正教介入后苏联的社会进程，从而使在理论上应该更为动荡的后苏联社会重建过程却相对平稳，同时东正教会本身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以东正教会领袖的身份履行政治家职责而获得崇高声誉。如 1997 年 9 月 3 日他和叶利钦共同主持莫斯科建城 850 周年的庆典仪式，时任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在庆典致辞中高度评价东正教会和牧首本人对莫斯科城市的贡献；1999 年 2 月 23 日阿列克谢二世 70 岁寿辰，全俄举行庆祝活动，如大剧院专门上演纪念性演出，国家政要、著名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陪同他观看，并且授予他以圣徒安德列·别尔沃兹瓦内命名的最高国家勋章。

介入俄罗斯对外事务的又一种力量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介入国际政治，远不限于苏联时代的口号“为世界和平而战”。2003 年初阿列克谢二世出席俄联邦外交部的外交委员会议，阐述了俄

① Рус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1 № 10.

② Русский дом, 1999, № 8.

罗斯东正教会参与俄国外交战略任务的愿景，和东正教会把国家引领到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他说，“按东正教会的意见，俄罗斯应该成为世界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中心之一”。在这年 2 月的“外交工作人员日”庆祝会上，大牧首致辞说：“在俄国对外政治的诸多传统中，好几个世纪以来，是在至圣东正教会的切实影响下延续的。致力于和平、坚持遵循崇高的道德理想、关怀不幸、公正地帮助弱势、反对别国压迫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友好邻邦，这些俄国外交行为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支持，是东正教会参与对外政治的职责所在”^①。对东正教会积极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历史事实、意愿，时任部长伊凡诺夫完全赞同，并特别强调，和东正教会紧密合作能更有效地凸显国家利益。而且，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东正教参与国际事务的确不只是一般性的言论表达，而是有具体的行动：就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看似终结、实际上演变为恐怖主义袭击的 2003 年，是年 11 月 26 日，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莫斯科会见了高加索地区宗教领导人——全格鲁吉亚宗主教伊利亚二世(Илия II)、全亚美尼亚宗主教加列金讷二世(Гарегиний II)、高加索伊斯兰教领导人等，导致格鲁吉亚教会拒绝支持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而支持其反对者，成为前者后来下台的重要原因。爱沙尼亚东正教会服从其国家利益，减弱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依赖，彼此争论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声明它要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2003 年 10 月阿列克谢二世陪同普京访问马来西亚之前，总统通过努力，预先使俄罗斯东正教会获得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组织会议的资格，从而密切了两国关系。不仅如此，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和国家协作，积极处理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巴以冲突等重大国际事务。

实行政教分离的俄联邦出现这种情况，本质上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政治诉求决定的。在后苏联时期被尊为经典的索洛维约夫《大争论与基督教政治》(1882—1883)看来，“人的灵魂的美好追求，基督教良知的最高愿望，都会向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业贴近，而不再与此对立。不应当自我欺骗：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非人性和强暴政治，最终已经危害了个人道德和家庭道德，这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能局部地看到。人终究是逻辑动物，他不能长久地忍受个人活动规范和政治活动规范之间的巨大分裂。因此，即便只为了拯救个人道德，也应当防止把这种分裂变成原则，防止使人一方面对自己的同胞给予基督教的爱，对他国公民至少是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当他作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时，却受拦路抢劫者和非洲野蛮人的观点的支配(‘善就

^① 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 поздравил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Отдела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2003, № 2, С.13-14.

是我从邻人那里夺来了他们的畜群和女人，恶就是他们夺了我的这些’)”^①。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亦然，这正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弗洛洛夫斯基(1893—1979)在《俄罗斯神学之路》(1934)中考察东正教神学发展历程所发现的——要超越政治来理解东正教的精神和神学反应是很困难的。这种情形，在当代著名的东正教史学家维尔霍夫斯基《政治的东正教：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和原教旨主义的东正教，1995—2001》(2003)一书的描述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基督教爱国主义，同时表现在对待作为族裔共同性和国家公民共同体之民族的态度上。东正教吁请热爱有其自己疆域的祖国，爱同根同族的同胞，哪怕他们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侨民。东正教爱国主义应该是积极有效的，表现在抵御外敌、为祖国福祉而工作、关怀人民生活，包括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基督教吁请保护并发展民族文化和人民自觉意识”^②。立足于俄罗斯帝国重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是教会的愿望，也是社会普遍的共识，自基辅罗斯引进东正教开始，就意味着教会和国家之间有密切关系。“东正教一直是俄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且不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有国际政治。

论及俄罗斯东正教会介入国际政治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其重构了世界图景。在它的世界图景中，天主教和新教及其分布的区域(西方)，是其分庭抗礼的对象。具体来说包括，1054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导致基督教世界中的东正教实际上是远离了欧洲，在教会合法性、教会权力分享、争取信众支持、宗教话语主导权等方面与天主教之间构成竞争关系，从而使得鞑靼蒙古入侵基辅罗斯公国时，大公宁愿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野蛮族裔合作，而与信仰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及北欧人抗争。1439年在佛罗伦萨举行东西方教会和解、合并会议，莫斯科都主教伊西多尔作为东方教会代表赴会，却因以莫斯科教会名义签署东西方教会合并协议、承认罗马教皇系基督在人世间的代表，回来后遭到大公严厉处罚(逮捕入狱)，并在1448年莫斯科各地主教谴责佛罗伦萨会议的会议上，正式解除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公署对他的任命，提出须由罗斯人担任莫斯科的都主教且称之为“莫斯科和全罗斯都主教”(约拿主教成为第一任都主教)。瓦西里之子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利用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的机会，在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之侄女索菲亚之际，把自己视为拜占庭皇帝的直接继承人，擅自把拜占庭双头鹰徽号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并支持莫斯科教会自命为全东正教的中心，帮助教会建立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以证实东正教在罗斯已经发展成与君士坦丁堡平等的自主教会。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时，神学家菲洛费伊提出了“三个罗马”概念，从理论上论述了(俄)罗斯东正教

① [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论文集)，徐凤林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С.118.

的正统性，声称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比罗马基督教更具有拯救世界的使命。1589年，鲍里斯·戈东诺夫利用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发生经济危机并来莫斯科公国寻求帮助的机会，迫使拜占庭承认莫斯科教会为独立的牧首区，可以自行任命自己的牧首，成为继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五个牧首区。诸如此类的过程说明，表面上是古俄国在基督教信仰上和欧洲发生了关系，实际上，日趋体制化的东正教，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认同罗马公教、马丁·路德改革和加尔文改革所催生的新教以及英国皇室宣布脱离罗马教会而创建的圣公会。

这种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在苏联政权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得到了延续，即更严厉地打击境内的天主教和新教，与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西方国家关系处于冷战状态。例如，1948年基督教各教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希腊正教会和其他一些正教会均派代表出席，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却拒绝参与。1961年，莫斯科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1964年大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访问英国商谈合作事宜时却声言，“若要谈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统一，那只能统一到唯一正确的莫斯科东正教之下”。而后，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延续了历史上的这些纷争、对抗。柏林墙倒塌之后，按理说，后苏联时期的东正教无法再成为俄国和西方保持裂痕的因素，况且许多修建教堂的善款还来自当时还属于海外教会的信徒，或者那些捐款很多的富豪已经侨居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希望重建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如阿列克谢二世曾与梵蒂冈教宗通信，以期解决双方纷争，并强调双方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然而他们却特别强调天主教徒在乌克兰对东正教徒的压迫，不能原谅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罪恶。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成为自主教会的过程中，已经决定要积极介入基督教的国际纷争，从而介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成为俄国与西方对抗的重要力量。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仍坚持不同于天主教和新教而继续反西方的倾向——“大牧首不把西方视为恶，但看作是反对俄国的恶的某种储存所，他批评西方文明追求物质的蜕化：积攒巨大经济利益并自居于世界政治中心，想方设法行进在满足消费需求之路上，确信经济动力万能，能把科学进步和权力的民主结构联合起来，产生邪恶的力量”。时任都主教的基里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学概念基础》(2001)对西方文明进行了似是而非的表述：“西方作为另一种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不会更高”。著名的东正教民族主义刊物《俄罗斯之线》副主编安纳托里·斯捷潘诺夫更主张：“不要忘记，俄国从根本上是反西方的力量。作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俄国始终是反抗西方的。但这不妨碍俄罗斯帝国坚守欧洲政治主体性，参与欧

洲不同的政治联盟和集团。现在应该回到富有成效的实践中来”^①。可见，成为俄罗斯帝国认同一部分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主导性思想和行动原则，是与世界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基本上处于不和谐状态，从而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也相应地紧张。

实际上，俄罗斯东正教会重绘的远不止是欧洲基督教区域版图、介入欧洲地区的国际政治，还要重绘世界版图。我们知道，历史上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帝国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力量。随着帝国的扩张，东正教会也走向远方，出现了阿尔泰、喀山传教团。随着俄罗斯东正教徒足迹所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虽然历尽艰辛，国外教会仍然在寻找机会积极介入重大的国际事务，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如国外教会都主教拉夫尔 2004 年 6 月在伊斯兰教组织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上宣称：“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保证国际共同体的一致性，以创造更公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而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联邦政府的期待^②。换句话说，在神学上具有严重排他性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不仅难以与罗马教会和新教和谐发展，还借助政府力量，不友好地对待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佛教，甚至于是已经于 2007 年回归了莫斯科东正教会的海外教会。对此，2004 年普京在纽约会见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都主教拉夫尔时说，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东正教国外教会是一体的，“从俄国融入世界的观点来说，(你们这两个教会)彼此一步步接近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③。

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欧洲或其他地区宗教机构的纷争，在后苏联时期是俄国重新认识世界的自然结果。这一点在圣彼得堡神学院主办的《全球化的精神和 社会问题》(2001 年 5 月 3-4 日)学术会议形成的共识中可以得到印证，即俄国因为有东正教信仰就更有理由反全球化。具体包括：“1)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基督教世界观并且与之不相容的。经由世界精英的努力，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世俗社会和教会得到了深入和普及，表达其利益。全球化生动体现了要建立超越民族主义的统一世界政府的乌托邦理念。2)俄国作为东正教的信仰、文化和传统之保存者的国家，这种历史性召唤没有得到承认并被世界政府所否决。而且，已经言明的价值具有普遍的意义。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国家成为试图建立世界统治之路上的障碍。3)目前全球化过程在俄国的最主要表现，是改变了传统价值体系和基督教道德伦理、人的思想简单化、使人们习惯于自觉的强迫性认同”^④。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С. 38-39.

② А. Петров, Курс на сближение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7 июля 2004, С. 2.

③ Н. Контантинов, Отношения Церкв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лизки к оптимальным» // НГ-Религии, 2004, 1 марта, С. 1-2.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ховский, С. 90-91.

总之，东正教在后苏联俄国进程中扮演了远超出宗教的角色，俄国成为大国并创造灿烂文化，得益于俄罗斯东正教。近 20 年来，历届政府不断密切国家与东正教会之间的联系，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因其成功促进东正教积极介入国家重建、引领国民经由东正教去认同新俄国而被认为是圣徒。教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使国民适应变革的作用，还弥补了苏联价值观失落之后所留下的真空，沟通了历史和现在，并且使当代文学艺术和文化的生产有了精神归依。教会还成功地把海内外俄罗斯东正教徒聚集在一起，不再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并且试图建立世界东正教共同体。这种情形正如普京 2004 年圣诞节向阿列克谢二世祝贺时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教会法和国家相分离，但在我们的灵魂里、精神中则始终是相连的”；“按宪法，我们当然是民主国家，但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中，我们自始至终相信专制政体”^①。然而，东正教之于俄联邦越是重要，也就越加剧了俄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

(本文写作得到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支持)

【Abstract】 Orthodox in Russia is far more than a religion, but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cial resource, political power and spiritual impetu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f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us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symbol of Russian national spirit. After the arr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process, the Orthodox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which stems from Russia's historic process. In fact, as far as both Christian theology theories and Russian history are concerned, Russian social process could not be describe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Orthodox. In the past 20 years, Russian social proces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rthodox and, therefore, contemporary Russians can face various major issues caused by post-Soviet social changes critically based on Orthodox faiths. In addition, the Orthodox is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Russia's foreign affairs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for Russia's foreign relations.

【Key Words】 Orthodox Church, Post-Soviet Russian Society, Impact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России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сто религия, оно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носителем рус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но стало важ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ресурс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лой и духовным стимулом в дел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① Новое время, 2004, №3, С. 4.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й символ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уха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грала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роцесс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траны, и эта роль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будь то те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или сам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ложно описать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не учитывая фактор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20 лет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процессами в России,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яне,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азличным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вызван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Кроме т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уе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лах России, и стала важ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й нельзя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лияние

(责任编辑 黄翔)

* * * *

(上接封3)

- 19日 俄罗斯向波兰移交 11 本关于 4 月 10 日在斯摩棱斯克近郊失事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 (Lech Kaczynski) 专机的调查卷宗。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 (Rosatom) 总裁谢尔盖·基里延科 (Sergei Kirienko) 确信, 萨罗夫周围发生的火灾不会构成任何核威胁和生态威胁。
俄联合造船集团 (OSK) 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将在 9 月份宣布招标, 为海军采购和建造航母。
- 22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 泰国当局向美国引渡俄罗斯商人维克托·布特 (Victor Bout) 的决定不合法, 且带有政治色彩。
- 23日 俄罗斯安全总局称, 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组织者、达吉斯坦非法武装头目穆罕默德·阿里·瓦加波夫 (Muhammad Ali Vagapuff) 被击毙。
- 24日 俄罗斯内务部长表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以及非法移民对关税同盟成员国构成极大威胁。
- 25日 俄总检察院称两架苏—27 歼击机在去年 8 月“马克斯—2009”航空航天展前夕的飞行演练中相撞坠毁的事故起因是飞行表演队队长违反了飞行规定。
- 30日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称俄中双方将在 9 月份之前完成起草有关实质性的对华供气条件协议, 其中将包括价格计算公式。
- 31日 俄罗斯“瓦尔代”(Valdai) 国际辩论俱乐部第 7 次会议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7 日举行, 会议主题是“俄罗斯: 历史与未来发展”。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埃莉维拉·纳比乌林娜 (Elvira Nabiullina) 表示, 处在可能私有化名单上的俄罗斯自然垄断企业和国防企业明年不会被私有化。

(龙腾辑)

历史·文化

海兰泡的俄名释义*

沈 坚**

【内容提要】海兰泡原属中国，19世纪中叶《瑷珲条约》签订后被割让与俄国，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从俄语语源、历史事实和俄罗斯传统文化来看，该俄名实非占领黑龙江左岸土地后单纯地向沙皇“报喜”之意，而是来源于该地以东正教节日命名的教堂之名。

【关键词】海兰泡 瑷珲条约 东正教节日与教堂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5-0128-(8)

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地当结雅河汇入黑龙江处，为阿穆尔州首府，与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隔江相望，是目前中俄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该地原属中国，曾以海兰泡而闻名于世。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城二名，透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印记。在现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名中，则非个别现象。中国人早先所称的伯力，俄人改作了哈巴罗夫斯克，庙街则谓尼古拉耶夫斯克，双城子称乌苏里斯克，海参崴又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如此等等，都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之产物。

中俄两国曾远隔千山万水，疆域并不接壤，随着16、17世纪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东来，始渐接近当时中国的东北边疆，亦即当时统治民族满族的祖居地一带，从而产生了彼此间的疆界问题。1689年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首次确定了两国在远东大致的边界走向，即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界。而上述所提各地，皆处中国疆界范围内，中国各族居民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素来通行的都是中国地名。可以说，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这一带并无正式的俄语地名。但此后因

*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世界史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B406。

** 沈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势益衰，沙俄趁机进逼，这些地方接连丢失，方被冠以俄国名字。具体说来，海兰泡系 1858 年中俄《璦琿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割让黑龙江左岸至外兴安岭之间 60 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才为俄人所完全占有。

就地名学角度而言，“海兰泡”一名，源自于“哈喇泊”的讹传，本为传统的中国民族语言。“哈喇”在满语、蒙古语里，即“黑色”之意，“泡”或“泊”为汉语词，东北一带居民习惯将小湖泊、池塘通称“泡子”，“哈喇泊”意即“黑泡子”、“黑河”^①。如此说来，海兰泡地名与江右岸今中国黑河的地名实为同义。考虑到《璦琿条约》前黑龙江原即中国内河，两岸同族同文，两个居民点采用同一地名^②，或原来就是一个居民点，只不过形成隔水而立的两部分，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 1858 年签约割地之前，俄国人便自贝加尔湖以东一带沿江顺流而下，开始渗入中国境内的黑龙江流域，进窥以至直接染指这块富庶而又颇富战略意义的土地了。1856 年，沙俄哥萨克在位于黑龙江左岸的海兰泡建立了最初的军事哨所和移民定居点乌斯季-杰伊斯基（Усть-Зейский，意为“结雅河口之村”）。1857 年升格为镇一级居民点，称乌斯季-杰伊斯卡亚（Усть-Зейская）。由于更多军人和移民的进入，大大加快了居民点的增建。1858 年 5 月 28 日（俄历 5 月 16 日）《璦琿条约》签订，海兰泡遂被划入俄国版图。乌斯季-杰伊斯卡亚镇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后，同年 12 月 20 日（俄历 12 月 8 日），沙皇正式批准设为城市建制，被指定为新建的阿穆尔省行政中心。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地名含义究竟是什么，其取名出于何意？对此存在不同的解释。

国内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名意为“报喜城”，系沙俄当局依据《璦琿条约》侵占当地后改名而成，含有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报喜”之意。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该名本义实际上与此无关，而是缘自海兰泡地方一座同名的布拉戈维申斯基教堂，其意原为“圣母领报节”或“天使报喜节”。

前一种说法，却一直言之凿凿，几成主流。那么，它究竟能否成立？又是从何而来的？

① 参见邵献图、周定国、沈世顺、冯圣葆、王世珍、霍郁华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第 85 页“布拉戈维申斯克”条；周定国：“俄罗斯远东七个地名探源”，《地理教学》2004 年第 11 期，第 8 页。

② 例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隔江相对的中国黑河，亦说先曾有“海兰泡”之谓，详见臧励稣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 年，第 727 页“海兰泡”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第 773 页“海兰泡”条；《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2534 页“海兰泡”条。

从目前所查阅到的资料看，其最早出典似为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纂的《沙俄侵华史》一书。书中在描述《瑷珲条约》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改名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瑷珲条约》的签订，使沙俄统治集团欣喜若狂。五月三十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引者注）穆拉维约夫急急忙忙地派专人前往彼得堡报功。亚历山大二世得知穆拉维约夫‘不战而胜’地夺得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喜出望外，特地接见了信使，并且在奏稿上批示道：‘谢天谢地！’

六月二日，穆拉维约夫为‘庆祝’《瑷珲条约》的签订，在海兰泡集会，悍然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穆拉维约夫的‘积极赞助者’，披着宗教外衣为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奔走效劳的大主教英诺森特别举行感恩祈祷，吹捧穆拉维约夫为俄国‘在这辽阔无垠的黑龙江流域’‘开辟了远景’，‘完成了不朽的业绩’；说什么‘即使子孙后代有朝一日将你遗忘，……我们东正教教会也会永远把你铭记心上！’^①

上述文字虽未提供确凿的直接证据，但值得注意的仍有两点：一是指明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名即系“报喜城”之意；二是认为该城的改名，乃穆拉维约夫所为，是出于向沙皇报喜。这样，命名同经由《瑷珲条约》割占中国疆土之事便产生了直接的因果关联。

该书近年又曾修订再版，经笔者查核，再版后相关段落的文字，未见任何改动，依旧维持原状^②。这表明，作者对此的看法没有变化。

这一说法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的国内一些出版物和社会舆论中，是颇有影响的。以笔者所见，凡涉及沙俄侵华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建城改名的，似乎较多地接受并沿袭了此说。只是有的表达得更为直白，像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一书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词目，就明确表述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在俄语中意为报喜城，表示俄国殖民者侵占该地后向沙皇报喜之意。”^③其他书刊媒体、网络资料的相关倾向，亦多相类^④。笔者采访布拉戈维申斯克时，陪同的中方导游就是这么介绍的，想来他们引以为据的“旅游指南”，大约也都这样讲。显然，这一说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138-13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4 页。

③ 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第 85 页“布拉戈维申斯克”条。

④ 参见姜涛、卞修跃：《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555 页；武立金编著：《东北亚地名词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9 页“布拉戈维申斯克”条；周定国：“俄罗斯远东七个地名探源”，第 8 页。

同相当时期以来国人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及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是颇为吻合的，恐怕也是得以广泛传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笔者却感到，这样的解释并不准确，至少是一种误读。

对“布拉戈维申斯克”一词的确切涵义，其实应从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视野出发，这里不光有着沙俄对于中国黑龙江流域国土的侵占，还关涉到一个更为深厚却极易为我们所忽略的民族语言及宗教文化背景的问题。

首先从俄语词源本身来看。作为地名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源自于Благовѣщенне，其释义为：“[宗]报喜节（耶稣教所传，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谓将生耶稣，俄旧历 3 月 25 日）”^①，强调的是该词特有的、也是仅有的宗教属性，舍此并无其他涵义。笔者所查其他俄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均无实质差异^②。在俄罗斯东正教的十三大节日中，该“报喜节”全名“天使报喜节”（俄历 3 月 25 日，相当于公历 4 月 7 日），也译称作“圣母领报节”（圣母领受讯息之谓，但国内常见有误作“圣母报喜节”的），以纪念圣经中有关童贞女马利亚借圣灵受孕而生耶稣一事。

因此，国内学者的文章中，便也有直指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个名称和宗教节日有关”，或基于教堂之名的^③。俄罗斯方面则更以从不含糊的语气指明该城取名于教堂^④，把城市和教堂之名加以直接联系的观点，在国际上似乎也较普遍^⑤。笔者请教过的一位俄罗斯友人，同样持有类似的想法。

此处所谓的“天使报喜节”，实际上有其特定涵义。据查《汉俄词典》，其中相当于汉语“报喜”之意的俄语对应词语，例如：известить о радостном событии, сообщить радостную весть 及 рапортовать об успехах^⑥等，表达的无非是“传报好事与喜讯”、“通报成就、胜利”一类的意思，上述词汇与Благовѣщенне这样的宗教专词是有区别的。即如有人想象的那样带有向沙皇邀功或“报喜”之意，体现或使用的词语也应仅从一般世俗意义出发，而不太可能使用具有宗教意蕴的Благовѣщенне，这一点恐怕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单纯依照中文习惯而望文生义。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名的确切释义，应该是宗教意义上的“报喜节城”（尽管这一节日本身或亦被赋予了某种喜庆色彩），而非世俗层面上的“报喜

① 刘泽荣主编：《俄汉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6页。

②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大俄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0页。

③ 张冬梅：“俄罗斯教堂及一些地名名称趣谈”，《俄语学习》2003年第2期，第58页；www.hlmohe.gov.cn/htm6/bnmh-azzycz.htm15k；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256389.html。

④ 参见http://suslovas.narod.ru/Blag/index.htm。

⑤ 例如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Incorporation, Vol. 4, 1997, p.50.

⑥ 《现代汉俄词典》编写组：《现代汉俄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城”——“‘报喜’之城”，虽一字之差，却具本质之别。

问题还在于，对 Благовé щенне 这一宗教节日的中文译释原本就有“天使报喜节”和“圣母领报节”两说，同词异译，并无差别。前者既可简化为“报喜节”，后者自然也可简称作“领报节”；我们为何只突出和强调前者，采用前者而引申出向沙皇的“报喜”之意？依据同理取后者，亦自无不可，那么又该由谁“领报”呢？

其次从史实来看。

1858年5月21日（俄历5月9日），穆拉维约夫偕同东正教勘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三地大主教（牧首）因诺肯季（即上述引文中所提的英诺森，俗姓韦尼阿米诺夫）抵达乌斯季-杰伊斯卡亚镇（海兰泡），同日举行了当地首座圣母领报（天使报喜）教堂的奠基仪式。^①此时正值黑龙江流域春暖开冻未久，大江重又通航，取名天使报喜节教堂，恐非偶然，在俄罗斯人的时令观念里，天使报喜节这一天即意味着“春天战胜冬天”，^②万物复苏，前景喜人。次日（5月22日，俄历5月10日），穆拉维约夫便率其随从乘坐武装快艇过江，到璦琿与中国清政府代表、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举行谈判。

乌斯季-杰伊斯卡亚镇何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往所见说法不一，上述《沙俄侵华史》一书主张6月2日说，也有人说是8月^③，而《璦琿条约》的签订是在5月28日。总之，给人的印象不外乎签约在前，改名在后，当然也就易于引发某种基于因果逻辑的联想，尤其是当着我们曾经举国沉浸在愤怒声讨老沙皇侵我疆土的时代氛围与情感激流中时，“报喜”一词当然就具有了特殊的内涵与鲜明的指向性。

其实，问题原本是并不复杂的，《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曾对改名的日期和理由有过清楚的交代。俄历5月9日，穆拉维约夫在抵达海兰泡的当天呈递给圣彼得堡俄国阿穆尔委员会主席、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第30号书面报告中，列举了海兰泡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认为“有必要在此地建立一座城市”，他在提到因诺肯季大主教是日“为圣母报喜教堂举行了奠基仪式”之后，随即提议“宜将新城市命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④这就是说，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初衷和缘由，早在《璦琿条

① 参见<http://suslovas.narod.ru/Blag/index.htm>；当然该教堂的最后竣工与祝圣仪式是到了数年后的1864年，参见[俄]阿·基里洛夫：“一八五六——一八九〇年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宋嗣喜译，《黑河学刊》1985年第4期，第61页。

②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8页。

③ 周定国：“俄罗斯远东七个地名探源”，第8页。

④ [俄]A. 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北京师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师生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0页。译者在本页的注解中标明，这里所指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é щенск）这一名称来自圣母报喜节（Благовé щенне）一词。”

约》谈判开启之前即已定下。由于圣彼得堡与远东之间关山阻隔，传信迁延，又经亲王转奏，沙皇对穆拉维约夫报告的批示，迟至俄历 7 月 6 日（应为公历 6 月 24 日-引者注）。“但在圣谕下达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于俄历 5 月 12 日（公历 5 月 24 日-引者注）为新城市举行了命名仪式”。^①时距《瑗珲条约》正式签字还有四天，所以，新城市的命名又怎么会与条约存在因果关联？穆拉维约夫从瑗珲签约返回海兰泡的次日，即 5 月 30 日（俄历 5 月 18 日），因诺肯季大主教为庆贺此事而“举行了感恩祈祷”，随后，穆拉维约夫又设宴款待当地的全体俄国官员，^②都没有提及该城的改名。同日，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呈报有关签约事项的奏疏（第 38 号）地点落款处，即已明白标示“于阿穆尔河畔布拉戈维申斯克”，^③这就给此前改名已然完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佐证。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曾被《沙俄侵华史》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来源而多处引用，但不知为何没有提到这些文字？

从以上所引来看，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命名者，就是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穆拉维约夫，当然也有人言及是来自因诺肯季主教的建议；^④其取名完全出自教堂，“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概是在摒弃了其它提名考虑之后决定采纳的。^⑤但无论如何至少表明，在选取新城市的称谓这一点上，穆拉维约夫和因诺肯季两人的看法并无相左，而且命名的时间也早于《瑗珲条约》的订立，与之无关。

当时的俄国教会及其代表人物尽管支持沙俄政府的扩张政策，城市的改名背后或还多少蕴藉着“庆祝”占领新土地的意涵，但并不能就此抹除新城命名与东正教节庆及教堂之名相联系这一基本点。开疆拓土意味着将会有大批移民到来，人口增多，人们要过宗教生活，要新建教堂，举行大型宗教祭典。对于笃信宗教的俄罗斯人来说，一座大型教堂的奠基或落成，在当时，本身就是一桩重大事件，这恐怕不是没有长远宗教经历与深厚传统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有人指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建城，不能仅仅着眼于 12 月初沙皇允准升格为市，而该由教堂奠基的 5 月 21 日（俄历 5 月 9 日）开始起算^⑥，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俄国的教堂传统上常常采用圣人圣徒的名字命名，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有天使长米迦勒教堂，一般按音译即为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斯基教堂。此外，也多以纪

① [俄]A.И.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第 151 页。

② [俄]A.И.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第 155 页。

③ [俄]A.И.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第 156 页。

④ 参见 <http://suslovas.narod.ru/Blag/index.htm>。

⑤ 最初的提名还包括有切尔诺列茨克（意即“黑河”）或罗西耶斯拉夫（意为“俄罗斯光荣”）等，参见[俄]阿·基里洛夫：“一八五六——一八九〇年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第 63 页。

⑥ 参见[俄]阿·基里洛夫：“一八五六——一八九〇年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第 61 页。

念性的宗教节庆为名，因奠基、开工日恰逢某一节庆或圣者纪念日，还有的则完全与此无关。以节庆为名者，如圣三主日（三位一体）节、主显圣容节、圣母领报（天使报喜）节、圣母升天节教堂等。克里姆林宫内庭即有圣母升天大教堂（音译作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历代莫斯科大公与沙皇在此举行加冕典礼，那里也是全俄东正教会最高牧首的墓葬所在。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群中还有一座为历代沙皇举行洗礼、婚礼大典的圣母领报大教堂（天使报喜教堂），音译即作布拉戈维申斯基教堂。类似的例证，在俄罗斯各地俯拾皆是。

不但教堂沿用了这些圣人圣徒、宗教节庆的俄语名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名还往往影响到俄罗斯人的姓氏结构。在帝俄及后来的苏联时期，都曾见有以阿尔汉格尔斯基、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出自圣格奥尔基或圣乔治）、谢尔盖耶夫斯基（出自圣谢尔吉）以及乌斯宾斯基、布拉戈维申斯基、沃斯克列先斯基（出自复活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出自圣诞节）、特罗伊茨基（出自圣三主日节）、波克罗夫斯基（出自圣母节）等为姓者。^①而此类源于宗教节庆的姓氏，常常也直接来自于以此命名的教堂。^②事实上，这些渊源于宗教节庆的教堂的名称，后来既有转化为俄罗斯人姓氏的，也有一部分则演变成了地名。

地名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于特定地域的称谓或命名，体现了对该地自然形貌或社会人文环境的一种认知和解读。从地名的角度观之，某些宗教场所被转而移用来命名特定的地点，也就是说，地名取自宗教场所之例，同样是并不鲜见的，像中国地名中常有关帝庙、娘娘庙、三清宫之类。俄罗斯的地名自然也有着相似的命名原则和习惯，同样反映出它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别是同东正教的紧密联系与情感依赖。譬如，北冰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就得名于本地建于早年的一所名为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斯基（意即天使长米迦勒）的修道院。^③莫斯科以北的谢尔盖耶夫城名，则来自位于当地的俄罗斯最著名的谢尔盖耶夫圣三大修道院。放眼全球，整个基督教世界也无不弥漫着同样的宗教热情，在俄罗斯以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宗教节日、圣人圣徒和教堂名称作为地名的现象，其实极为普遍。像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之名，便源自一座建于6世纪的同名教堂。^④英国圣奥尔本斯城亦因当地10世纪末所建的一座同名教堂而获名。^⑤在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习俗乃至姓名、地名中，由宗教赋予影响的痕迹都不少，且又往往彼此交织。

① 李魁：《简述东正教对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影响》，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41页；杨可：“从俄罗斯人的姓氏看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俄语教学》，1998年第2期，第61-62页。

② 刘少华：“漫话俄罗斯人姓氏的起源”，《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年增刊，第27页。

③ 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第237页“阿尔汉格尔斯克”条。

④ 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第325页“索非亚”条。

⑤ 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第124-125页“圣奥尔本斯”条。

回到海兰泡的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本来意义，从俄语语源、目前所了解的历史事实来看，最初来自于东正教宗教节日及以此命名的教堂称谓的观点，显然更具说服力。虽不排除该词可能蕴含某种喜庆或纪念性成分，但其渊源主要得自宗教背景，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

还须补充说明的是，在俄罗斯各地，不光有叫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教堂，而且“布拉戈维申斯克”作为地名，海兰泡也不是唯一的。位于乌拉尔山脉以西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别拉亚河之滨，就有另一个同样称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市，1941年才设市。那么，它的涵义也是为了向谁“报喜”吗？在人迹杳然的北冰洋上的新西伯利亚群岛，法捷耶夫岛附近又有一处布拉戈维申斯基海峡。它的取名又是源于什么呢？手头没有具体资料，想来归结为最早发现者的姓氏或宗教节庆、当地所建教堂之名，大概会更合乎情理吧。

【 Abstract 】 Hailanpao originally belonged to China but was renamed Blagoveshchensk after it ceded to Russia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i'hui"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Russian language sources, historical facts and 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s, this Russian name does not mean simply sending good news to the tsar after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land of Heilongjiang, but from the church na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thodox festival.

【 Key Words 】 Blagoveshchensk, Treaty of Ai'Hui, Orthodox Church and Festival

【 Аннотация 】 Хайланьпа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принадлежал Китаю, в середине 19-го века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Айгунь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н отошёл к России, и был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 в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в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названи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хорошие новости» о переходе к императору земли на левом берегу реки Хэйлунцзян, а данное место получило своё название от церкви, именованной в че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 关键词 】 Хайланьпао, «Айгунь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праздник и церковь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大事记

(2010年7—8月)

7月

- 1日 公正俄罗斯党(Just Russia)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表示该党在2012年大选中将不会公开支持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的总统候选人。
- 2日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与白俄罗斯天然气公司(Beltransgaz)签署协议,将天然气运输费用从过去的每千立方米/百公里1.45美元提升至每千立方米/百公里1.88美元。
- 3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其远东之旅行程中讨论了非法移民和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 旧称海兰泡,现为俄阿穆尔地区城市)人口日趋减少的问题。
- 5日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表示俄将与哈萨克斯坦一道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框架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保留出口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r Lukashenko)则再三重申对此持反对意见。
- 7日 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访问第比利斯时称格鲁吉亚之分离领土被俄罗斯“占领”的言论。
俄罗斯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称俄方已经将所有有关斯摩棱斯克空难的调查材料交给了波兰方面。
- 8日 据报道,俄罗斯派往吉尔吉斯斯坦用于加强其坎特空军基地(Kant Air Base)防护的部队已被撤回国内。
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高加索地区特别代表亚历山大·赫洛波宁(Alexandr Khloponin)向该地区的投资者们作出“史无前例的”保证。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表示莫斯科希望与格鲁吉亚进行正常接触,即使在双方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乌俄两国边界勘定协议以347票赞成获得乌克兰议会通过。
- 9日 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的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是必要的,16%的被调查者认为其不应该存在于俄罗斯。48%的俄罗斯人(比去年增加了9%),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受教育者和莫斯科人,认为存在着政治反对派。
- 10日 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举行非正式峰会,会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 13日 独联体国家决定建立集体空中防御体系,它的范围包括独联体所覆盖的欧洲、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 14日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Vitali Churkin)表示,俄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其维和力量的存在。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了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对驻外大使们的年度致辞文稿,其中特别强调了他们对俄罗斯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
俄罗斯与伊朗就潜在的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其中涵盖天然气、石油化工等领域。
- 15日 在叶卡捷琳堡(Ekaterinburg)举行的俄罗斯—德国领导人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德国财界投资俄公司的现代化项目。
- 16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以354票赞成、96票反对通过了由政府提议的扩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权限的法案,目前该法案在等待联邦委员会的批准。
- 17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欧安组织(OSCE)峰会作出的有关应对吉尔吉斯斯坦骚乱的决定所表现出的该组织工作和态度上的变化(允许其通过成员国间达成共识作出决定)表示欢迎。
- 19日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所谓的“信息战”因俄电视台播放电影《教父2》“诋毁”白总统卢卡申科而加剧。
- 20日 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Kirill)和俄罗斯各地牧首抵乌克兰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
- 21日 在一次对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a)共和国巴桑克(Baxanskaya)水电站的袭击中,两人死亡,一台涡轮机组在爆炸中被毁。
- 22日 俄罗斯重申其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立场。
- 25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将在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与白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达成共识。

-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颁布一项法令，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日 9 月 2 日新设为俄二战“纪念日”。
- 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号召全乌克兰的东正教教会团结一致，拒绝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
- 26 日 俄罗斯政府把俄石油运输公司 (Transneft) 从 10 家将于 2011—13 年间进行私有化的国有公司名单中去除。
- 27 日 俄罗斯强烈反对欧盟和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认为其作为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需要。同时，俄对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提交关于能源交换的信函的行为持欢迎态度。
- 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 (Alexei Kudrin) 希望至 2015 年消除财政赤字。
- 28 日 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在基辅表示乌克兰东正教会拥有独立地位并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力。
- 30 日 俄罗斯要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禁止进口产自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葡萄酒和水，理由是这些产品由于卫生问题在俄被禁。
-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接受了总统委员会负责“社会和人权发展”机构领导人帕姆菲洛娃 (Ella Pamfilova) 出人意料的辞职，据悉其辞职是由于个人原因。
- 俄罗斯总理普京拨款 1.45 亿美元用于帮助那些在近期火灾中的遇难者。
- 31 日 民权运动者在俄罗斯各个城市举行“捍卫自由”集会，以响应国家宪法第 31 章。
- 8 月
- 2 日 由于自然灾害频发，俄总统在俄 7 个联邦主体启动紧急状态。此外俄紧急情况部长透露，该部计划在未来两年半内购买 8 架 Be-200 型水陆两用飞机用于灭火。
- 俄海军在塔尔图斯 (Tartous, 叙利亚港口) 的驻扎点将于 2012 年后接装重型舰船，包括巡洋舰，甚至航空母舰。
- 3 日 一架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Krasnoyarsk) 飞往伊加尔卡市 (Igarka) 的安-24 型客机在机场着陆时坠毁，共有 11 人死亡。
- 4 日 俄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俄严重关切造成 4 名黎巴嫩人和一名以色列人丧生的以黎边境冲突，并呼吁就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 5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俄政府决定禁止粮食以及粮食产品出口。
- 6 日 俄罗斯将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从联邦预算中拨出 5240 亿卢布用于建设索契冬奥会场馆设施。
- 9 日 俄罗斯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局长亚历山大·弗罗洛夫 (Alexander Frolov) 周一表示，目前俄遭遇的酷暑是千年不遇的。他还预测由于酷暑导致俄粮食主产区大旱，2010 年俄谷物同比可能减产 30%。
- 10 日 社会舆论基金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的民调显示，与今年 1 月份相比，民众对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信任度从 62% 降至 8 月的 52%。
- 11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 (Andreas Papandreu) 在电话中讨论了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双方合作问题。
- 俄总统对北高加索反腐败工作的进程提出批评，称：“需要进行一场真正的反腐败工作，而不是倒卖官职。”
- 俄罗斯农业部长表示今年俄粮食产量最悲观预测是 6000 万吨，但仍可满足国内需求。而其乐观预测是 6500 万吨至 7000 万吨。
- 12 日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布良斯克州 (Bryansk) 等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土壤层中残留有放射性物质的俄罗斯地区目前辐射状况正常。
- 13 日 喀山直升机制造厂总经理表示，该厂将从 2011 年起根据合同向印度供应米-17 型军用运输直升机。
- 俄罗斯海关再次禁止进口摩尔多瓦葡萄酒。
- 14 日 俄罗斯开始向伊朗布什尔 (Busheer) 核电站反应堆提供核燃料。
- 16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有关投资环境问题的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建立关税同盟的工作正按计划进行，并没有出现中断。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反恐演习在萨拉托夫州 (Saratov) 拉开序幕。
- 18 日 俄外交部对罗马尼亚驱逐一名俄驻罗使馆工作人员的行为表示抗议，并表示俄保留对此事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
- (下转第 127 页)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0年第5期

(总第165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0.00 元